殷海光全集

ISBN 957-551-090-9(套)
ISBN 957-551-091-7(第六冊)
電腦編號 08405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2 with funding from
Kahle/Austin Foundation

https://archive.org/details/daonuyizhilu0000unse

到奴役之路

殷海光全集 陸

著　者◉海耶克
譯　者◉殷海光

發 行 人／賴阿勝

出　版／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166號
地　址／台北市10769新生南路三段96-4號
電　話／3416949 · 3631407
電傳(FAX)／886-2-3969194
郵撥帳號／0104579-2
印　刷／東良印刷廠

初版一刷／1990年2月(印數 1 ～2000本)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定　價／150元
ISBN 957-551-090-9(套)
ISBN 957-551-091-7(第六册)

因爲每個人都能思想或都會寫作，而是由於每個人對於事物發生之原因都能夠提出其觀察，並且加以探討。在這種氣氛之下，可以養成容忍異己的心理習慣。（這點如不做到，則所謂民主也者，不過海市蜃樓而已。——譯者）

在自由社會中，各個人彼此交互影響，獲得不同的知識和不同的看法，構成思想的生活。理知的成長有賴於個別的差異，互爲個人（interpersonal）的程序促進個人理知的成長。如果我們拿任何前題來控制理知，遲早會使思想和理知趨於僵固的。（拿道德的考慮放在理知前面，結果亦然。這由中國傳統文化之瀕於衰竭可以得到證明。——譯者）

全然忘記，失掉獨自研究的能力，也不信任理知的力量，於是，在知識底每一部門中，如有意見上的參差，都變成政治上的爭端。（李森科底問題，就是一例。看破此點，便覺其不值一笑。——譯者）因此，這類爭端之解決，不靠科學研究，悉賴官方底權威。在極權國家，最令人觸目驚心之事，無過於輕蔑知識的自由。這種態度，不獨在極權制度之下爲然。知識份子，只要懷抱集體主義的信仰，都是如此。凡想作知識份子的首領者，也常如此。（這是經驗之談。充滿思想上的權力欲之知識份子，常富於侵略性，喜強使他人接受甚或信奉其意見，尤以弄「體系」哲學者有此「心量」。蓋彼以其「體系」可囊括宇宙，併吞八荒，而非一個頭腦之「造作」。於是凡持異議者，無不斥爲異端邪說，或淺薄幼稚。這種思想態度，一落入實際，究竟有益於民主，抑助長極權氣氛，識者不難判斷。——譯者）

我們不能說，任何人有權決定何人應該想些什麼，或者信仰什麼。從歷史上觀察，常有大多數人底思想隨著一個人走的事。但是，大多數人底思想隨著某一個人走，與每一個人底思想應否服從某一個人領導，根本是兩件事。（前者係自發的；後者係強制的。——譯者）但是，主張統制思想的人却把這兩者混爲一談，所以他們振振有詞地主張統制思想。這顯然是一項錯誤。復次，主張統制思想的人看到社會上並非每個人具有相同的獨自思想的能力。因而否認知識自由之價值。這也是一項錯誤。吾人須知，知識自由之所以有其價值，之所以爲知識進步之原動力，並非

份人在發展中初期的思想或生活狀態上的特殊性，又有什麼價值可言？這種人襲取一點源自菲希特的納粹哲學，固可迎合現實權勢之需要，給予內心排外自固者以心理的支援，又替心靈茫然空虛而外表誇飾自大者打氣，但其結果之可悲，何待明眼人之預言？——譯者）

這些顛倒錯亂的辦法，有時幾令局外人不敢置信。可是，我們不要以爲這些辦法只是極權制度之偶發的副產物，而與極權制度底基本性質無關。吾人須知，祇要政府強制國家社會中每一件事都受一個單獨的「全體概念」所支配，自然會發生這些結果。只要政府不惜任何代價來支持某些看法或某種主義，並且強制人民永遠爲之作不斷的犧牲，一定會產生這些結果的。只要政府有一項普遍的觀念，即以爲人民底知識和信仰是爲了達到某個單一的目標之工具，也終必產生這些荒謬的結果。（這是大劫難啊！——海光）

在極權制度之下，「眞理」一詞，不復具備其原有的意義。眞理是權威的頒製品，是爲辯飾那使大家一齊爲一個組織而工作的東西。一旦組織有緊急需要的話，這種所謂眞理，也可以隨之而改變。（言之透徹。「俄國眞理」就是常常隨著實際政治需要而改變的。所以，這種眞理，最好叫做「阿米巴眞理」，變色龍的眞理。——譯者）

這種辯法，在學問知識領域中所造成的風氣，是使人對於眞理持全然無所謂的態度。（馴至在這類社會中，如有人談眞理，就有被目爲神經病的危險。——譯者）許多人甚至把眞理底意義

海光）。因此，在極權制度之下，所謂歷史、經濟等學問，乃製造大量官方神話的工廠。

極權統治者似乎都深刻地不喜歡比較抽象的思想形式。（所以，他們反對「形式邏輯」。這是因爲他們對於抽象的思想形式之普遍的應用深懷恐懼。習於本抽象的思想形式來思考者，易於心靈開放 open-minded 。凡膠執一個偶像者無不心靈固閉 close-minded 。但後者正合極權統治之需要，故日夜趕工製造。——譯者）有人說，相對論是「閃族對於基督教和諾底人的物理學基礎之攻擊；」或者又說，相對論「與辯證唯物論和馬克斯的獨斷教條衝突。」數理統計學中有些定理受人攻擊。因其「在意理的前線上成爲階級鬪爭之一部份。……它是布爾喬亞之奴役。」又有人對數理統計學持完全反對的態度，因爲它「不能保證爲人民底利益而服務。」無論是哪一種說法，其厭憎數理統計學這一抽象的科學則一。純數學似乎是極權制度之下的一種犧牲品。在純數學範圍裡，如有人對於聯續底性質持特殊的看法，都被目爲「布爾喬亞的成見」。照韋布夫婦說，馬列主義的自然科學雜誌中有下述的口號：「我們在數學中有黨有派。我們在醫學的外科中是最純粹的馬列主義者。」在納粹德國，情形極其相似。國家社會主義數學家聯合會會刊中充滿了「數學中的黨派」氣氛。物理學也不例外。列納德（Lenard）是德國最有名的物理學家之一。他曾得過諾貝爾獎金。他曾把平生著作彙集起來，叫做「德意志物理學四卷」！（強調特殊性或獨一性 uniqueness 乃這類人物之一特色。強調物理學有何特殊性固屬可笑，強調世界上一部

無不是的父母」也。——譯者）任何新聞，其是否足以影響人民對於政府之忠誠，乃決定其公佈或扣留之唯一的標準。民主邦國，戰時在某些部分或不免如此；而在極權地區則任何部分永久都是如此。任何言論或行動，凡足以使人疑慮政府底智慧，或使人之不滿情緒增加者，便不讓之流行。凡足以把本國不利的情形與外國作比較的機會，凡政府措施失當的眞象，或諾言不能兌現之處，都要禁止發表。（歷歷如繪。——譯者）凡有計劃地管制新聞之處，無不如此。結果，弄到大家底看法一致，既然大家底看法一致，也就用不到強迫了。（因爲，在極權地區，只有「官聞」，並無「新聞」。——譯者）

這種辦法，不僅應用到與政治直接有關的範圍裡，而且也應用到與政治毫無直接關係的範圍裡，尤其應用到一切科學上，甚至於最抽象的科學上。凡直接涉及人文事象的學問，例如歷史、法律，或經濟學等，都是最直接地影響政治看法的，因此被管制最嚴，被歪曲亦最甚。在極權制度之下，爲眞理而眞理，純爲無關實際利害只爲個人興趣而求眞理之事，是在所不許的。（此點不獨左派的極權主義者爲然，右派的復古主義者亦然。左派的極權主義者說要「爲人民而眞理」；右派的復古主義者說要「爲道統而眞理」。結果，前者說爲眞理而眞理者是「住在象牙塔裡」；後者說爲眞理而眞理者「是淺薄的理智主義者」或「自我封鎖」或「個人興趣」。何其巧合若是耶？——譯者）在極權制度之下，支持官方的看法，乃一切研究的唯一目標（注意此處—

在施展極權統治時，極權政府以各種方法，直接或間接地，強制人民對於政府計劃之每一細節，以及政府底每一措施，都視爲神聖不可侵犯，並且不可批評。（理之當然也。——譯者）極權政府既然要人衆毫不躊躇地支持其所計劃的公共事務，而且要大家相信政府所訂定的目標是正確的；不僅目標是正確的；而且手段也是不錯的；所以，公衆的批評，甚至於懷疑的表示，都必須予以壓制。因爲，這些行期會動搖人心。人心動搖，會削弱大家對政府事務的努力。韋布夫婦在報導蘇俄的情形時，曾說：「當工作正在進行時，任何人對於政府底措施如公開表示懷疑，甚至害怕計劃不能成功，便被視爲不忠，甚至被視爲圖謀不軌。因爲，這些行爲可能動搖別人底意志。」（眞是「天下烏鴉一般黑也」！在民主國家，人民對於政府措施表示懷疑的批評，乃理所當然。可是，在極權地區，人民如對政府措施公然表示懷疑，便被視作不忠，甚至是「反動份子」。被視作反動份子者，其後果是不難想像的。因此，在極權地區，最不受歡迎的態度，是懷疑的態度。然而，近來有些人提倡黑格爾式的「絕對思想」，打擊懷疑態度，彼等之所事，將產生何種影響，稍有常識者不難預見。歷來腐儒禍害人類，不在流寇之下。——譯者）

依前所述，在極權統治之下，所謂理論也者，不過是官方底頒製品而已。全部傳播知識的工具，例如學校、報紙、廣播，以及電影，無一不用來支持官方底看法。無論官方底措施究竟是對還是錯，這些工具全部都用來加強一項信念，即是官方的決定總是對的。（千眞萬確，「天下

，和「平等」，這些字眼也都遭到同樣的待遇。像這樣的情形，幾乎遍及常用的道德名詞和政治名詞。（亂事者常自亂意始——譯者）

如果我們對於這一套偷天換日的文字魔術沒有切身的經驗，那麼，我們便不容易洞悉改換文字意義的效力，和因之而引起的思想混亂，以及對於任何理知性的討論之障礙爲何。假如兩弟兄之中，一個有了新信仰，不久以後，他說的便是一種不同的語言。結果，這兩弟兄之間，便發生語言阻隔之苦。（思力精細的人都會感到這一苦——譯者）如果藉文字之移義來表述政治理想，並且一直繼續下去藉以影響一班人底想法，那麼意義之混亂便更趨嚴重。這樣弄下去的話，日子一久，整個語言原有的作用便爲之敗壞，並且被濫用者據爲己有；而且文字也就變成空殼，不復有任何確定的意義。（所以，需要語意學來救——海光）

吾人需知，要有計劃地剝奪大多數人獨自思想的能力，並非一件難事。但是，到了大多數人失去獨自思想的能力時，少數人即使要保留批評的能力，也將被迫保持緘默。（此乃經驗之談也。當多數人習於以非爲是時，如有極少數人說眞話，豈有不被羣起而攻之理？現代極權統治者無不倣言「羣衆路線」。良以彼等可發動羣衆消滅少數異己份子也。最大多數人被欺被愚而造成清一色之思想以後，萬一有少數清醒份子指出大家之迷妄，必立遭羣衆羣起而攻之，以致淹沒於愚人之海。這種拿羣衆統治羣衆的技術所生之效果，遠勝於舊式的直接「捉將官裡去」。——譯者）

等奇說以打消原有的民主。——譯者）

有人提出「爲自由而計劃」的說法。他們說要「爲團體建立集體的自由。」他們又感到必須對我們保證：「主張計劃的自由並不等於取消一切舊式的自由。」由此，我們就可明瞭這種「自由」底性質爲何。曼海門博士說：「依據過去的時代而塑造的自由概念，乃對於這個問題想作任何眞實的瞭解之一障礙。」顯然得很，曼海門博士對於「自由」一詞之用法，與極權主義的政客口中所謂的「自由」，是同樣的錯誤。曼海門博士所說的「集體自由」，正如極權主義的政客口中所謂的「自由」一樣，並非社會上各個份子底自由，而是計劃者爲所欲爲的自由，即是高興把社會怎樣弄便怎樣弄的漫無限制之自由。（所謂「國家自由」，亦復如此：即自命代表國家者毫無責任地對邦國事務爲所欲爲之自由。——譯者）這種自由，不過是把自由與權力混淆到了極點的一種說法而已。（一針見血之論。同樣，「負責」與「獨裁」也可作這種混淆。有人說「獨裁」即是「負責」。這等於說「公婆」即是「媳婦」。「負責」者只能在受委託的條件之下享受有限的權力，而且其行使權力之結果隨時得受追究。「獨裁」者底權力實際純由擅取，無限擴張，而且任何人對其行使權力之結果不能追究。二者之差，判若雲泥，豈可混爲一談？——譯者）

字義之歪曲，由來已久，並早已爲德國哲學家所優爲：許多社會主義的理論家亦擅長此道。除「自由」以外，還有許許多多字眼同樣遭受歪曲之刑。例如，「正義」、「法律」、「公正」

爲官方教條之一部份，他們要利用這種教條來支配每一個人底行動。（禍害之至——海光）

極權統治者之需要這類官方的理論來作指導和鼓勵一般人民的工具，這早已爲極權制度中各形各色的理論家所見及。柏拉圖之「高貴的謊言」（noblelies）和索利勒（Sorel）底「神話」，都可爲納粹底種族優越論，或莫索里尼底合作邦國論辯護。

極權統治者使人接受其價值觀念之最有效的方法，如前所述，是使他們相信這些觀念與他們自己平常所信仰的觀念實在是一樣的，至少是與好人平常所信持的觀念是一樣的，不過大家從前對之沒有正確的認識而已，如果大家對這種說法信以爲眞，那麼就是從信仰舊的上帝過渡到信仰新的上帝。而宣傳所使用的最有效的技術，就是使用舊的字眼，換上新的意義。（這就是語意的魔術之應用。例如，彼輩所謂之「愛國」、「民族」，……與原來意義相去甚遠。——譯者）歪曲語言文字之用法，更換文字底意義，藉此以表達新統治之理想，乃極權統治之一大特色。這類魔術，常使淺薄的觀察者神經爲之混亂。而這一點，也最能表徵極權地區整個的知識空氣。

從這一方面來觀察，最受糟蹋的名詞是「自由」。在極權國家，「自由」一詞之使用，也許不受干涉。但是，極權的宣傳家却給「自由」以不同的解釋。他們說，「舊自由」要不得，「新自由」才好。這麼一來，一般人對於自由的瞭解，便被歪曲殆盡。（對於「民主」亦然。極權主義者深知一般人對於民主之普遍的嚮慕，不敢從正面反對，於是創作「新民主」或「人民民主」

勞役、奴辱、恐怖、饑餓、控制、迫害等等。總之凡未實現的都是好的；凡已實現是不好的。這何以自圓其說呢？彼等之理論家說，從現實之不好到未來之好，必須經歷一「辯證的過程」。這樣一來，所推出的結論就是：爲了未來的好，你必須忍受現在的不好。所以，要得自由必先犧牲自由；要和平必先戰爭；要吃飯必先進奴工營；要國家萎謝必先建立國家極權，種種等等，不一而足。依照這種「思維方式」，不才如譯者也可倣製一些「辯證式的」大道理：要愛國必先亡國，要民主必先獨裁；以至於「要生活必先死亡」之類。）第三、極權主義者不僅要求一般人必需同意官方所訂的最後目標，而且又得同意官方採取某些特殊手段時對於事實的看法。（例如，官方對於世界局勢持何看法，大家也得跟著持何看法。究竟正確與否，可以不管。當然，這種辦法，並非全無益處：至少，可令大家底神經細胞停止辦公。——譯者）

從表面看來，極權制度非常著重理論。然而，一究其實，在極權統治之下所謂的「理論」，不能算做理論，只是改裝的神話而已。（這類神話，常飾以唯物或唯心之類的玄學詞章。——譯者）極權統治者創造神話之舉，並非全然出諸有意。極權的首領之創造神話，也許由於在本能上不喜歡他所碰見的事實，並且希望創造一新的階層制度。這種新的階層制度之建立，也許可以滿足其好大喜功之心，極權者需要製造種種學說，來辯護他及其信徒所共有的那些成見。因此，在極權邦國，常常出現虛假的科學理論（pseudo-scientific theory）。這種虛假的科學理論，成

，在過去社會已貽誤不淺，更何有於今日？——譯者）

在極權國家，這類宣傳上的優勢，使攫取政權者掌握著控制人心之獨一無二的權力。這樣一來，一般人民所發生的心理反應，主要地爲宣傳的內容和範圍所限制。假若極權統治者能夠把整套價值觀念灌輸給人民，那麼宣傳手段就能製造所謂「集體主義的道德」。不過，我們必須知道，極權社會中所謂的道德法典，並非告訴我們道德中人道主義的因素，尊重人底生命、同情弱者、尊重個人等等。極權主義者所謂的道德，在實際上，是破壞一切道德。人底眞理感和尊重眞理，乃一切道德底基礎。（是什麼就說什麼眞理感的表現——海光）極權主義者則盡力顚覆這種基礎。從極權主義的宣傳之性質看來，極權主義的宣傳不能尊重價值，不符合個人所在的社羣之道德信念。之所以如此，有許多原因。第一、爲著要誘導一般人接受官方所規定的價值判斷，宣傳者必須說個不同的道理出來；或者宣傳者說他所提出的說法就是與一般人民已採取的價值觀念相關聯。（依這條路線，在建立極權主義時，也常常運用復古主義，或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無論是希特勒，還是史達林，都是如此。——譯者）第二、極權主義者強調手段與目的不同。但是二者之間的不同，界線究竟在哪裡，則從未劃淸。（因此，他們要利用「矛盾的統一」，或「否定之否定」諸般胡說以爲辯護。極權統治有一大特色，即是語言文字所表現的常爲未來的「理想」、「幸福」、「光榮」、「美麗」、「快樂」；而與這些字眼相對照的現實，則爲

尤其如此。政治思想受擺佈，政治行動哪有不任其支配之理？毒蛇吃兔以前，將毒液注射到兔子裡面。兔子受毒以後，抵抗力大爲減少。這樣看來，「意底牢結」等等東西在極權地區，絕非人衆嚮往的理想，實乃統治方式之一，初級的獨裁者控制人底身體；高級的獨裁者則控制人底腦筋。——譯者）

自然，極權政府要統制思想，必須藉著形形色色的宣傳。他們底宣傳技術，大家已夠熟悉，用不著我們多說。我們在這裡所應注意的唯一之點是，無論宣傳本身或是宣傳所應用的技術，俱非極權制度所特有者。別種國家也有宣傳及其技術。儘管如此，在這二者之間，還是有著重大差別的。極權政府所作的宣傳皆趨向於一個相同的目標。一切宣傳工具都被用來朝一個方向影響每一個人，並且企圖使每一個人在心性方面產生一模一樣的品質。這麼一來，極權政府宣傳所產生的結果，與自由國家各個獨立而又互相競爭的宣傳機構爲了不同目標所作的宣傳之結果，不僅在幅度之大小方面不同，而且在影響上也有天壤之別。在一個國家，假若一切消息底來源都置於一個單一的機構之有效的管制下，那麼其所產生的結果，不只是政府勸誘人民做這或做那而已，心理技巧高妙的宣傳家還可藉他所採取的技巧來塑造一般人底想法。即使是知識最高而且具有獨自判斷能力的人，如果長期與外界隔離，一切消息來源斷絕，也無以完全免於受宣傳之影響。（眞是言中竅要，切合經驗事實。所以，今日最緊急的問題，是如何避免此類人爲災害。玄談心性

點睛之筆也！極權統治者如希特勒之流要利用人衆，僅靠高壓手段是不夠的。彼輩必須能進一步攝取人衆之靈魂，以供其利用。一若催眠術師要被催眠者如何動作便如何動作然，一旦人衆受宣傳麻醉，「覺得」極權政府所要達到之目的正是自己所要達到之目的，則甘心供其驅策，甚至萬死而不辭矣！極權統治眞正可怕之處，就在這裡。——譯者）政府爲人民規定信仰，同時還得想出辦法使一般人以爲這種信仰正是自己的信仰。（這是最高的「愚民政策」。——譯者）如果人衆一致接受了政府希望大家接受的信仰（例如各種各色的「主義」——譯者），便可使得各個人自發自願地照著計劃者所規劃的路線去作。（所以，實行計劃經濟，演變所及，必至統治思想、教育，以至於生活之全面。——譯者）在極權國家，如果一般人民對於政府壓迫的感覺，並不若自由國家最大多數人所想像之尖銳，那麼，這是由於極權政府在控制人民底思想上得到高度的成功。政府希望人民腦子裡怎樣想，人民就怎樣想。（這麼一來，人民對於政府，那有不依從之理？許多人以爲在鐵幕內的人民之思想不能被控制。這種看法，既無心理學的根據，又無絲毫事實的根據。依事實觀察，有獨自思想能力的人，在人中少之又少。最大多數人底思想都是依賴傳統、權威、風俗、習慣、趨勢，或他人的。每一個人對於極權的思想統治機構而言，一定是絕對劣勢的少數。所以，一旦極權的思想之天羅地網佈成，除極少數特出以外，一般人因思想資料之來源悉遭管制，於是他們的思想內容和方向主要地不能不已在極權政府底擺佈之中。政治思想

神聖化的人，並製造空氣，企圖以之爲碰都碰不得的權威思想。這樣做法，或有實際的利益，或可滿足狂執之情緒。但是，何必標榜什麼「民主」？向喀爾文學習好了。

極權政治是整個浸沉於權威主義的空氣之中的政治。所以，意理的思想上的權威，在極權政治之下，一定與政治權威互相表裡。史達林之流，不獨要「作之君」，而且還要「作之師」。思想權威化之具體建構，便是思想國營國有。實行「計劃教育」便是思想國營。思想國營國有，與產業國營國有，正好一裡一表，一心一物，控制得千萬人動彈不得。這樣看來，思想上的權威主義，碰到極權統治，無論倡之者自願或不自願，無可避免地成爲極權統治之一環。我們不要拿「理性的機智」這樣的虛話自誤誤人。

論思想國有

一個政府要使大家爲一個單獨的社會計劃而服務，最有效的辦法，便是使每一個人都贊同這個社會計劃所要達到的目標。一個極權政府要使極權制度發生有效的作用，如果只訴諸壓制手段，強迫每個人爲此一目標工作，還是不夠的。依現代的實例觀察，極權政府要使每個人爲它的極權制度努力，重要的辦法，就是使得一般人把政府所要達到的目標看作是自己底目標。（此畫龍

Adam Smith）說：「體系之建構，普遍係起源於那些熟悉一藝而對於其他毫無所知者之苦心構作。那些人藉著他們所熟知的現象來說明他們甚以爲奇的現象。因此，在別的作家看來不過是幾個聰明的比喻的東西，他們則當做是一切事物變化之大關鍵。」建構「體系」之弊，於茲可見。（但是，這並不是說，知識的建立不要「系統」。）

羅素說：「在一方面，有些人對於書本比對於事務要熟悉些。這種人往往過分高估哲學家底影響力。當其政黨標榜受蘇革拉底學說之鼓舞時，他們就以爲這個政黨底行動是由於什麼什麼學說使然。……直到最近，著作家們幾乎過分誇大前人在思想上的影響。這是一個古老的錯誤。」唯心的歷史自足主義者正是犯這種錯誤。唯物主義者說：「存在決定意識」。唯心主義者翻過來說：「意識決定存在」。唯心主義者和唯物主義者似乎互爲死敵。可是，從科學的哲學之眼光看來，二者不過是同一型模的思想之不同的翻面而已。二者之爭霸，雖屬無謂，却給世界帶來不少實際的災害。

民主與極權底分野之一，是看有無與政治關聯的「禁制」。極權統治之下，這類禁制是很多的。例如在蘇俄，「首領」、「主義」、「政府」、「共黨」、「國家」被神聖化，一碰都不能碰。碰了就闖大禍。因爲，這些東西就是權威的象徵。民主自由的社會是沒有這一套的。然而，在大家爲民主自由困苦掙扎的現今，却有人捧出編造的「歷史文化論」和所謂「道統」及過去被

想法，多少係出自「體系癖」。任何體系，如構造周密，常給人一種融貫感（sense of coherency）。而確然感（sense of certainty）又常伴隨融貫感以俱來。於是，不善造體系者，面對似善造體系者，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實，自諸非歐幾何學、公設學（Axiomatics），設準技術（postulational technipues），以及系統學（Systematics）出現以後，所謂「體系」也者，已不復能作迷魂之陣。任何系統底內部建構是否嚴密是一回事，是否能與此實際世界相應是另一回事。且自純形式的考慮著眼，吾人可自任一因素出發而抽繹成一個系統。這種抽繹工作，可委諸Von Neumann設計完備之電腦，固無待乎「哲學大家」從事也。這個世界底事象如此繁複，吾人從社羣實際生活底任何一角，幾乎都可發現任一事件中諸可識別的因素之相互交織；雖然，在大量歷史現象中，某一因素之出現特別顯著，或較具支配力，或較引起知識者注意。因此，單取其中任何一二被認作重要的因素組成用語言系統所表示的「體系」，爲事實非困難。馬克斯以「生產工具」、「生產關係」這類因素作爲說明歷史發展的基本因素，似乎頭頭是道。殊不知所謂「生產工具」，已暗含人智運用等等非經濟的因素。至於「生產關係」一詞，隱含的意指更屬複雜，包含的非經濟因素更多。如果弗洛依德（S. Freud）以「性欲」爲基本因素來解釋歷史發展，黃色遍紙，其動人之處，將遠過唯物史觀。世之構造「唯心史觀」如黑格爾及其各形各色的徒從者，在思路型構上，與馬克斯實係一丘之貉。當然，在內容上較可忍受。亞當斯密（

而不許加遺「詞（請參看K.Popper：*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0）。收納信徒弟子，儼如創救。這種狂愚的行徑，令人不知何以爲詞。

吾人須知，將歷史人格化，係「pathetic fallacy。這「謬誤，係由pathetic muddle所生。這是原始人思想中常有的毛病。思想上這「類底原始毛病，正被現代哲學解析家，及語意學家批析之不遺餘力。（請參看H. Feigl：*Readings in Philosophical Analysis*，Appleton-Century-Crofts，INC，1949；M.Black：*Philosophical Analysi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0；H. Reichenbach：*The Rise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1；A. Pap：*Elements of Analytic Philosophy*，the Macmillan Co.，1949；Feigl and Brodbeck：*Reading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Appleton-Century-Crofts，1954；Richard von Mises：*Positivi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如果我們對於哲學上這些新近的成就之對於玄學的洗刷茫然無知，而只說「聲「這是哲學之墮落」，殊不足以抵償學知之固陋。

所謂「歷史文化」「詞，如果有意義，係指由主、客、內、外、自然與人交互作用而在時空中形成的「組可經驗的複合事實。這些因素缺「不可。「歷史文化」主義者却單單把ethos凸提出來視作歷史文化之「基本」（fundamental）（此名係借自Hempel，並從其用法。）這種

communication）。在西方教權盛行時期，僧侶底經典是支配思想的「大經大法」。到了現代，反民主自由的黨權崛起，共產黨化思想則強天下從同。這些形態固然各不相同，起因各不一樣，說詞各有千秋，有的標尙唯心，有的強調唯物，有的自命實現「歷史使命」，又有的口稱「代表人民」，但是，他們至少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思想之權威化。

思想一經權威化，人間就慘禍大作，黑暗就籠罩大地！古往今來，爲了所謂「信條戰爭」，犧牲了多如生靈！又多少睿智之士在權威思想之前遭受迫害！洛傑培根（Roger Bacon）、迦利略（G.Galileo），不過是其中的顯例而已。（請參看Bury: *A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1952）時至今日，在稍有實徵態度（positivistic attitude）的人看來，人類在這條舊路上走，何其殘酷，何其愚昧，又何其浪費！所以，西方自宗教改革以至於知識革進，三、四百年來，無日不與權威思想抗爭，以至於有了啓蒙（Auklaerung），有了科學。有了科學，人類從此可以平視這個眞實世界，不再爲那些「幻覺」（illusions）白白流血，冤枉送命。這本是人類文化發展的一條大的趨勢。史跡斑斑可考，明顯到差不多不值一提。然而，現在居然還有人歌頌「中古精神」，拿玄思默想所幻構出來的「道統」強人頂禮膜拜；摭拾早被若干西方學人批駁得體無完膚的歷史自足主義（historicism）鋪陳其玄思心理（speculative psychology，借用Prof. Quine底字眼）之恍惚產品

論思想國有

思想之國有化，在每一方面，都是與工業之國有化齊頭並進的。這件事很值得我們注意。

——克爾（E.H. Carr）

譯者的話

國家，在與其中的個人相對的關係上，以或多或少的程度，是權威之一種。絕對的極權國家絕對地把思想國有化。既然如此，可見思想之國有化，是思想之權威化（authoritarianization）。思想權威化，因時代、社會，或地域之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形態。在部落社會，酋長的想法是部衆行動底準繩。在東方的君權時代，常有自稱或被稱爲「聖君」者流底念頭立爲天下法，有冒犯之者，被目爲「大逆不道」；士人進身之階永被斬絕。這在西方，相當於宗教除革（ex-

組織，一概都不是訓練人道主義的場所。然而，這些場所却是到達最高位置的門徑。（製造人間地獄乃成就極權統治之捷徑。——譯者）

這一類底問題，與極權主義底特色相關，也與所謂的「眞理」相關。極權政治對於「眞理」底影響爲何，這個題目是很大的。我們必須另闢一章來討論。

海光附記：海耶克對極權主義認識的深徹實非羅素所及。海耶克對自由主義的瞭解之正確亦非羅素所及。羅素雖極崇尚思想自由，但其經濟思想受費邊社諸君子的影響，以致走入邊沁式的道途。於是，他的自由主義不是維格式的純種自由主義。海耶克所持自由主義才是純種的自由主義。請進而閱讀《自由的構成》（*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一書。

之流爲例，不是一人，便是一黨。彼等於奪得權力以後，置全社羣於其鐵掌控制之下，爲所欲爲。這樣一來，所謂「社羣的共同目標」，不過彼等利用之一藉口而已。——譯者）

如果一個人在極權統治的建立中想有所效勞，那麼他必須準備接受那些爲卑鄙行爲而設的虛僞辯護之詞。在極權統治之下，祇有最高的首領一人才可單獨決定政治目標。而作工具的人，本身不能堅持道德上的任何信條。（可悲之至！——海光）總而言之，他們必須毫無保留地獻身於首領。除此以外，最關重要的事，就是他們作人必須完全沒有原則（unprincipled）；而且，至少在理論上，他們必須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他們作人，必須沒有自己想要達到的目標；也沒有是非善惡的觀念。因爲，是非善惡觀念如果橫在他們心裡，便可能攪亂首領的意圖。（一語道破。欲行極權統治，必須破除人情，破除道德，破除風俗習慣，而不顧一切。——譯者）權力者能滿足的口胃，只有權力的嗜好，以及別人對自己服從時所得到的快樂。

依照我們的標準看來，品格比較完善的人便不能在極權政治中居於領導地位。（巨眼觀透——譯者）在極權統治之下，許許多多壞事都是假較高的目標之名而行的。極權統治者做這些壞事時，所用的技術同樣專門，而且也很講求效率。存心做壞事，乃增進權力的一條大路。（此語有至理存焉。直可媲美馬基威尼也！——譯者）在極權主義的社會中，爪牙們必須兇暴，長於威嚇，巧於詐僞，慣於偵伺。無論是蓋世太保（Gestapo），或集中營的管理，無論是宣傳部或相似的

的個人主義的制度優越。他們以爲，在個人主義的制度之下，個人係爲其私利而活動。這麼一來，便妨害社羣公共目標之充分的實現。許多德國的哲學家一再宣稱爲個人幸福而努力乃一不道德之事；只有完成邦國所賦予的義務才值得稱讚。這些人作此類論調時，出言完全是誠實的。當然，在不同文化傳統之中生長的人是不易瞭解這一點的。（但誠實的人不一定不狠刻——海光）

吾人須知，一個邦國如果有一個超乎一切的共同政治目標時，那麼任何普遍的道德便無容身之地。（例如，在蘇俄，所謂「實行共產主義」高於一切，於是所有道德、宗教、倫理、藝術，都得退避三舍；最低限度，也得編入這一政治目標之下。海耶克教授此言所表現的識見，較之那些閉起雙眼來捧頌「仁義道德」的泛道德主義者高明萬倍。弄不清病勢而妄投藥石的江湖郎中，鮮有不盲目殺死病人者——譯者）在某種程度以內，即使是民主國家，在戰時也難免發生類似的情況。不過，在民主邦國，即使在戰時或遭逢最大的危機，其採取極權主義的方法之程度也是非常有限的。民主邦國爲了達到一個單一的目標很少把其他一切置諸不顧的。（極權邦國視講自由爲搗亂，動輒藉口「緊急需要」而剝奪個人自由。共產國家把這一點表現得最爲徹底。——譯者）吾人須知，一旦少數幾個目標支配著整個社羣，則人民之忍受殘暴便成爲一項無可避免的義務。在集體主義者看來，爲了達到社羣底共同目標，個人底權利和價值都是可以犧牲的。（這是人間最大的罪惡與詐欺。現代的大悲劇，主要由此詐欺造成。究其實際，倡此說者，以納粹和共黨

不管是非；俯伏於既存勢力之下，若野草之習於生存在石縫中者然；隨時調整心理角度，以適應各種政治變化；掏空自己底頭腦，一點自己底認識見解也不能留，以便隨時讓人注入紅藍白黑各色染料；除政令與政治教條以外，絕對不認眞抱緊任何自然律和人文律。總而言之，只要能夠活下去，一切的一切，都可以視爲手段。所以，在極權統制之下生存的人，久而久之，形成一種人生哲學，即是「唯存主義」（raison d'être）：只要能夠活下去，其他一切在所不計。——譯者）

照我們看來，極權制度是否定一切道德價值的。在極權統治之下的人民，看起來似乎是對於極權制度無限支持的。可是，如果我們因此以爲在極權統制之下的人民沒有道德上的熱忱，那是很不公道的說法。因爲，最大多數在極權統治之下的人民並非如此。吾人須知，在像納粹主義之類的運動背後所隱藏的道德情緒，其程度之強烈，也許只有歷史上那些偉大的宗教運動才可以與之比擬。在極權制度之下，只承認個人不過是爲達到像邦國或社羣這些較高層次的東西之目標底工具，因此令人恐怖的那些事物也就隨之俱來。（千眞萬確。非親身嘗試者，不知個中滋味。但是，有的社會則患「道德冷感」。悲夫！——譯者）從集體主義的觀點看來，對於持異議者不寬容並施以暴力壓迫，完全不顧個人底生命與幸福，俱屬以社會與國家爲至上而個人則爲其工具之無可避免的結果。集體主義者對於這些結果都予承認，同時並且認爲極權制度比「自利自私」

d'état）是集體主義的倫理學中最明白的教條。依據這個教條，集體主義者之所作所爲，除了權宜之計以外，任何條件都不能限制之。（一針見血。蘇俄底一切行爲，都可依這一條來解釋。一切極權的政治組織底做作，也無不如此。——譯者）在集體主義的邦國裡，公民應該預備做些什麼，並沒有什麼限制。（所以，今天要人這樣，明天要人那樣。花樣層出不窮。好像耍猴把戲一樣。主人要猴子耍什麼戲，猴子就得隨鞭子動作。——譯者）所以，團體要他做什麼，或者上級命令他完成什麼，他就得照辦。他底良心不能阻止他這樣幹。（在這樣鐵的制度中，如果還空談古道德，叫人如何「正心誠意」，如何行「仁義道德」，這不是唱高調，就是不明事理。凡言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荒謬。而此等荒謬，多飾之以人衆「不懂」之「哲學」外衣。結果，越談離題越遠，越唱越虛僞。嗟乎！亂世出妖道，豈僅古代爲然哉？——譯者）（正因如此，更要眞道德——海光）

集體主義的倫理學中沒有絕對形式的倫理規律。自然，這並不是說，在集體主義的社羣中，個人並沒有養成許多有用的習慣，吾人須知在集體主義的社羣中生活的人，較之在個人主義的社羣中生活的人，更需要某些生活習慣才能生存下去。而這些生活習慣，以及某些品性，必須常常練習，才能鞏固和增長。（這話才算搔著痛處。在權威控制之下的人衆，必須能逆來順受；視謊言爲眞理；視苛煩爲當然；視強顏爲歡乃人生義務；說不願說的話，做不願做的事；只問利害，

在分散狀況之下時有程度之不同；而且有種類之別。（權力多元化時尚可互相制衡。權力一元化時，橫衝直闖起來，何法可制？——譯者）有人常說，一個中央計劃機構所握有的偉大權力「並不比私人機構集合起來運用的權力爲大」。這種說法簡直完全錯誤。吾人須知，在一個自由競爭的社會裡，任何人想保有社會主義的計劃機構所掌握的權力之一部份都不可能。如果私人的機構並非在一個指揮系統之下齊一動作，而我們還說「私人機構底權力之集體運用」，這不過是玩弄名詞而已。分散權力必可抵抑權力之絕對總和。自由競爭制度，乃分散人吃人的中央管制權力之唯一的良藥。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之分散，乃保證個人自由之必要的措施。當著經濟權力成爲一項壓制工具時，所謂經濟權力也者；如果握在私人手中，便不致成爲絕對的和完全的權力，也不足以控制人底全部生活。如果經濟權力中央化，並且變成政治權力底工具，那麼任何人都得靠它才能生活，經濟權力發展到了這一步，其去奴役也已不遠矣。

在集體主義者之間流行一項「道德原則」，即是目的使手段成爲正確。既然如此，我們可以「只問目的，不擇手段」。這條原則，照個人主義的倫理學看來，簡直是一切道德之否定；可是，在集體主義的倫理學看來，則是一切行動底最高準則。照集體主義者看來，如果我們底行動是「爲全體謀福利」，那麼沒有任何事情是不應該做的。（這就是現在萬惡之源。——譯者）

集體主義者覺得「爲全體謀福利」是一切應爲之事的唯一標準。「一切爲國家」（raison

美權力。所以易於從社會主義發展到國家主義。這一發展，深切影響到一切集體主義者底倫理觀念。關於弱小邦國底權利問題之態度，馬克斯和恩革斯比其他大多數集體主義者好不了多少。他們偶爾對於捷克人或波蘭人所表示的意見，與現代國家社會黨人相似。（可怕！——海光）

從十九世紀偉大個人主義的社會哲學家，像阿克頓爵士（Lord Acton）和波哈特（Jacob Burckhardt），降至現代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思想家，像羅素，都因襲了自由的傳統。這些人認爲，權力本身往往是一種最大的罪惡。可是，對於嚴格的集體主義者而言，權力本身却是一個目的。正如羅素所說的，社會主義者之亟求依照一個單一的計劃來組織社會生活，這不僅是出於獲取權力的欲望而已。這類行動，無寧係由於爲要達到實行集體制度之目的。集體主義者必須增加其權力，才能達到他們底目的。且集體主義者所獲權力之大，在許多地方爲前所未有者。

許多自由的社會主義者有一項悲劇式的幻想。他們以爲剝奪個人在個體主義制度之下個人所有的權力，並且把這種權力轉移到社會去，這樣便可以使權力歸於消滅。所以，即使是自由的社會主義者，往往也要從事獲取權力，想藉權力來消滅權力。不過，許多社會主義者忽視了一件事，即是集中了權力固然能夠完成一個單一的集體計劃；可是，權力不僅是轉移了就算數的，它還要無限地擴張的。吾人須知，一旦把從前分散於許多人手中的權力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則此項握權力較之從前在分散狀況下時，勢必不斷地擴大。權力擴大的結果，簡直不獨使此權力與從前

絕內外交通，避免外力礙手礙脚，以便好「關起門來幹」。在另一方面，又用種種麻醉和阻塞工具來防制「開放的心靈」之成長。——譯者）

社會主義者在實際上普遍具有國家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傾向。這是遠出一般人想像之外的事。雖然如此，其罪惡之昭彰，尚不若韋氏夫婦及早期費邊社若干份子之甚。彼等之醉心於計劃經濟，尚有與衆不同之處，即崇敬強權，輕視弱小。歷史學家哈維遠在五十年前即對韋氏夫婦有所瞭解。他說韋氏夫婦底社會主義在根本上是反對自由的。他說：「韋氏夫婦並不壓憎王黨（Tories）。的確，韋氏夫婦對於王黨格外寬恕。同時，他們却不同情格蘭斯頓式的自由主義（Gladstonian Liberalism）。當波瓦戰爭（Boer War）時，進步的自由份子，和開始組織工黨的人在自由和人道的名義下都慷慨地同情波瓦人，以對抗英帝國主義。但是，韋氏夫婦和蕭伯納則袖手旁觀。他們是態度矜誇的帝國主義者。弱小民族底獨立，對於自由的獨立份子而言，也許是很有意義的事；但是對於像韋氏夫婦這樣的集體主義者却一點意義也沒有。我們依然聽到韋布先生向我們解釋：「未來的世界是屬於偉大的行政邦國的。在這樣的邦國以內，官吏控制一切，而警察則維持著秩序。」哈維又在別的地方引蕭伯納底話說：「世界必然屬於強大的邦國；弱小的國家必須兼併到大國裡，或者被消滅掉。」（猙獰面目，暴露無遺——海光）

在我們所徵引的這些話中，我們可以看出社會主義者怎樣讚美權力，因爲社會主義者如此讚

一個人在偉大團體之中，往往感到自卑。所以，只要在一團體中有些份子於某些方面比團體以外的人優越，他便感到滿足。一人加入集體性的團體之中，有許多本能是必須抑制的。可是，在以集體行動來對付團體以外的人時，則某些本能可以盡情發揮。這麼一來，一個人底人格便在集體性的團體中湮沒了。尼波（Reinhold Niebuhr）寫了一本書，叫做《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會》（*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儘管我們不太同意他底結論，可是，在那本書裡，尼波把這一方面的眞理表示得很深刻。尼波在另一處又說：「在現代人之間，有一趨勢與日俱增。現代人總以爲他們自己是合乎道德的。因爲，他們一天一天地把他們自己底過惡往大的和更大的集團頭上推。」（眞是至理名言。凡推行集體制度的地方，一定都產生這類現象。因此做殘暴的事而無動於衷。許多談玄說幻者不明此一基本事實，還要「遵古炮製」，寄扭轉劫運於抬起一顆一顆的「心」。彼輩不知一顆一顆的心早已給集體制度壓扁了，如何抬得起來？這樣叫下去，再叫一萬年，還是白費氣力。——譯者）事實的確是如此的。在集體的名義之下，我們似乎可以不負許多道德的責任。

計劃主義者常常心胸狹窄。大多數計劃主義者缺乏一種國際的普遍懷抱。之所以如此，因爲在現存的世界中，一個團體對外的一切接觸都足以阻礙其有效地執行計劃。最大多數的計劃者都是軍事性的國家主義者。這並非一件偶然的事。（所以，實行計劃者必須組成幕罩，儘可能地阻

」不過是純理論方面的東西時，在實際上任何地方的社會主義都是極權主義的。一行極權主義，當無人道主義可言了。爲什麼如此，理由之一，乃如前述，吾人須知，集體主義不能容忍自由主義的廣泛的人道主義；而只能容忍極權的特殊主義。（特殊主義，乃今日世界各部份隔膜、誤解、猜忌之一源；對內而言，則爲進步之一大障礙。——譯者）

如果有人認爲「社羣」或邦國先於個人，如果有人認爲社羣或邦國有其自己底目標，而且這一目標獨立於個人底目標，並且又超越於個人底目標，那麼，只有爲與社會或邦國底目標相同的目標而作工的個人，才能被認爲是這個社羣或國家之一份子。如果有人對人採取這一種看法，那麼一定得到一種結果。即是只有這個人爲政府所承認的共同目標而工作時，那麼他才被尊重爲團體之一員，而且，他整個尊嚴，並非因他僅僅是一個人而得來，而是因他乃此團體之一員而得來。（這就是個人在極權邦國中的適當位置。這在思想背景上，與黑格爾的邦國理論符合。黑格爾在此所提暗示，對於極權統治之建立，誠有不可沒之功也！——譯者）人性底概念，以及各種形式底國際主義，幾乎全爲個人主義的思想之產物。可是，在集體主義的思想系統裡，是沒有這種思想容身之地的。一個社羣要實行集體制度，只能擴張到各個人目標都相同的那一範圍。我們又須明瞭，助使集體制度擴張的因素，都是特殊主義的因素，而且這種因素是具有排他性的。（所見深刻而透徹——海光）

的看法和想法相似之程度較大。在實行極權的地區，如果支持獨裁的團體內有的份子不是獨裁的首領所親自熟悉的，那麼獨裁的首領便從事訓練，使這些份子與一天到晚跟隨他的人是一樣的：一樣地想，一樣地說，並且所想所說是同樣的題材。這樣，獨裁者便可使這些份子與他自己同化，使他們都和他自己一致。當然，這類底辦法，要施之於精選的幹部是可能的；如果要在世界規模上來施行，則似乎不可思議。同樣，要在世界規模上實行集體制度，勢必困難重重。所有的社會主義者一致認爲，資本不應屬於個人，而祇應屬於國家所有。（但是，彼輩不知，在實際上，這類所謂的「國家」，常爲一個專政的黨所壟斷，或爲一個獨裁的人所劫持。結果，所謂「財產收歸國有」無異於收歸黨有或私有，例如現代共黨。——譯者）即使在國家以內，很少社會主義者敢於主張，應須剝除比較富有的區域之一部分資財，來幫助比較貧困的區域。復次，社會主義者對於國內人民所提出的諾言，並不能施諸國外的人。（英國就是如此——譯者）

集體主義的哲學有一項內發的矛盾。這項矛盾就是，當集體制度以人道主義爲根據時，充其量只能在比較小的團體以內實行。因爲，人道主義的哲學是從個人主義裡發展出來的。（嚴格言之，一強調集體，就無人道可言。有而且祇有從個人出發才能講人道。——譯者）直到現在爲止，在理論方面，社會主義是國際思想的。然而，一旦社會主義付諸實踐，無論是在蘇俄或是在別的國家，社會主義立即蒙上強烈的國家主義的色彩。當最大多數西方人士想像「自由的社會主義

事一個共同的行動。政治陰謀家往往在羣衆面前強調「敵人」如何如何可惡。他們所說的敵人，是一個變數，早晚市價不同。因此，無論是「猶太人」也好，「富農」也好，或外來的人也好，對於極權的首領而言，似乎都是不可少的武庫。

在德國納粹當權的時期，希特勒提倡排斥猶太人。於是，德國許多人把猶太人視作仇敵，直到猶太人底地位被德國財閥取代才罷手。這種行動，與俄國共黨之憎惡資本家因而選擇富農爲打擊之對象，如出一轍；在德奧二國，猶太人被看作資本制度底代表。德國人在傳統上不喜歡大部分人經商。因此，如果有人反猶，這種想法很容易被那些得不到較高位置的人所接受。德國人之反閃族主義（antisemitism）和反資本主義係起於同一根源。這一方面的知識，對於瞭解德國當時的情形非常有幫助。可惜，國外的觀察家很少把握到這一方面。

在許多地區，集體主義的政策成了一種普遍的趨勢；而且集體主義的趨勢又日漸國家化。我們必需研究，如果撇開任何形式的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集體制度能否實行。我們在這裡所說的特殊主義，也許是國家主義，也許是種族主義，也許是階層主義（classism）。（近之歷史主義者之提倡「歷史文化」，在思想路數上，也是一種特殊主義。這類做工，也許可替某類人打強心針，但其效果却與紅燈照類似。——譯者）

假若有人相信集體底目標和利益與個人的目標和利益一致，那麼似乎是預先假定人與人之間

以，相對於這類底人而言，獨裁者之計易於得售，因而也就易於得到他們底支持。在社會上，許許多多人觀念模糊，而且充滿了耳食。這種人底思想最易動搖，同時其情緒最易被激動。獨裁者利用這些弱點，可以擴大政治組織，並且提高其個人地位。（不獨現代極權統治者是耍弄這套手法；在歷史上，許多乘勢創「教」的人也是利用人衆這些弱點的。甚至到了現在二十世紀六十年原子時代，還有人想利用一般人常有的這些弱點來創「人文教」。照有科學頭腦的人看來，不如把它叫做「新白蓮教」更適合。——譯者）

第三、手法精煉的政治陰謀家之處心積慮製造一個組織嚴密和頭腦一致的團體來支持他，這也許是使壞人抬頭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因爲，壟斷權力者爲達到鞏固權力之目標而選擇份子的標準，邏輯地，當然只問是否「忠誠」，而不問賢愚。賢智而不「忠誠」，反爲其死敵。於是，只要對他或「組織」獻效「忠誠」，常可隨他或「組織」之「成佛」而「登天」。這樣一來，滿天飛者，盡是雞犬。到了這個地步，人衆要求活命，祇好奉雞犬爲神仙。最顯著的例子，是寫一本宣傳册子「大衆哲學」便可當「哲學教授」。其他依此類推。——譯者）就一般人底心理傾向說，比較容易支持反面的方案，而較少支持正面的方案。仇恨敵人，嫉妬比我們境遇較好的人，種種等等，也都是我們平常易於發生的心理傾向。極權的首領常常強調「我們」與「他們」之間的鴻溝，鼓勵大家仇視團體以外的人。凡此等等，都是爲了把自己底團體緊密聯繫起來，以從

海光）這樣一來，如果我們要求大家具有高度齊一的意志和相似的看法，勢必降低道德標準。這樣便合乎一般人比較原始的和「尋常的」本能及品鑑力。我們說這樣的話，並非表示大多數的人只有較低的道德水準；而只是說，價值標準相似的最大多數的人底道德水準是較低的，而且品鑑力也是較差的。（所以不得了也！——海光）如果推行集體制度時所需要的是多數人，並且要把這些人底人生觀科諸別人頭上，那麼這類底人永遠是品鑑力極高和極特殊的人。這類底人往往最缺乏原創能力，不能獨立思考和行動。他們實在別無所長，只是以人多取勝而已。（這可以說明共產赤魔採取所謂「羣衆路線」爲何得以橫決大地。在實際上，非自由民主的地域，常常是較無思想和遠見的人跨在較優秀的人肩上。所以，這種社會難以進步，只有日漸淪落腐壞。——譯者）

如果一個隱伏的獨裁者必須完全靠著某一羣人才能取得他底力量，而那一羣人又都頭腦簡單，祇有些原始的本能，並且可巧他們底頭腦和本能都是極相類似的，那麼他們在人數上雖佔優勢，實不足懼。彼等人數雖衆，不過被此獨裁者玩於股掌之上而已。此獨裁者不難藉著使更多的人信仰同樣簡單的教條來增加其徒從之數量。（所以，凡實行極權統治者，必加緊製造同一型模及同一內容的信念，藉以製造清一色的信徒。——譯者）

第二、在這個世界上，大多數的人自己並沒有堅強的信念。因此，如果有一個現成的「思想體系」，一再有人對他們灌輸，他們就會信以爲眞。這一類底人多半是馴良的，易受欺弄的。所

組織和訓練的。這類底團體一經建立，必定把它底力量科諸全體人民頭上。極權的首領首先集結這羣效忠於他的人在身邊，然後作爲統治工具，大家底災難就會臨頭。這樣，極權統治就形成了。（人爲的災禍也就形成。——譯者）

舊式的社會主義政黨曾爲其民主的理想所固蔽。他們沒有具備那些實現他們底目標所需要的狠氣。在德國和意大利底法西斯成功以前，社會主義諸政黨不曾掌握到政權。這是一件富有意義的事。他們不願全心全力地採用他們所指責過的那些不光明的方法。他們依然希望出現一個奇跡，大多數人會贊同他們組織整個社會的特別計劃。另外有一部份社會主義者則已經得到一項教訓，即是在一個從事計劃的社會中，組織社會的問題已經不復是大多數人是否同意的問題；而是一個最大的單一團體中之份子是否同意並且力足採取統一的步驟來處斷一切事情之問題。（譯者按：前者即西歐早期的自由社會主義者；後者就是自列寧以來所取一黨專權的辦法。）

吾人須知，在一個社會中，一個人數衆多，強而有力，並且具有統一看法的團體，並不常爲社會中較好的人所組成，而常爲社會中較差的人所組成。之所以如此，有三種主要的理由。我們現在分述如下：

第一、一般說來，各個人底教育程度和理知愈高，則各人底看法和品鑑力也愈不相同，因此各個人也就愈不容易產生一項共同一致的價值觀念。（所以，許多人討厭眞正的自由知識份子——

文化」乃過去主、客、內、外交互決定、反應、影響所成之實際，而單只把「精神」元素在思維中抽出以構成一單一的解釋體系所致。當然，這種蜘蛛網之編織，既可省事，又可自我陶醉於其中，收娛樂心身之效。惜乎不情之詞，或可以之愚愚衆，但無補於時艱也！——譯者）

現在，有許多人貶抑民主制度，並且實際在提倡極權制度。這一路底作爲，是從另一種主張出發的。我們現在要把這種主張討論一下。在現階段中，大家最具決定性的看法，是要求政府採取迅速而果斷的行動。許許多多人不耐煩看那迂緩而笨滯的民主程序。若干人以爲，實行極權制度的個人或政黨常強而有力，判斷果決，足以「迅赴事機」。因而，這種人或黨受到大家歡迎。這裡所謂的「強而有力」，不僅意指擁有數量上的多數而已。在議會政治中，衆口囂囂，效率低落，大爲一般人所不滿。大多數人所渴望的，是出現一個獲得有力支持的人，他能鼓起大家信賴，使他能遂行他所要做的事，這麼一來，依照軍事形式而組成的新型政黨，遂崛然而起。

在中歐許多國家，社會主義諸黨拿半軍事性的政治組織來訓練人衆。他們要用這類方法，儘可能地打消黨員底私生活。（譯者按：凡極權性的組織無不干涉私人生活。）在這類制度之下，一個團體掌握著掩蓋一切的權力。（於是，大家只有兩條路可走：反對，或者任其擺佈。——譯者）之所以要如此，就是爲了把軍事化的原則更加推行。這種團體不在選舉時經大多數人底支持而得到力量；只藉著較小團體之毫無保留的絕對支持而得到力量。這種較小的團體是經過徹底

究的，不是集體主義之道德基礎，而是其道德的實際結果。一般人對於集體主義之倫理的層面之討論，涉及一個問題，即集體主義是否爲現存的道德信念之所需。或者說，如果集體主義可以產生大家所希冀的實際結果，那麼我們所需要的道德信念是些什麼。時至今日，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是，集體主義組織的社會可以產生什麼樣的道德觀；或者什麼樣的道德觀才能維繫集體主義組織的社會。道德與制度是交互影響的。（一點也不錯。「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道德，只是藉抽離作用而得到的道德觀念而已。這種不受任何實際情況染色與分殊的道德，在實際世界裡是不存在的。如果以爲它存在，那麼就是把「道德的先驗」與「邏輯的先驗」混爲一談。而且唯有具經驗事實基礎的道德才可爲大家浸潤於其中的道德。如其不然，便是唯心玄談者之囈語。當然，囈語並非全無用途。至少，唯心玄談者可以自我逍遙於其中。——譯者）道德與制度之交互影響，使集體制度所產生的倫理，與引起我們需要有一集體制度的那些道德理想，二者完全相異。（此處吃緊——海光）有許多人常常以爲，我們之所以需要一個集體制度係出自一個高尚的動機，於是這種制度可以孕育出最高的德目。然而，在事實上，我們沒有理由來證明任何制度必定跟著我們底理想走。（世之唯心玄談狂人昧於此理。彼等喜馳幻念，以爲世界——非地球——係精神發展之形跡。既然如此，吾人可依照一理想圖樣或線索以建構一實際世界；或者，實際世界可依其單一的幻想曲而發展，亦若建屋者之依據藍圖然。這種玄想之形成，係昧於所謂「歷史

日趨枯萎。風俗習慣常爲極權統治之障礙。因此，只要極權統治一行，也必至破壞該地風俗習慣。獨自的思想判斷與極權統治下之毒格碼 dogma 尤能並存。所以，祇要極權統治一行，獨自的思想也一定歸於消滅，至少不能發展。……總而言之，極權統治猶如癌症。癌症靠著破壞人體良好體素而擴延。同樣，極權統治靠著對社會處處敗壞與毀滅以維持其存續。所以，任何社會開始讓極權者統治的一天，即是敗壞與毀滅發端之時。癌症致人於死才止。同樣，極權統治必置社會於敗盡毀絕之境才止。這由共產統治得到證明——譯者）因著這種理由，所以，在一個趨向於極權制度的社會之中，魯莽粗放和肆行無忌的人比較容易得勢。（眞是一語中的。近五、六十年來許多政治的激變中所表徵者，地無分東西，幾乎全係如此。這等人物，固可造成煊赫之聲勢，掀起巨大之波瀾，甚至樹立巍峨之殿宇，然而，一究其實，多爲個人之勳業，及團體之榮枯盛衰。彼等從來不知如何妥善解決問題。恰恰相反，彼等之得勢，祇有加深並擴大原有的病疾。不僅如此，彼等自身不旋踵又成爲問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巧說競立，勢力競張，旗幟競樹，覆雨翻雲，禍亂不已，如何得了？——譯者）如果我們不瞭解這一點，便不能瞭解極權制度與自由制度之間的鴻溝，也不能瞭解在集體制度之下的整個「道德」氣氛與個人思想盛行的西方文明中道德空氣二者之間的基本差異。

所謂「集體主義底道德基礎」究竟是什麼，在過去曾有熱烈的討論。但是，我們現在所要研

的「法西斯制度」大不相同。無疑，如果從民主制度過渡到極權制度而且不經過那施用暴力的階段，那麼可望出現一種較佳型式的領袖人物。而且，如果我們被注定了不得不生活於法西斯制度之下的話，那麼我們無疑一定選擇由英國人或美國人所建立的法西斯制度，而不願生活於任何其他的人所建立法西斯制度之下。（妙！——海光）然而，無論我們是生活在英美人士所建立的法西斯制度之下也好，還是生活在任何其他人所建立的法西斯制度之下也好，從我們現在所訂立的標準來看，二者俱不足以表示，一旦我們實行法西斯制度時，到頭來比法西斯制度底原基型式有什麼大的差異，或者更富有寬容精神。（是！——海光）許多強有力的證據可以證明，目前呈現於我們眼前的極權制度之種種惡劣的特點，並非極權制度偶然發生的副產物，而是極權制度遲早必至發生的結果。吾人須知，即令是民主的政治家，如果在一開始的時候就爲一般人底經濟生活而實行計劃，那麼，演變所及，他必至面臨一項抉擇，即是要麼他僭取獨裁權力，要麼他放棄計劃經濟。同樣的，一個人如果實行極權統治，他馬上也會面臨一項抉擇，即是他要麼不顧通常的道德肆行無忌，他要麼坐待失敗。（但是，沒有實行獨裁極權的統治者自願選擇失敗的，所以他鐵定地要選擇敗壞道德或一切倫理建構這一條道路。因此，只要極權制度一行，無論以什麼政治組織底形式出現，社會道德一定日趨敗壞。推廣來看，極權統治與社會自發的生機也是不相容的：社會自發的生機洋溢，則極權統治枯萎。所以，只要極權制度厲行，則社會生機一定

偶發的事件；而與極權制度底本身無涉。所謂歷史上的偶發事件，即極權統治迄今乃由流氓惡棍和刺客兇手建立起來的。有許多人說，極權統治之在德國建立，如果致令像希姆萊這一流的人當權，這只能證明德國人底品質惡劣，不足以證明極權制度惡劣。如果有的政治制度與極權制度相似，而且它又是達到吾人重要的目標之所須者，那麼爲什麼因噎廢食，不可讓那些爲整個社會謀福利的君子人來實行呢？（這是最幼稚而且最危險的想法——海光）

然而，我們不要自欺，我們不要以爲一切好人必定是民主思想者，（對！——海光）；而且他們也不一定是想在政府中佔有一個地位的人。毫無疑問，有許多人無寧要把這種達到良好目標的極權制度付託給比較勝任的人。雖然這種辦法也許是不智之舉，可是，贊助一個好的獨裁或極權制度並非一件壞的或不名譽之事。我們老是聽到人說，無論把極權制度用來行好事或行壞事，極權制度乃一種強有力的制度。至於行極權制度時所要達到的目標是什麼，完全唯獨裁者是賴。（危險就發生在這裡。任何種類底政治機構，如果不受人民底控制，則將如脫繮之馬，牠高興跑到哪裡就跑到哪裡，甚至把主人扔下來，踏於脚下。——譯者）有許多人以爲極權制度本身並不可怕，只怕它落入壞人之手。他們甚至怕這種制度將來操諸好人之手時也會發生這種危險。所以，他們要搶先一步，壟斷這種制度。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如果美國或英國實行「法西斯制度」，那麼將會與意大利或德意志型模

原則上的瞭解。依照海耶克教授底解析，至少從一方面看來，極權統治底形成是順著「惡貨幣驅逐良貨幣」這條法則而發展的。凡極權統治之形成，無不藉助於人性之醜惡的一面。因而，它拿壞人制服好人；拿愚人來管轄明白的人；拿阿附的人排斥骨梗的人；拿黑良心的人對付善良的人；拿應聲蟲來掩沒諤諤之士；拿短視之徒來阻抑遠見之士；拿無志氣的人來挫磨有志氣的人；拿流行的官腔來堵塞智者之口；……。凡此諸般「美德」，俱可自蘇俄類型的社會分析出來。極權統治是最原始野蠻險惡的思想，利用現代科學技術來推行的統治。試想虎狼如能使用原子武器，其危害將爲何如？今日自由人所遭逢的厄運是空前的，因而自由人所需之振奮程度也應是空前的。

壞人爲何得勢

當今之世，有許多人以爲極權主義之來臨，乃一項無可避免的事情。既然極權主義之來臨無可避免，因此我們只得逆來順受。這種看法，係從一項信仰裡產生的。這項信仰，却嚴重地削弱了許多人對於極權主義的反抗勇氣。如果許多人充分認淸了極權主義底眞面目，那麼他們會出全力來反對極權主義的。可是，既然有一種信仰很嚴重地削弱了許多人對於極權主義的反抗勇氣，因此我們必須對於這一項信仰加以考察。這項信仰就是說，極權統治最可惡的地方，在於歷史上

壞人爲何得勢？

——海耶克教授著《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 Hayek）之第十章

權力趨於腐壞，絕對的權力則絕對地趨於腐壞。

——阿克頓（Acton）

譯者的話

在「壞人爲何得勢」（Why the worse get on top）？這一章裡，海耶克教授對於極權統治底形成提出許多看法（visions）。我們從他所提出的看法，可以對於極權統治底形成得到

無怪乎一般人越來越覺得，如無經濟安全，自由是「不值得有的」東西，而且必需犧牲自由以獲安全。（這是人生底大悲哀——譯者）

毫無問題，實行適度的經濟安全以免除過分的物質貧困，並且設法減少經濟範圍中那些可以減少的錯誤因素，以及令人失望的結果，凡此等等，仍爲我們所應採取的政策之主要目標。但是，假若我們要使這些努力得到成功，而且又不致犧牲個人自由，那麼，實現經濟安全的措施，必須在不破壞自由市場制度的原則之下行之；而且同時應該聽任自由競爭制度繼續發生其作用。現在，知識界有許多領袖人物讚揚犧牲自由換取安全。事之可悲，孰甚於此！時至今日，我們必須坦白面對一項事實，即是自由之保持，必須我們各個人準備犧牲相當的物質利益。如果要保持自由，我們必須記取自由國家賴以建立的信念。這一信念，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說得很明白：「凡出賣基本自由以冀獲得暫時經濟安全的人，既不配享有自由，又不配享有安全。」自由邦國及自由個人，應三復斯言。（至爲重要啊！——海光）

附記：本章有所刪節。

社會上原來的價值觀念已經大爲改變，因而社會建構也就朝著與原來不同的方向發展。

社會結構變化，安全的理想獲勝，獨立自由生活的觀念失敗。這一變化，與三、四十年前英國或德國型式底社會比較一下，便最足以說明。自由精神是否在任何地方可被暴力撲滅，這是一件值得懷疑的事。但是，任何人不易抗拒曾在德國慢慢施行的那一套辦法，則爲無可置疑之事。（作者所見，較之玄談「心性」與觀念世界中的「人格」者流之所玄談者，切合實際得多。過去散漫社會的道德律令及依之而決定的行爲準則，已經有些不適用於今日之世。今日猶要個人以血肉之軀而與「魔鬪」，或如過去時代之本著「氣節」與「良心」與現代極權統治技術作以卵擊石式的周旋，這完全是在觀念構成的雲端裡唱高調。這種高調之不適於今日之世。從唱之者從無一人能夠親身實行可得證明。人不是爲觀念活著，觀念是服務人生的工具。我們今日所需要的，是適應新情勢的新價值觀念，和可行的道德倫理標準。——譯者）當著一個人只有做政府底薪給僕役才能得到社會地位時，他做政府所指派的事，較之做對自己有用處的事，要來得受人稱許些。反之，如果他所做的事未得官方承認，那麼便被認爲沒有價值，甚至是可恥的。這樣一來，一般人就更談不到選擇自由而不選擇安全了。如果我們大家過著這種俯仰隨人的生活，那麼只有少數人才不去犧牲自由以換取安全。一旦事勢發展到了這個地步，則所謂自由也者，不過成一笑柄而已。因爲，到了這個地步，所謂自由，祇有犧牲世上許多美好的事物才能購得。在這種情況之下，

濟，是現代極權暴政最厲害的對內武器。凡屬不接受共產制度的人，都應毫不遲疑地棄絕這種經濟制度。——譯者）這樣一來，安全之代價，勢將益愈增高。復次，如果享有特權者之數目增加，而且他們底安全與別人之不安全二者間的距離增加，那麼就有一種全新的社會價值觀念慢慢成長起來。在這樣的社會裡，個人地位之獲致，並不靠著自我獨立，而係有賴於安全。因此，一個年輕人想要結婚，並不靠他有否爲社會謀福利的能力，祇問他能否得到贍養費。（此法一行，天下皆然——譯者）

在許多地方，藉著管制方式來獲得經濟安全的辦法，爲政府所容忍，或爲政府所支持。這一類底辦法，在時間過程中，可以逐漸改變社會結構。這種改變社會結構之發展，因社會主義之推動而加速。馴至今日，年輕的一代大都唯選擇安全是務。很少人願意去冒經濟活動所可能產生的風險，年輕的一代選擇安全，我們是不能加以責備的。當他們從前一輩的人哪裡獲悉拿薪水比自己從事企業穩當時，而且拿薪水又並非自利自私之舉時，他們當然不肯去冒從事企業的風險而選擇有薪給的職業。時至今日，年輕的一代，是生活在另外一種世界裡。在這種世界裡，無論在學校中，或報章上，都流行一種空氣，認爲商業上的進取精神是不名譽的，獲取利潤是不道德的事，僱用許許多多的人是剝削的行爲。但是，在另一方面，對千千萬萬的人下命令，則又認爲是榮譽的事。（妙哉！——譯者）大學教授們憑其日常的經驗可以告訴我們，由於反資本制度，結果在

應該受到保障，出品底價格和職業收入也應該受到保護。果眞如此，就業問題和生產問題便會起激烈波動（一點也不錯——譯者）。吾人需知，對自由競爭一行「管制」，則一羣有勢力的人便得以藉機剝削一羣弱小的生產者。一個階層之剝削另一階層，從無如此之殘酷者。（譯者按：實行統制經濟，就是一羣人藉著政治力量剝削他人的制度。這種制度一行，則昔日游離性的經濟反抗行動，彈性的改善辦法，將一掃而光。誰說實行統制經濟能實現公平經濟？）

所以，我們愈是想藉干涉自由市場制度來獲致全般的經濟安全，則所得結果愈不安全。尤爲惡劣者，官方給予特權者之經濟安全愈多，則未給予特權者之不安全益愈多。於是，這二種人之間的不和將益愈大。經濟安全之事，如愈成爲一項特權，則得不到經濟安全者的危險將益愈增加。（在極權暴政之下，經濟安全與政權構造有直接的關聯。在類似蘇俄的地區，有而且祇有擁護或至少不反對共黨政權者才獲有經濟安全。共黨政權拿擁護其政權作爲唯一而且最高的尺度，來形成一個經濟安全底級序：經濟安全底程度與人對共產政權底效用價值之大小成正比——愈是對共產政權底效用價值大者，其經濟安全愈大；反之則愈小。至於對於共產政權稍示不滿或反抗者，則剝奪其生存權，打入奴工營，榨盡其僅餘的體力，折磨以死。在蘇俄，大黨務工作者、大「歷史博士」、大將軍，對其政權之效用價值最高，因而待遇最好，有最豪奢的享受。中等人物次之，小人物更又次之。其間級序分別之明，儼如北平天壇之石階，歷歷可數。這樣看來，統制經

在管制的社會中，所謂經濟「控制」，意即限制生產，俾生產品可以賣得「適當的」價錢。這種辦法是生產者在市場經濟中保證獲得某種程度的收入之唯一的方法。可是，這種辦法一行，固然可使特殊行業得到安全，却減少了別人收入之機會。如果生產者必需受到保護，以免受到別人殺價的影響，那麼，這就無異於說，處境不利的人，在管制的工業中不應享受較大的利益。（在所謂「國有」與「國營」的經濟中亦然。——譯者）吾人須知，對於加入任何行業的自由之每一限制，便是減少所有在這行業以外的人之經濟安全。復次，由於限制政策而得到收入的人數增加，則因不被保護而沒有收入的人謀生的機會便愈來愈少。（這種現象，在一個實行統制社會中，只有愈來愈加嚴重。——譯者）如果某一行業所享條件日趨優良，而且其中份子可以排斥他人以便自己獲得優厚的利益，那麼其他行業之營業不振者，勢必走頭無路；並且，每一次變動便產生大量失業者。無疑，這些結果，乃近年來用限制政策這一類底辦法以求經濟安全所弄成的。

在英國，諸如此類的限制，尤其是那些影響社會中層結構的限制，其全般的後果何如，我們還沒有充分的認識。在一個日趨嚴酷的社會中，職業無著的人最後失望之情，祇有切身經歷的人才能領受。這樣的人，與因受到保護而不從事自由競爭的人之間的距離之大，也只有身歷其境者才明白。所以，實行限制政策、統制政策，一究其結果，我們所遭遇的問題，是如何使得大家在不肥彼而瘦此的條件之下獲得經濟安全，並且又能夠徐圖改進。有些人以爲他們底「生活水準」

人昧於此理，瞎搞一陣。所以，所得結果，有時適得其反。——譯者）

許多社會主義者受一項理想所騙，他們想把我們底社會組成一個單獨的大工廠。照我們看來，假若我們所想的社會遠景是這麼一幅圖象的話，那麼我們最好回溯古代的斯巴達，或者看看現代的蘇俄。像蘇俄的邦國，目前的情形，眞是夠瞧了。照這個樣子發展下去，再過兩三代，將不知成何光景！

在過慣了自由生活的社會裡，也許並沒有太多的人處心積慮拿自由來換取安全。可是，現在有許多強調經濟安全重要的地方，有時在這個團體中實行安全措施，有時在那個團體中實行安全措施。這種政策產生了許多條件，使爲安全之實現而奮鬪的情形遠較爲愛好自由所作努力之進度迅速。之所以如此，係因如對某一團體界予完全的安全，必至增加其他團體之不安全。至於自由競爭制度，則可滋生經濟安全底某些基本要素。而且在自由競爭制度之下，經濟上的重大變動，可以慢慢減少。（至於在統制經濟之下，經濟上的變動，可藉政治力量之操縱，突發於一夜之間。但是，奇怪得很，許多人寧願送走自由經濟之下較少的痛苦，而迎來統制經濟之下較大的痛苦。之所以如此，其唯「理想」在作怪乎？「主義」在作怪乎？恐怕根本是理知不夠所致。理知不發達的地區，「理想」與「主義」才能代替神話以作怪。有而且唯有理知發達，才能因減少無謂的妄想而減少無謂的犧牲。要理知發達，厥惟發展科學。其他都是旁門左道。——譯者）

人底自由一定大受限制。所謂「階級服從」的軍事生活，就是如此。這種安全，乃兵營式的安全。（譯者按：階級服從的軍事生活，乃施之一部分的人之一必要的惡 necessary evil 。若以此施之於社會上的人，則此社會不是弄得非常僵固，便是弄得非常麻木。這樣的社會，可能外表整齊壯觀，內容一定冷酷乾枯。）

當然，我們可能在軍事原則之上組織另一種形式的生活。這種形式的生活也必至限制個人底自由。不過，我們沒有理由說，如果有人願意入殼的話，這種形式的生活不可加諸其身。的確，有許多工人曾自動服役疆場。類似這種情形的情形，也許是政府使人工作並且給予最低酬報的最佳示範。過去有許多人贊同這種形式的生活。然而，就事實看來，這種形式的生活究竟不大爲一般人歡迎。在事實上，願意犧牲其自由以獲致安全者，常常要求，如果他們放棄其全般的自由，那麼必須取之於那些未準備放棄自由的人。（一語中的。所以，奴隸常被編組著與自由人爲敵。奴隸之所以敵視自由人，在潛意識中，係嚮往自由而不可得。此與貧人無綢衫可穿便扯破紳士底綢衫相似。——譯者）

就我們所知，軍事型式的組織，如果擴及社會全體的話，其結果如何，實不堪設想。祇要社會底一部分被納入軍事組織之中，那麼在此軍事組織中不自由的分子，常要設法緩和其不自由。在戰事組織之中，如果種種限制太令人厭憎的話，那麼許多人總要設法找些旋迴的餘地。（很多

破產要嚴重得多。在一個被管制的社會中，祇要他把上司逢迎得好，他在經濟上總歸可以得到安全的。當然，他這種安全所付代價，乃自由與生命之安全。（這一番話，說盡了管制的社會內層之辛酸。在世界任何角落，凡依照這種方式來導演社會活動者，遲早一定把這個社會變成一個標準的奴役社會。——譯者）。

從一種角度看來，我們可以把社會分作兩種。一種社會可以叫做商業性的社會；另一種社會可以叫做軍事性的社會。我們現在要對於這兩種類型底社會之間的衝突加以研究。的確，這兩種類型的社會之間的衝突，是兩種不相容的社會組織之間的基本衝突。大體說來，商業性的社會是自由社會；軍事性的社會是被管制的社會。我們今日確乎面臨一項選擇，即是不選擇自由制度，便是選擇管制制度，此外別無他途可循。在軍事的社會組織之中，工作爲官方所規定，工作者爲官方所派定；而且，如果官方行事時所可選擇的便利之餘地很少的話，那麼就把大家置於困窘之境。（此言是千眞萬確。因爲，一個不受人衆控制的管制機構，其行事也，當然以便利一己爲基本著眼點。在事實上便於官者常不便於人衆。所以，人常被置於困窘之境。在情勢不利或經濟不豐時，水落石出，此點尤易顯露。例如，增發紙幣，對官有利對人則爲橫征；再如，官家要出國旅行，易於反掌。人要出國旅行，則難如上靑天，就東德情形即可知曉……。——譯者）當然，在這種社會制度之中，個人是具有「經濟安全」的。可是，大家即使得到這種經濟安全，各

裡，或者是在經理部門中，都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一般所謂計劃經濟，就是將工程技術應用於整個國家，假若將工程技術應用於整個國家，便會引起許多不易解決的問題。對於工作人員和工人的訓練問題，便是其中之一。

關於這個問題，一位美國工程師描寫得很好。這位工程師在政府部門中工作，對於實行計劃之事很有經驗。因此，他把這個問題看得很清楚。他說：「爲了要實施一項工程，必定有許許多多未曾計劃到的經濟行動圍繞此項工程。因此，我們必須留出一個地位，使工人源源而來。可是，當一個工人被開除時，他便失掉工作，並且得不到酬報。如果沒有種種自由的旋迴餘地，那麼對待工人就必須像對待奴工一樣，要施以體罰才行，否則不能維持工作紀律。」

在行政工作範圍裡，懲戒怠忽工作者的問題，形式雖有不同之處，但究都屬嚴重。有人說，自由競爭經濟之最後的歸宿是執行吏，計劃經濟之最後的制裁便是絞刑吏。任何一種經濟中，經理部門所掌握的權力仍然是很大的。但是，在計劃經濟的制度中，經理人員工作所獲盈利或所遭風險都不關他自己的事。既然如此，他個人不能判斷採取何項工作方針才好。他所面臨的問題，只是他是否應依既定規律行事。至於他「應否」避免某項錯誤，這就不是他自己底事了。因爲，在這樣的社會，個人自作主張，乃違反團體之事。他只要謹守本分，就可以較在資本制度的企業之下能保牢他底地位和收入。因爲，眞正的失敗，對他所引起的危險和威脅，比在自由社會宣告

必至同工者不得同酬。如果同工者不得同酬，那麼就不復能激勵大家作有益於社會之事，甚至使各個人不能判斷作什麼事才會招惹官家底麻煩。（眞是「天下烏鴉一般黑」！祇要官方實行專斷權力——什麼事都是自作自主，則地無分東西，結果都是如此。在官方底專斷權力束縛之下，人人如墜入蛛網之蚊，動彈不得，做任何一件小事都是礙手礙脚的。如果說這個樣子的社會眞會發生什麼力量，來從事什麼大的作爲，那等於說月亮光會曬死人！——譯者）

金錢方面的酬報和懲處，與各人主觀的功績沒有必然的關聯。任何社會常需變更不同行業的人之分配情形。但是，這種變更，如不復能藉金錢方面的「酬報」或「懲處」來實現，便須直接出於命令。饑不擇食者流，常希望得到有穩定收入的職位。然而，他不知道，當一個人底收入有了保證以後，他既不能僅因他喜歡其職業而被允准長留其位，也不能因他喜歡別的工作而自行選擇別的工作。這是因爲，他移動其位置或不移動其位置時所造成的利益或損失並不由他負擔。既然如此，那麼，他是否可以轉業，其權當然操之在控制分配的人之手。（譯者按：在蘇俄等等實行所謂「計劃經濟」的地區就是如此。）

在這個樣子的世界裡，事實上，除非一項工作與我們自己底利益直接攸關，否則很少人願意在這項工作中貢獻全部的力量。至少，就大多數的人而言，如果要他們在工作上作最佳的貢獻，那麼也需要某些外在壓力。因此，在這種意義之下，外界的刺激問題，無論是在尋常的工作範圍

於他人的損失之上。這樣一來，他人底經濟安全便爲之減少。如果我們希望大家獲致收入穩固不變之安全，那麼只有在選擇就業時犧牲一切個人自由。這是一件顯而易見的事。不過，這件事祇是常常被當作一項理想來看待，並沒有認眞地全面嘗試過。在一般情形之下，許多人以枝枝節節的的辦法來獲得這種安全，即從這一部份做到那一部份。結果，大家所得到的這種安全，是枝枝節節，顧此失彼的。這麼一來，難免有一部分人得不到安全，而暴露於風寒之下。暴露於風寒之下者，其不安全，必與日俱增。這樣發展下去，我們爲安全所需付予的代價時常增加，而安全之需要也就日趨迫切。馴至到了後來，支付任何代價以求安全，亦在所不惜；即使付出自由的代價，也在所不惜了。（由此可知，在這樣的情境以內，寶貴的個人自由可能於不經意之間溜走。眞是危險！——譯者）

在人底社會中，許多人底用處係起於那既不能預見又無法控制的情況。這些人底用處是須受到保障的。因爲，如果不予保障，便會遭受損失。可是，在另一方面，又有許多人底用處也是由同樣的情況而得到。但是，他們却常常沒有受到相同的保障。在這樣的對比之下，這兩種人所得到的酬報，與他們底實用價值便是毫不相干。於是，酬報之給予，及其價值爲何，全憑官方底看法而定。官方認爲一人應作什麼，他底動機是好是壞，乃決定酬報之條件。

我們必須明白，官方作這些決定，大部分不過是行使專斷權力而已。運用專斷權力底結果，

在各人得以各依自己底志願從事行業的任何制度中，各該行業內各人所得酬報，係依其工作對社會其他分子的用處而定。即使他們底酬報與主觀所要求的功績無關，也是如此。大致說來，我們工作所得酬報往往依努力之程度而定；可是，並非在一切形式的社會中皆係如此。吾人需知，在許多情形之下，某種行業，或專門技藝，其用途係依不能預見的情境而定。在這樣的社會，我們底努力之酬報爲何，頗不易定奪。如果某種發明新出，並對社會其餘部份的人大爲有利。但是，這樣一來，却使科學訓練極好的人原有的高強技巧立刻失去價值。在這種情形之下，此人處境之悲慘，實不難想像。過去百年來的歷史，充滿了這類事件。有許許多多人底發明，曾煊赫一時，影響著千千萬萬的人；但時過境遷，後來居上，便顯得黯然無光了。

在社會上，如果一個人並沒有犯什麼錯失，但其收入銳減，而且因而陷入失望的深淵；即使他工作勤苦而且技術優異，他還是不能逃出這種厄運。這類情況，無疑是我們底正義感所不許的，在這種情況之下，受苦難的人之需要，合法利得之保障，如由政府來協助解決，當然會獲得大多數人底同情和支持。政府之採取這類行動，不僅保護了生活艱困的人，並且助使他們繼續得到從前的收入；同時又保障他們，使他們免於因市場波動而遭受損失。

吾人須知，即使每個人可以自由選擇行業，並不足以保證他們底收入穩定。如果政府設法保證這些人底收入穩定。那麼他們底收入之穩定就變成一項特權了。而此項特權之獲得，難免建立

我們不難看出，有許多經濟安全計劃足以徐徐危害自由。這種安全計劃所要實現的經濟安全，實在是另一種經濟安全。這種經濟安全計劃，係爲了保障少數人所不應享受的特權。在這種經濟安全計劃之庇護下，有許多人底享受和收入，在自由社會中，是不配享有的。（所以，在自由世界以外，高談「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的，多爲官方。這與強調「計劃教育」，如出一轍。「計劃」一詞，只是文飾的字眼而已。一究其實，不過是蛇纏蛙罷了。統治機構藉著「計劃」把社會纏著動彈不得，供其徐徐吞食。「計劃教育」則爲蛇口裡放出的毒液。貽禍百代！——譯者）他們底享受，在自由社會中，得不到道德上的證明。而這種道德上的證明，又與自由競爭制度是不可分的。認眞說來，像這個樣子的經濟安全之要求，不過是要求酬報底另一形式而已。這種酬報，係由其主觀的功績而定，而非依各人底努力所產生的客觀價值而定。（譯者按：在泛政治主義的建構之下，經濟安全，更明文地作爲政治酬報之一。例如，共產黨徒在所謂「革命成功」以後，一切衣、食、住、行，甚至配偶，都由「組織上照顧」。「高級官員」，更是享受超凡。在一個自由競爭的社會中，這些人配嗎？一點也不配。因爲，他們祇會陰謀、搗亂、煽動、破壞、呼口號、講符咒、搞組織。這些玩意，在自由社會中，一點價值也沒有。大家避之有若蛇蝎，誰還會予以酬報？但是，從共產組織看來，這些玩意，大有政治價值，所以幹這些玩意的人得到經濟安全作爲酬報。）

非在一切情況之下有害。問題主要在把集體行動看作目標還是看作手段。如果把集體行動看作目標，那簡直是現代的人爲災禍。如果把集體行動看作一種手段，那麼也得明文規定集合人衆底方式以及所須從事的種類。如其不然，三彎兩拐，也很容易變成極權統制。「集體」與「極權」，乃如影隨形之兩親家也。如欲保障自由，吾人得隨時防制二者之結合。——譯者）

有人常說及經濟行爲之一般的波動，以及這種波動一再引起大量失業現象。關於這類問題，一直引起廣泛的論戰。這些論戰，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嚴重的和最緊逼的問題之一。雖然，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採取在好的意義之下的許多計劃行動，但是却不需照著許多人底想法，拿別的制度來替代自由市場制度。有許多經濟學家希望在貨幣政策範圍裡來求此問題之最後的解救。這種解救辦法，與十九世紀自由主義不相衝突。另外有些經濟學家相信，要眞正解決這個問題，只有以高度的技巧大規模地調整公共事業。這種辦法，也許會嚴重地限制自由競爭制度；並且，在實驗這種辦法時，如果我們要使一切經濟活動免於日趨倚賴政府之管制與津貼之弊，那麼我們就得寸步留心。不過，照我看來，這種辦法，既非解決對經濟安全之威脅的唯一辦法，又非有成功希望的辦法。談到這裡，我們底討論就歸到一個重點：在任何情形之下，我們一方面要採取種種措施來防禦經濟波動；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們又得設法防制這些措施，使之不致引起那些威脅自由的計劃。（這也須在一民主的建構上才有實行之可能——譯者）

小心處理的話，也許會產生嚴重的政治問題；也許甚至產生危險的政治問題。當然，無論怎樣，最低限度的食物、住宅、衣服，換句話說足夠保持健康和維持工作能力的經濟條件，是應能確實保證給予每一個人。

在人生的過程中，我們常可遇見許多困厄的事件。這類事件，其來也恆起於不意之間，於是很少有人能夠應付裕如。如果有人以爲政府不應協助私人解決這類事件，我們實在是想不出任何理由。假定我們碰上疾病與意外之事，並且想要避免它，或努力克服它所產生的惡果。在這種種情形下，如果政府予以協助，並不見得一定會削弱我們在這些事情上努力底程度，也不見得會妨害我們底基本自由。事實上，對於這類底情況，我們極其需要設立一種廣泛的社會保險制度。

時至今日，有些人想保存自由競爭制度；有些人則不同意自由競爭制度之下的某些細節，而想別立制度來超過自由競爭制度。關於這些問題，有許多細節尚待討究。不過，無論怎樣，在目前所用社會保險制度的名義之下，採用了許多計劃與方法；而這類計劃與方法使用起來，可能使自由競爭日趨失效。但是，從原則上來看，政府藉著這類方法給個人以較多的經濟安全，這與個人自由之保持是沒有什麼太大的衝突的。同樣，如果藉政府底力量來幫助私人免於像地震與水災這類的災禍，個人底安全固然因之而增加，但也無妨於個人自由。假若只有靠集體行動才可減免災害而個人則無能爲力時，那麼，毫無疑問，這樣的集體行動是應須採取的。（可見集體行動並

濟安全，而且這種經濟安全不應視作一項特權——當然，除了少數特殊例子以外，例如法官可以享有絕對的經濟安全。在自由社會中，最重要的事，便是各人底經濟完全獨立。上面所列舉的兩種經濟安全是具有不同的作用的。第一種經濟安全，可以抵抗嚴重的物質貧乏；第二種經濟安全，是規定生活水準，或者規定一人或一個團體與另外一人或一個團體之相對的生活地位。或者簡單地說，前種經濟安全乃保障各人最低限度的收入之安全；後種經濟安全乃規定一個人所應享的特殊收入之安全。話說到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這兩種經濟安全之間的區別，與下面所說的兩種經濟安全之間的區別，大部符合。有一種經濟安全，可以給市場制度以外但相對於這種制度有所助益的一切人以經濟維繫。另一種經濟安全，祇能經由一部份人底利益；而且這一部份人底經濟安全之獲致，祇有藉控制市場，或者消滅自由市場。（所以，如果我們對爭取經濟公平，與應控制經濟制度以人為的方法造成更大的經濟不公平。——譯者）

在一個社會中，如果大家獲致了一最低的財富水平，我們便得到第一種經濟安全。我們想不出任何理由來說，在這樣的社會中，我們也可以在不危害普遍自由的條件之下，不能保證所有的人得到這種經濟安全。當然，至於我們大家應該得到經濟的安全之精確的標準是些什麼，這是有許多困難問題的。在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人特別信賴社會。這些人是否應該像其餘的人一樣，也無限制地享受同樣的一切自由，這是一個特別值得討論的問題。對於這類問題，如果我們不

安全與自由

許多人往往認爲，經濟安全像虛擬的「經濟自由」一樣，是實現眞實自由之不可少的條件；並且更公正。這種看法，在一種意義之下，是眞的，而且頗爲重要。凡不能確實自主自立的人，其心靈很少能夠獨立，其人格亦難發揮何種力量。但是，我們必須弄清楚，在這種場合，所謂「經濟安全」這一名詞，其意義之含混，較之大多數其他名詞，或尤過之。正因如此，一般人對於經濟安全的要求，可能就威脅著眞正的自由。（可見語意是否清楚，與實踐利弊底關聯之大，此理不獨於經濟爲然。同樣，世之不明語意學 Semantics 而高談「文化」與「哲學」者，鮮不製造糊塗語言。以糊塗語言臨糊塗界域，豈有不越弄越糊塗之理？——譯者）的確，當著我們把經濟安全一詞底意義看得絕對狹隘時，那麼我們爲經濟安全所作的奮鬪，並不能增進自由的機會；恰恰相反，這類行動反而會重大地威脅著自由。（對極了！——海光）

我們現在開始討論的時候，最好將經濟安全分作不同的兩個種類：第一、有限度的經濟安全。所有的人都應該得到這種經濟安全。在這種經濟安全之下，誰都沒有特權可言，大家只能滿足合法的物質需求。第二、絕對的經濟安全。在一個自由社會中，並非所有的人都能得到絕對的經

安全與自由

——海耶克教授著《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 Hayek）之第九章

譯者的話

社會主義一經實行，則整個社會會變成一個單一的機關，和一個單一的工廠。在這單一的機關和工廠裡，所實行的是同工同酬。

在一個國家裡，如果政府是唯一的雇主，那麼，誰要反對這一雇主，他就得準備慢慢餓死。古老的原則是說：不工作者不得食。可是，時至今日，這個原則却爲一個新的原則所代替：凡不服政府者，即不能得食。

則厭棄這個「主義」。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爲，這類國家多採「政權第一」主義。既然如此，一切好處自然多歸居於統治地位的份子享有。被法者只能分得殘粒。這一對照，是社會主義底一大諷刺。）工人運動中比較得到利益的部分，與其說是屬於被剝削的階層，無寧說是屬於新的剝削階層。（至理！——譯者）

由於中下階層分子之怨望社會主義，法西斯和國家社會主義遂因獲得大部分人的支持者而得到力量。

附記：本章有所刪節。

即資本家和產業工人。社會主義之建立，有賴於舊式的中產階層之迅速沒落。但是，社會主義者却全然忽視新的中產階層之興起。這裡所說的中產階層，意指不計其數的書記、打字員、教員、和小文官等等。在某一時期，這一階層的分子往往做工人運動底領袖。但是，當著他們一天一天地明白他們底地位墜落到不及產業工人時，則社會主義革命的理想對之不復具有支配力。固然，中產階層分子在不喜歡資本主義制度時，並且希望依照他們底公平觀念來分配財富時，他們可以說都是社會主義者。但是，他們這些觀念與舊式社會主義黨派底種種設施中所表現的觀念畢竟大不相同。

老式社會主義者用來獲得一個職業集團支持的種種手段，並不能用來獲得所有集團之支持。這樣一來，必定發生許多彼此抗爭的社會主義運動。這些運動企求獲得那些地位被降低了的人之支持。我們常常聽到人說法西斯和國家社會主義都是一種中產階層底社會制度。這話也不無道理。近代產業工人運動產生了工人貴族。於是，許多利益遭受損害的人起來反對工人貴族。法西斯運動遂得乘機而起。

舊式社會主義者總以爲他們底黨是將來普遍的社會主義運動之矛頭。他們不知道，他們多用一次社會主義的方法，窮苦人衆便對他們多失望一次。（譯者按：在許多所謂「社會主義的國家」，贊成「實行社會主義」者，主要係居於統治地位的官吏及衞士。而大多數窮人，久而久之，

社會主義運動是直接爲了某一特殊集團之利益而掀起的，並且是想把此集團之利益提得比其他的集團高。可是，在朝社會主義趨進的歷程中，如果每個人都逐漸明白，他底收入和地位是被政府底鎮壓機構所決定的；而且，如果他成了那能控制政府機構的政治組織之一員，他也能保持他底地位，甚至改善他底地位，那麼社會主義運動發展到了這一步，就變質了。（譯者按：近數十年來幾個「革命運動」亦莫不如此。這些「革命運動」，在其初期，係以改變大家不滿之政治現狀爲號召。可是，等到現狀改變，「革命」成功，獲得「革命果實」以後，所謂「革命」遂成維繫盲人幻覺的符咒，尤成鞏固並增進少數人底權利之資具。在此少數人圈子以內「革命」者，佔盡一切便宜；否則，就吃盡一切苦頭，「革命」而發展到了這個地步，於是治理機構也，邦國也，階層也，民族也，組織也，悉淪爲此一小圈子掩飾與運用之工具。此勢一成，整個社會只有睜著眼睛任其損耗下去，而莫可救藥。）

六

社會主義的理論和社會主義的戰術，即使不爲馬克斯底獨斷論所支配，也是在每一部分係從一項觀念出發。這項觀念就是，把社會分成兩個階層。這兩個階層底利益互相衝突。這兩個階層

之世，誰能擔保他不走上列寧之路？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是最易泛濫的兩股洪水。欲從思想上挽救世界，必須請大禹治水。今日的大禹，就是新實徵論，或哲學解析。關於這方面的問題，事涉專門，容有機會詳論。）（我現在看這還不夠——海光）

在德國和意大利，納粹和法西斯並沒有什麼太多的新發明，在德意兩國，納粹和法西斯所採用的瀰漫個人全部生活的新政治運動，是社會主義者老早介紹過了的玩意。他們想組織一個囊括個人一切活動的黨。這個黨管制著從搖籃到墳墓的一切。這個黨要指導個人對於一切事物的看法，並且喜歡把一切問題看成黨底世界觀問題。凡此等等，社會主義者俱首先予以實踐。一個奧地利底社會主義作家，提到奧地利底社會主義運動時，很驕傲地說：「奧地利社會主義運動底特徵，就是爲工人和僱傭底每一方面之活動都創造了特殊的組織。」（這就是全體主義的統治之雛型——譯者）。

雖然，奧國社會主義者在這方面比別處的社會主義者走得遠，可是，在別的地方，情況也並不見得相差太遠。許多地方的社會主義者，把人從最小的年齡起就納入其政治組織。這樣，他們長大了以後，就變成了好的「普洛階級」。社會主義者首先堅持黨員必須與一般人不同，他們認爲黨員必須穿制服。社會主義者組織黨底「細胞」，並且永遠監視私人生活，於是產生了極權政黨底原基型式（Prototype）。

措施底基本價值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可是，無論如何，限制我們處理物質生活之自由，會直接觸及我們心靈自由的。社會主義者，是社會主義者所製造出來的野蠻後裔之文明的祖先。（妙語驚人！——譯者）社會主義者一貫地希望拿教育的方法來製造大家底價值判斷，使大家有共同一致的價值觀，以解決實施計劃經濟時因各人底價值判斷不同而引起的困難。但是，這樣一來，教育就不成其爲教育了。知識不能創造倫理價值。知識不能導致各個人對於道德價值採取相同的看法。道德價值之釐訂，乃所以安排社會關係。但是，在計劃經濟之下，如欲證明某一計劃措施合理，吾人所需依據者，並非一理性的論說，而係社會主義者所規定的教條。社會主義者明白，要他們底「理想」行得通，必須大家普遍接受一個共同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接受一組確定的價值觀念。這個單一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念可以支持一個羣衆運動。在羣衆運動中，社會主義者創造了許許多多說教底工具。納粹和法西斯曾經有效地利用過這些工具。（譯者按：在這些事上，唯心主義者、泛道德主義者Pan-moralists，又顯得與泛唯物的社會主義者同其「意識型模」：都要人接受其「世界觀」，都提倡「空大哲學」，都盛行「思想之走私」，都從一個單一的觀點看事事物物，都要製造羣衆心理，都是全體主義的，也都可以歷史主義爲經。就思想底型模來說，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同出一神之源。就思想底建造來說，至少在近代，唯心主義是師傅，唯物主義是徒弟。就思想底實踐來說，唯心主義是陰影，唯物主義是形具。喀爾文之流，果生當今

了，這些標準便立即隨之而消失。我們所謂的公平價格、公平的工資，或爲習俗的價格與工資，或爲大家依據過去經驗而希望得到的酬報，如果沒有獨佔式的剝削存在，這樣的價格或工資也會存在的。

從事計劃的官方，必須決定何者爲公平價格，何者爲公正的工資。如果計劃者決定少數建築師或製錶工人爲必需者，而他可以僱到願得較低酬報者，那麼較低工資即爲「公正」的工資。在決定不同的工作之相對的重要性時，計劃者又得決定不同的集體與個人之相對的重要性。他如不願只把人當做工具，那麼他就得考慮這些後果，並且有意來平衡不同的結果之重要性。這麼一來，計劃之事便無可避免地直接控制著各形各色的人之生活狀況。計劃的方式又會影響到各個人之相對地位。其影響到各個人之相對地位，無異於其影響各個不同的職業團體之間的相對地位。

五

祇要社會主義一天在一個有限的和同質的團體中發生激動作用，上述困難還不致引起公開的衝突。祇有當社會主義的政策在實際上要求得到許多不同質的團體來支持，而這些不同質的團體又佔人口中的大多數時，上述困難才會表面化。顯然，如果要計劃經濟成功，必須大家對於許多

任？這些問題，在蘇俄，成爲祇能由最高權力單獨解決的中心問題。近來有位美國研習政治的學生，把列寧所用的這一成語擴大說，一切從事計劃的政府所面對的問題就是：「誰得到什麼，何時得到，並且怎樣得到。」一切政府都可能影響不同的人民之相對地位。在任何制度之下，我們的生活很少不受政府行動之影響的。不過從事計劃的政府爲尤甚。

在統制經濟之下，承擔起統制經濟事項的政府，有一項最關切要的問題，即是必須運用其權力來實現公平分配的理想。但是，他怎樣運用這種權力？他依據什麼原則來運用？對於因此而可能引起的重要問題，他能否切實解答？是否有一價值標準能使有思想的人贊同？他所訂價值標準是否能證明社會新階層制度合理？並且是否可能滿足公平分配之要求？

照社會主義者看來，祇有一條普遍原則，祇有一條簡單的規律，可以確定地解答所有的這些問題，即是：平等，一切個人在所有藉人爲管制而形成的那些條件上完全而且絕對平等。這條原則，是否能夠付諸實行。這一問題我們且不討論。我們現在所要表明的是，如果大家都認爲這條原則是可以接受的，那麼便對「公平分配」這一模糊觀念可以得到一個清楚明白的意義，而且從事計劃者也可以得到一個確定的指導原則。但是，一般人却不認爲這種機械式的平等是要得的。自古至今，凡以實現完全的平等爲目標的社會主義運動，從未得到實質的支持。

我們所有的公平標準，是從我們已知的自由競爭範圍內衍生出來的。一旦自由競爭制度消滅

，並且屈從高高在上者之意志，則其爲害亦靡有止境。如果大家意識到大家之苦難係出於人爲精心刻意策劃所致，則不滿之情，勢必與日俱增。（譯者按：類似蘇俄的地區之苦難，十之八九皆非必要，而係出於握權者人爲的策劃所致。然而，人衆即或不滿，亦莫可如何，因爲在現代統治技術之下，人衆不滿之情，只似地下水，不能滙合成爲江河。）吾人必須明瞭，如果經濟問題或社會問題之解決全靠行使鎭壓權力，則所謂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無一而非政治問題。（這眞是一針見血之論。極權地區之以蘇俄爲典型者，內部如有問題，歸根究柢祇算作一個問題，即是政治問題：舉凡教育問題、文化問題、思想問題、土地問題、宗教問題，無一不被看作政治問題，因而無一不以政治爲基本著眼點而解決之。這就是泛政治主義。泛政治主義是瞭解極權統治的一鎖鑰。——譯者）

四

在俄國蘇維埃統治初期，俄國人之間流傳這個笑柄：「誰來管？誰被管？」我相信這個有名的成語是列寧自己介紹到俄國來的。當時的俄國人藉著這個笑柄來總括所謂「社會主義的社會」裡的一般問題：誰替誰計劃？誰指導並且支配誰？誰規定一般人底生活方式？誰應該負擔什麼責

，常得無妄之災。（譯者按：在受管制的地區如蘇俄者，這類結果之發生，眞可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因爲，在這類空間，「效忠」（offer servitude）權力之泉源爲人生第一要務，猶如「德意志高於一切」然。這樣一來，無心無肝而有效有忠者，則常爬到大家肩上。所以，在共產制度統治之下，大學未曾卒業者可當大學校長，高級中學課程沒有讀完者可向大學教授作「哲學」訓話。凡此等等，不能視作怪事。因爲，行一黨制度的地區，常常發生這類現象。權力即是一切，遑論知識？）

無疑，在人類社會中，不平等之事在所難免。如果不平等之事係出於社會因素所致，而非出於人爲的計劃，則對於個人尊嚴打擊尚小。在一自由競爭社會，如任一公司對一個人不再僱用或不能給他較佳的職務，這對他並非輕視，亦不冒犯其尊嚴。同時，在自由社會中，有比在中央管制制度裡較佳之方法來防制失業之厄。失業之事，如在一計劃的社會中發生，則遠較在自由社會中所發生者情況惡劣。吾人須知，在一計劃的社會中，個人所決定者並非他是否需要某一特殊職務，而係他對於任何職業是否配得上，並且他怎樣才有用。（亦如一零件是否配得上一部機器然——譯者）他在社會中的地位怎樣，全由別人來決定。（人生至此地步，辛酸極矣！——譯者）

當任何人對可以打擊他的苦難低頭時，有時甚至欲向苦難低頭，亦不可得。因此類苦難乃官方造成者。此類苦難，如果我們不能遠離它，則其爲害也勢必靡有止境。如果我們被束縛於一地

有些贊成計劃經濟的人說，我們並沒有何種理由要計劃者來替我們決定個人底收入，計劃者在決定各種不同的人究竟應該分得國家歲入之多少時，會遭遇到社會性的和政治性的種種困難。面對這種種顯而易見的事實，即令是最頑固的計劃者，在行使其權力來處理這類問題時，也必感到棘手，以致躊躇不前。所以，認識個中困難的人，也許無寧祇將計劃之事行之於生產方面，祇期藉計劃生產來實現「工業之合理的組織」；而將分配收入之事儘可能地委諸社會力量。雖然，欲管制工業而不影響分配乃不可能之事，而且沒有計劃者願意將分配之事完全委諸自由市場；可是，儘管如此，他們也許只看到分配符合公平原則時，消除了極端不公平之事，他們却不知道，這麼一來，在社會內部會造成特殊人物的。

我們已經稔知，一切經濟現象係彼此密切關聯著的。既然如此，計劃者極不易將計劃之事剛好做得適可而止。自由市場底功能一旦因計劃而受到某種程度以上的阻礙，計劃者爲了其計劃行得通，便不得不擴大其統治範圍，一直到無所不包爲止。

在一個受管制的計劃社會之中，一旦大家普遍認識個人地位不是被制度底力量所決定，同時又非由許多人自由競爭所致，而是由實行管制的官方精心刻意謀劃所造成，那麼，一般人對於他們在社會所處地位的態度必至隨之而變。這麼一來，社會上一定常常發生不平等的事。這些不平等的事，在身受者看來，是不公正的。於是，失望之事，遂與日俱增。在這樣的社會，善良的人

量的世界，較之一個人握有權力即能獲得財富的世界，畢竟要好得多。（譯者按：這眞是眞知灼見。謀致財富，固難免詐欺與投機取巧之事，但是，大致說來，究竟要憑眞實本領、才智，與毅力。洛克非勒、卡尼基，和福特之財，除共黨以外，無人能說係「不義之財」。然而，在能藉政治權力而取得財富的地區，權力者常可拿財富作爲政治誘餌。這麼一來，不特耗竭社會財力，且政治圈子裡所誘聚的，很少不是趨餌之蝦的。於是，反淘汰作用發生，社會被拖緊向下沉淪，以至於不可救藥。）

伊斯脫曼（Max Eastman）是一位卓越的老共產主義者。他重新發現了這類事實。這眞是可悲的。不過，同時也令人歡欣鼓舞。他說：「照我現在看來，這似乎是一件顯而易見的事——雖然，我得到這項結論，已屬太遲——私有財產制度乃給人帶來有限的自由與平等之主要制度。馬克斯希望藉著消滅私有財產而無限獲致自由與平等。眞夠奇怪的，馬克斯是看出這個問題的第一個人。他首先告訴我們，叫我們往後看。他說，私有資本制度之演進以及與之俱來的自由市場曾經是我們一切民主式的自由之先決條件。可是，他却從來不向前看。如果他所說的不差，那麼，設若廢除了自由市場，則這些自由便會一齊消失。」

分別爲許多人所保有，而且各人獨立從事生產，沒有誰能完全支配誰，於是各個人得以自行決定謀生之道。窮人也可以生息於這些空隙之間。（譯者按：海耶克教授之所言，實關聯乎人生底根本問題。財產私有，不僅爲個人生活之所資，且爲保障人格、氣節、志趣、興味、情操底必須條件。陶淵明之所以能賦「歸去來」辭，之所以能不爲「五斗米折腰」，因他尙有「將蕪」之「田園」。今日中國非全無陶淵明，但幾無將蕪之田園，於是不得不在拗逆志趣與夫大打折扣之條件下苟延殘生。在這樣的一個社會，高唱「精神文化」，雖至地老天荒，亦必無人理睬。那些不懂得怎樣思考現代問題的玄談「心性」者流，可以少息矣！）反之，如果所有的生產資具都歸一人控制，那麼，無論此君在名義上是否代表整個「社會」或係一大獨裁者，只要他操有這種權力，便可以對吾人施行全面的控制。（這眞是經驗之談——譯者）

自昔至今，少數極端份子，或宗教信仰者，雖家無恒產，可是，其志同道合者如富有資財，能照顧彼等所享有的自由，常較他們只在名義上係社會財富之所有者爲大。這類事實，無人可以置疑。（譯者按：蘇俄之類的極權地區，工人只是財富在名義上的所有者。馬林可夫及高級黨要爲財富在實際上的所有者。結果，盡義務的是工人；享權利的是馬林可夫及高級黨要。）在自由社會，一個百萬富翁，即使是我們底鄰居或僱主，他對我們底支配力一定遠較那握有政府鎭壓權力的人爲小，遠較那能詳細規定我們生活與工作細節的人爲小。吾人須知，一個財富比較發生力

二

有人以爲如果因私有財產而獲致的收入廢止了，各種不同的人收入上的差異依然保持原狀，那麼大多數社會主義者所抱持的社會正義理想便可實現。然而，這些人却忘記一項事實，即將一切私有財產轉變爲政府財產時，政府的行動在實際上便決定著大家一切其他的收入，這麼一來，我們就是將「生活權利」交給政府了。（這是「完全繳械」！——海光）

我們如果以爲政府底權力不過就是我們所授予的那些權力，那麼便大錯而特錯，我們必須明白，政府底權力乃係新產生出來的權力。而這種權力，在一自由競爭的社會，是任何人所不曾掌握的。吾人需知，祇要財產爲各個人分別享有，則誰都不能具有決定的力量來決定某人該收入多少，決定誰底社會地位該如何。在自由社會，一個僱主，除非肯出比任何人較多的價錢，否則沒有人願意跟著他幹一輩子。（但是，在現代極權統治之下，政府是唯一的僱主。於是，你只有兩條道路可走：跟著他幹一輩子；或者死亡。——譯者）

我們這一代有許許多多人竟忘記了私有財產制度係保障個人自由之最重要的制度。這種制度，不僅保障了有財產者底個人自由而且也保障著窮人底個人自由。之所以如此，因爲，生產資具

！）

在自由競爭的社會，無庸諱言，窮人發展的機會，遠較富人爲少。然而，即使如此，窮人在自由社會中，比之在不同型類的社會中那些獲致較大物質享受者遠爲自由。（例如，蘇俄工程師不及美國小工自由。——譯者）在自由競爭的社會中，窮人致富之機會確較承繼遺產者致富之機會爲少。雖然如此，在這種社會中，窮人畢竟有致富的可能。自由競爭制度係建立於想獲致財富的人身上，而非建立於權勢之上。（譯者按：這一點重要之至。因爲，在以政治目標來支配經濟發展的地區，有權有勢斯有財有富，無權無勢斯無財無富。因此，在這類地區，一人如不循權勢之路，則無論如何克勤克儉，亦必不能致富，甚至無隔宿之糧，過度著寄蜉蝣於天地的無根生涯。）同時，在自由社會，沒有人能阻止誰發財致富。今日有許多人不知失去自由之滋味爲何，因此，也就常常忽略一項事實，即是在西方自由國家，一個收入不豐且又技術欠佳的工人，其得以自由處理其生活之自由，較之收入遠爲豐厚的蘇俄經理爲大。在自由競爭的社會裡，這個工人如要改變行業，或遷地居住，或表示何種意見，或以何種方式消磨其閒暇，凡此等等，都沒有限制與障礙。他個人人身之安全和自由沒有危險，沒有任何人藉著暴力來強制他做些什麼。（譯者按：做一個人最起碼須要這些自由，否則至多不過等於動物園裡的猴子。）

種制度之中任選其一；而是在下列兩種制度之中任選其一：在一種制度之下，少數人的意志可以決定誰獲得什麼；在另一種制度之下，每個人能夠獲得什麼，至少有一部分係憑其能力和企圖心，而有一部分則由於不可預見的機會所致。後者便是自由競爭制度。在自由競爭的制度下，私有財產和遺產常具有影響作用，因而，在競爭場合，個人所有的機會並不完全均等。可是，只要各人先天的差異存在，機會之不均等可以逐漸設法減少。在這個世界上，許許多多人總是自以爲他們的看法正確。如果沒有任何人能夠拿他的看法強使人同，那麼，消除機會不均等之事遲早總是可能實現的。在消除機會不平等時，消除之方式，必須不是爲著任何個人打算的，而須是超乎人身的。（譯者按：依蘇俄這一典型來觀察，在現代的一黨制度 One-party system 下，舊式的不平等固可消除，依政治考慮而形成的新式的不平等則取而代之。而新式的不平等之令人難以忍受之程度，較舊有者大千百萬倍。因爲，舊式不平等之造成往往需經過漫長之歲月。在此漫長之歲月中，經濟制度往往混雜有若干風俗習慣之成分。風俗習慣，除對極少數頭腦優秀的人以外，對最大多數人恒能收安之若素之實效。一黨制度興起後，隨之俱來者，常爲以「擁護」爲專門職業的新式政治貴族。這種新式政治貴族，當然因著酬報的理由也就成爲新式經濟貴族。踏在此一黨與此新式貴族脚下的，便是千萬被治人畜。這千萬被治人畜，在經濟上，倒也可以得到奴隸與奴隸之間的「平等」。此奴隸與奴隸之間的「平等」，係彼等「努力革命」換來的寶貴「果實」

常爲更慘酷之獨裁極權的統治。急切求變，便是自造地獄。

一

我們最常見的反對自由競爭的論調之一，是說自由競爭係在一種「盲目狀態」之下進行。無論這種批評對或不對，就古代的人而言，這種「盲目狀態」乃神聖不可侵犯的正義之一屬性。雖然自由競爭與社會正義二者共同之處不多，但二者都是值得讚美的。因爲，無論是自由競爭也好，或是社會正義也好，其建制也，並非預先爲了對於誰何人等有利，亦非預先爲了不利於誰何人等。在自由競爭制度之下，我們簡直無法確知誰會獲利，誰會遭受損失。在自由競爭制度之下，酬報與罰款，並不依照誰認爲某人的工作是否與他人有好處而定，而係依照各人的能力和幸運而定。在吾人訂立法治建構時，既然不能確知誰會因此條文而獲利，誰會因此條文而蒙受損失，這麼一來，就可造成機會之均等。自由競爭正需要機會均等的。因爲，在自由競爭制度之下，機會和幸運，在決定個人的運氣時，其重要往往不下於個人的技巧和遠見。

我們假設有這兩種制度：其一是每人依照某種絕對的和普遍的利益標準來各取所值；而另一是各個人所應得的一份一部份係由偶然的機會所致。然而，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抉擇，並非在這兩

也許有人問：「我們可不可以保留作爲改善大家經濟生活的社會主義這一理想原則，而排斥作爲統治之基本手段的社會主義？」對於這個問題之解答，祇能求之於經驗，不能求之於觀念的遊戲，更不能求之於名詞的玩弄。近百餘年來，許多強而有力而又標尚社會主義的人，把社會主義之實現，與政權爭奪，尤其以暴力爭奪之事，緊密地聯繫起來。於是，演變所及，所謂「作爲改善大家經濟生活的社會主義」，就變成「作爲改善少數人經濟生活的社會主義」了。這裡所謂的「少數人」，意指奪得政權的任何人，或任何政治組體，或任何階層。這麼一來，對於多數人而言，社會主義，就不折不扣地變成「基本的統治手段」。這個樣子的「社會主義」，難道還不應該徹底反對嗎？

假若有人再進一步追問：「如果不經由所謂『革命』，或暴力奪取政權等等手段，而經由民主程序，實行計劃經濟，和平走向社會主義之理想的一面，那麼會不會演變到這種不幸的結果呢？」海耶克教授在本書中所進行的解析，一部分就是爲了答覆這個問題的。依照他底解析，計劃經濟就是經濟的獨裁。經濟的獨裁與民主政治，在內部結構和實際的發展上，是不相容的。經濟獨裁底結果，一定是挖民主底實際內容。這種制度之消滅民主，與暴力革命之消滅民主，雖有緩急之分，可是，結果很少不同。

吾人須知，侈言「根本改革」有關衆人之事，常招莫測之禍：繼所謂「根本改革」而起者，

一齊忘乎其形，爭著搶麵包，險些兒作了馬克斯主義者的俘虜。至於東方人衆呢？自盤古開天地以來，從來沒有人權之自覺。這些人，於貧困之餘，一聽到共產宣傳家「解決吃飯問題」之煽動，便以爲天國降臨人間，趨之唯恐不及。結果，都被關入地獄。所以，我們要提醒世人，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要忘記了人權。失去了人權，一切都會落空的。

許多主張社會主義而却又不反對民主的人，一聽到有人強烈地反對社會主義，不由得心裡老大不舒服。他們在直覺上就想不通：社會主義提倡大家有飯吃，這並沒有錯，你們爲何要拼命反對？這不是「資本主義」的思想在作怪嗎？

這些人之所以有這種誤解，照譯者分析起來，是由於沒有把「社會主義」一詞底兩種意義分辨清楚。時至今日，「社會主義」一詞已經演變出兩種不同的意義。一是「作爲改善大家經濟生活的社會主義」；另一是「作爲統治手段的社會主義」。這兩種意義的「社會主義」之性質與歸趨是大不相同的。在第一種意義之下的「社會主義」係社會主義之理想的一面。社會主義底這一面，是在千千萬萬人心中盪漾的。既然如此，我們說社會主義根本要不得，他們如何不心頭火起？然而，他們却不明瞭，在許多實際情形中，社會主義之改善大家經濟生活的理想尚未實現時，已經被用作基本的統治手段了。有眼光而又愛人者見到這一危險趨勢，怎能不起而大聲疾呼，說：「這條路太危險，小心上當！」

活就是藉端要挾。這就是因爲自由民主的邦國不否認改善生活爲每一個人之始基的人權。這樣實現的「經濟平等」，是人的經濟平等。兩相比較起來，俄式之不從人權出發而談的「經濟平等」，與自由式之從人權出發來談的「經濟平等」，二者況味之別，結果之差，豈可以道里而計？

這樣分析起來，可知如果我們自認爲是一個人而且要求實現「經濟平等」，那麼必須從人權出發以謀其實現。如果從人權之肯定以謀其實現，那麼就是已經預先假定「政治民主」先於「經濟平等」了。因爲，有而且祇有在「政治民主」中人權才得到明確的承認和切實的保障。在「政治民主」先於「經濟平等」的這一大前題之下，要求實現「經濟平等」既被看作基本人權之一項，謂之爲「經濟人權」可也。

以上所說的是一邏輯結構。當然，在經濟特別發生問題的情形之下，我們不妨特別重視經濟人權。但是，無論怎樣重視，我們都不能忘記，經濟人權係人權之一次類（Sub-class）。它無論怎樣重要，絕對不能高出一般人權之上。這道關隘如不死守，那麼，就算我們有口可憐飯吃，也就一齊走向「奴役之路」了。

從上面所說的看來，可知對於「政治民主」與「經濟平等」底相對地位之這一番解析是何等重要。但是，西歐許多人士，由於享受慣了人權亦如享受慣了空氣而不復警覺人權之下不可須臾離，於是，一聽到馬克斯之徒高嚷麵包問題，便丟下祖宗奮鬪數百年所得到的人權保障而不顧，

治民主」與「經濟平等」二者底這三種相對地位之不同所產生的結果，重大地影響甚至於決定著大家底現實生活。如果我們視「政治民主」高於「經濟平等」，那麼所形成的社會便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如果我們視「政治民主」與「經濟平等」同等重要，那麼所形成的社會也許就是英國工黨式的社會。如果我們視「經濟平等」高於「政治民主」，那麼社會便走向「奴役之路」。而照許多經濟學家底解析，將「政治民主」與「經濟平等」同等看待的辦法，如英國工黨底措施所例示者，祇是從「自由社會」走向「奴役之路」的一個過路走廊而已。所以，剩下來的可能不是「自由社會」，便是到「奴役之路」。我們究竟應該怎樣抉擇呢？

我們要解答這個問題，首先就得確定：是人來要求「經濟平等」呢？還是猪來要求？如果是猪來要求「經濟平等」，那麼就根本不發生是否實現「政治民主」的問題。美國猪營養豐富，宿舍清潔，照料週到，「經濟」可謂「平等」矣！所以未聞猪羣暴動以要求實現「政治民主」之事。如果是人要求「經濟平等」，那麼必須首先自覺要求改善生活乃係基本人權之行使。在極權地區如蘇俄者，統治機構配給你好多你就吃好多，你是不被允許有要求改善生活之權利的。否則就說你藉端要挾，請你進集中營。因爲，這類行爲，照統治者看來，是對他權威之挑戰。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事。蘇俄極權地區，即使有所謂「經濟平等」，也是餵猪式的「經濟平等」。而在自由民主的邦國，如有工人要求改善生活之事，資方常謀與之商談協調。從來沒有聽說要求改善生

的不平等。在原社會中，因有獨立於政治的純經濟活動，所以原有經濟制度常較富於彈性。既常較富於彈性，個人改善其經濟生活之可能性遠較在社會主義之下爲大。在美國，以及在中國清末民初之際，赤手致富者比比皆是。而社會主義一旦普遍實行，由官方統治經濟，則經濟就倒過來變成政治之附庸。蘇俄等地區所表現者，社會主義的經濟之僵固無情，遠非西歐及美國人士所能想像。在這類地區，貧者從生到死永遠赤貧。如不靠政治關係，赤手絕無致富之理。

這樣實行社會主義稍久，一定產生若干層級的政治性的經濟貴族。千千萬萬平民，則一輩子淪爲可愛的「國家」之奴工、奴農。任何時候，這可愛的「國家」基於政治的理由而停止配給，則奴工、奴農就得停止呼吸。在這樣的「國家」，經濟上的不平等，是基於政治的考慮和需要而嚴格制度化了的。

多少年來，由於世界共黨過分強調經濟因素之重要，形成經濟至上的社會心理。許多贊成政治民主的人爲這種社會心理所懾，於是提出「政治民主」和「經濟平等」兩個口號。這種說法，乍看起來，似乎有理，因而頗爲動聽，但是，稍一分析，便可看出這種說法底毛病。這種說法，從情感的原因觀察，是想作調人；從思想方面觀察，是由於思力未能劈入此問題之中。

「政治民主」和「經濟平等」二者之相對地位有三：一、「政治民主」高於「經濟平等」；二、「經濟平等」高於「政治民主」；三、「政治民主」與「經濟平等」平列，即等量齊觀。「政

迷妄的平等

上帝給予人的最佳機會被人錯過了。因爲，許多人渴念平等。這麼一來，自由便失掉了。

——阿克頓爵士

譯者的話

我們千萬不要以爲這話是阿克頓（Acton）過火之言。阿克頓是英國博學淹識的大史家，飽經世變。吾人須知，失去了自由的平等，便是毫無價值的奴隸與奴隸之間的平等。這樣的平等，靜坐可得，何勞流血爭取？

社會主義者用以鼓勵人心的基本意理，就是實現經濟平等。但是，不幸得很，就近數十年的許多事例觀察，藉「革命流血」手段而實行社會主義的結果，反而招致了較原有經濟制度下更大

自然，這種熱望，有一部分是被用來作政治教育方式的。（一針見血之語——譯者）

有人常說，如無經濟自由，則所謂政治自由便無意義。這話是確實眞的。這話之爲眞，其意義與計劃主義者用此語時之意義幾乎完全相反。在社會生活中，經濟自由乃任何其他自由之必要條件。然而，經濟自由只能在某些條件之下解放個人，並且讓個人有選擇生活方式之自由。我們既然保有經濟自由及選擇的權利，當然同時負有種種責任，並且無可避免地要冒些風險。這是不在話下的。

譯者附誌：本章有所刪節。

經濟，確能產生更大的生產力。可是，這種說法，近年以來，不斷爲大多數研究此類問題的學人所駁斥。時至今日，即使採取社會主義眼光的許多學者，如果已經認眞研究過中央管制計劃問題，他們就會承認，計劃經濟之效率如能與自由競爭的經濟制度相等。則感心滿意足。這類經濟學者之所以主張計劃經濟，不復因計劃經濟有較爲優越的生產能力，而係因他們以爲在計劃經濟之下財富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認眞說來，此種說法，是主張計劃經濟之唯一有力的論證。無可否認，如果我們想要依照某些預先規定好的標準來分配財富，如果我們有意要決定何人可得何種酬報，那麼我們確乎必須將整個經濟體系加以計劃與管制。但是，吾人須知，問題之所在，仍在我們實現某些人所標尙之「社會正義」的理想時所須償付之代價，是否製造更多的不安和更多的壓迫。（推廣言之，凡社會發生激劇而巨大的人爲變動，從中獲利者總是少數野心人物及其親近的附隨之衆；而最大多數的人，無論在變動之前夜或變動漩渦之中，悉淪爲犧牲品，其慘痛必數倍於昔，至少從未有蒙其利者。東方世界數十年來之變亂可證此言爲眞。刼後餘生，何不三思之耶？——譯者）

有許多人對於「以集體方式來滿足大家底需要」之事抱有熱望。社會主義者則用此種熱望爲極權政治鋪路。（千眞萬確——譯者）吾人須知，如以集體方式來滿足大家的需要，我們就只能在指定的時間和預先規定好的方式以內來滿足需要。（這與來亨雞用膳有何不同？——譯者）

人却更遭奴辱。這一條路，無以名之，姑名之曰，「好人作亂」之路。至少在東方世界，如果再走這條「好人作亂」之路，那麼將會應驗聖經上所說的「沒有一塊磚頭砌在一塊磚頭上」。——譯者）

許多人在經濟問題上常抱種種如願的想法。其中有一種如願的想法，以爲我們現在忍受貧困於一時，將來則可發揮社會「潛在的富力」。照我們看來，這種說法是不足信的。自有社會主義以來，社會主義者曾用各種不同的說法來宣講「發展潛在富力」。顯然，這種說法是假的。其爲假也，與百年前固無以異。自有社會主義以來，沒有任何主張「發展潛在富力」的人弄出一個可行的經濟計劃來增進生產，並藉此使歐洲免於他們所謂的「貧困」，遑論整個世界？所謂「發展潛在富力」之說，倡之者或不誠實，或不知其究爲何意。然而，這一虛妄的希望却把大家騙上計劃經濟之路。（可不戒哉？現代共產主義者有一特色，即鼓勵人犧牲「現在」以爲「將來」。而彼輩所謂之「將來」，又從無一定之界說，頗類街頭彩票舖之市招「明日開獎」。彼等所謂之「明日」，並非大年初一，而係無窮無盡之歲月。嘗見有跑狗者，置一假兔於狗前，以電動之，假兔奔馳不已，眞狗則窮追不已。操縱者則因之博利焉。今之「未來主義」之於羣衆，與假兔之於眞狗，奚何以異哉？——譯者）

然而，計劃經濟運動依然利用這一虛妄的信仰而發展。計劃主義者以爲計劃經濟，較之自由

會才可能有大的作爲。——譯者）俗語說，人上一百，種種色色。有的人不喜歡做刻板的瑣事，而喜歡做一些無定時的工作。這樣的人，也許樂天安命，襟懷豁達。他只希望得到一點點收入，或不定期的收入就滿足了。顯然的很，這樣的人是無害於人的。但在計劃社會之中，他便無法生存下去。在計劃社會中，一切力求標準化、劃一化，和簡單化。這樣一來，個人置身其中，一舉一動都得受規定，被控制。這眞是無所逃出於天地之間了。執行計劃的官方爲要把這種巨大的工作易於管理，必須將各個人之個別差異歸約到幾種簡單的範疇以內，而且這幾種範疇又是易於互相改換的。（例如，駕駛汽車者可以改換爲駕駛坦克車。反之亦然。——譯者）至於各個人之間精微的個性差異與能力差異，官方必須有意予以忽略。因不有意予以忽略，則計劃礙難通行。

雖然，實行計劃者有時宣言實行計劃之目標是使人不復只成爲一種工具；但是，在事實上，個人在計劃社會中必至成爲工具，且其成爲一種純粹的工具之程度，爲前所未有者。因爲，在計劃之中無法顧及個人之好惡，而個人之好惡，在人之所以爲人方面，只要其無損於他人，又是如此之重要。在計劃社會中，個人常被官方用來爲一些空空洞洞的口號而獻身，例如，「社會福利」，或「社羣之善」等等。（無論如何，這些玩意兒都是近代的「大謊言」。這類好聽的謊言，至少在東方世界，不知騙苦了多少天眞的好人，害得他們肝腦塗地，暴骨原野，搞得天翻地覆，禍亂相尋，結果却便宜了嗾使他們「爲理想而犧牲」的少數「先知」們，築成了權力的寶座，萬

以爲官方所允諾的「自由選擇行業」之說會兌現。在計劃經濟成熟的社會，「選擇行業之自由」勢必消滅無餘。在計劃經濟之下，大家所能希望的唯一「選擇」，就是一任政府包辦「選擇」。（亦如由其包辦選舉然——譯者）政府從事「選擇」時，他們認爲在客觀上需要那種人，就派遣那些人去。（其尤甚者，更依據這一原則來調配青年的，代定其志願。結果，被其調配之人，都變得「身不由主」。身不由主者，就是自己底生命不屬於自己底了。人生之可悲，孰甚於此？——譯者）

在計劃經濟之下，即使主持計劃的官方之行動限制到規定雇用條件，並且藉此試行管制行業人員之數目，結果也好不了多少。若事先規定酬報數量，則此種辦法之足以有效限制許多人之從事某些行業，幾無異於把許多人從某些行業中排斥出來。因爲，這兩種辦法所產生的實際結果相差無幾。假如官方又規定全部酬報之種類，並且選擇僱員時還要舉行考試，則求職者希求得到職業之欲望，幾乎不在考慮之列。（問題只看你要不要活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人被折磨得志氣全消。如果一個社會底人志氣全消，則生力從何而來呢？生力無從而來，又怎會有大的作爲呢？從反面看去，有而且唯有在一個自由社會裡，個人才有選擇之自由。個人有選擇之自由，才能保持其志節。個人保持了志節，才會放射出各自的光芒和力量。所以，有而且唯有自由的社會才能產生眞正的力量。有了眞正的力量的社會，才可能有大的作爲。所以，有而且唯有自由的社

中，很少人有充分的選擇行業之自由。但是，問題之重點並不在此。問題之重點，在我們是否能主動地自作選擇。我們不能絕對束縛於別人替我們選擇的行業之上。我們應該保有改行之自由。我們應須可以犧牲當前的利益來達到這個目標。如果我們無論作何努力都無以改變這些情況，那是最令人無可忍受的事情。（在特殊遭際之下的人，多失去此種自由。此固可悲，但如忘記或竟不知人應有此種自由，一若生而盲目者不知太陽之美，則尤爲可悲。——譯者）

一個政府可以做許多事情使大家消息靈通，讓大家具有選擇行業方面足夠的知識，並且令大家因此容易找到從事其願意選擇的行業之機會。但是，吾人必須明瞭，政府此類行爲能增加個人從事某項事業之機會，但往往與現在普遍贊同的和實行的「計劃經濟」剛好相反。雖然，最大多數的計劃經濟者允諾我們，在新的計劃社會裡，將會小心翼翼地保持個人擇業之自由，甚至增加這種自由；但是，他們所作的諾言常比他們所能兌現的事實爲多。（在若干政治範圍中，尤其如此。甚且有專門出產「諾言」以作政治資本者。此固已司空見慣，不足爲奇。頗足爲奇者，爲出產諾言成爲習慣，而聽信諾言亦成爲習慣。當然，人窮至極時，即持假鈔，亦聊起象徵作用：望梅可以止渴也，悲夫！——譯者）如果他們從事計劃，那麼他們必須控制住各門商業及行業之關卡，控制住酬報之條件，或者二者都予控制。幾乎在一切已知的計劃經濟實例中，此類控制是必須首先實施的方案。如果此類管制係普遍由一單一的官方機構執行，那麼我們就不必胡思亂想，

東西分配給不同的地區，和不同的團體；而且，如果官方高興的話，還可以分配給不同的人：它高興給誰就給誰，高興給他多少就給他多少。

吾人須知，從控制生產和物價所產生的權力往往是沒有限制的。在自由競爭的社會中，我們購買一物時所需付之價格，係基於其他相關的東西之數量而定。且價格之高下，從不依任何人之意志而決定。復次，如吾人發現一物之價格太高，吾人即得自由找別的地方去買。吾人此類選擇設遇阻礙，那麼並非由於有人不予同意，而係因在別處價錢也係如此所致。在管制經濟下，若官方有權監視個人追求的經濟目標，則一定會利用其權力以助私人達到某些目標，並阻止私人達到別的目標。在這種經濟體制之下，我們不能依自己的看法來決定我們應喜歡什麼，或不應喜歡什麼，以便決定我們應該得到什麼；而是別人代我們作這些決定。既然官方有權阻撓任何人規避其所強制加諸大家的規定，於是它可以控制住我們底消費。其控制之有效程度，亦若其直接規定吾人必須如何花去我們底收入然。（譯者按：這就是百分之一百的經濟的父權主義（Economic Paternalism）。在歷史的過去，政治的父權主義（Political Paternalism）盛行。到了現代，二者緊密結合於俄式極權統治體系以內，於是，受其統治者，雖億萬人亦不能動彈矣！世人欲免此浩劫，須及早清醒預防。若待其勢已成，天羅地網撒下，便萬劫不復矣！）

當然，即使在社會最好的部分，我們要自作決定與選擇還是會受到種種限制的。在這個社會

就連蜂蟻都不如了。人活著還有什麼意義？——譯者）

吾人須知，主持計劃經濟者，即使不直接控制吾人之消費，也不見得不能全部控制住吾人之私生活。計劃的社會大概在某種程度以內採取配給制和相似的辦法。可是，主持計劃經濟者對吾人私生活之控制並不一定限於這些辦法。如果消費者不過只是在名義上得以自由消費其收入的話，那麼便是在實際上受官方控制。無疑，在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中，官方具有控制一切消費之權力。

在自由競爭的社會中，我們底選擇自由係基於一項事實之上，即是如一人拒絕滿足吾人之希望，則吾人可轉而求諸他人。可是，如吾人面臨一獨佔者，則吾人惟有任其擺佈。時至今日，管制全部經濟體系的官方，實乃吾人所可思議之最有權力的經濟獨佔者。（譯者按：在事實上，此種獨佔者所造成之桎梏與災害，並不因其藉標榜「經濟平等」或「社會正義」起家而稍減。恰恰相反，因此種獨佔者握有全能且無與之抗者，其所造成的桎梏與災害之普遍與深入，遠非私人獨佔者所可比擬。極權暴政與經濟統治者，互相表裡之現代災害也。可不懼哉！）即令吾人或不需懼怕官方濫用此一權力亦如私人獨佔者之所為，且官方之目標或非強奪最高限度的財政所得，官方依然有全權決定吾人需在何種條件之下拿出些什麼。握有獨佔權的官方，不僅能決定我們可以得到什麼用品和接受何種服務，並且可以決定得到多少。不僅此也，官方還可以決定將這些

中一部分卑不足道的事物，而且還管制著我們藉以達到我們底目標之一切方法。任何人，只要控制著我們藉以達到我們底目標之一切方法，也就足以決定拿什麼東西來滿足我們，決定不拿什麼東西來滿足我們。任何人一旦控制著我們藉以達到目標的方法，那麼不獨可決定我們應該達到什麼目標，甚至可更進而決定什麼價值高尚，什麼價值低劣了。不獨此也，他可以進而決定大家應該信仰什麼，以至於應該怎樣努力。（譯者按：俄式極權統治就是這麼辦的。這種統治已經藉著控制住一切基本生存工具——「下層建築」，來翻造人底靈魂，並出產「眞理」。培根說：「知識即權力」。史達林等應須說：「權力即知識」。有了權力，即有了一切。有了權力，可以製造一切。有了權力，無知識可以變成有知識，凡夫立刻可成神聖，當然可替大家決定生活方式，是非標準，以至於人生目的。這就是「欲與天公共比高」。極權統治者不獨要奪盡人間的一切權力，而且要僭取上帝底權力。何其狂妄至此——。這類人物一天不休，天下大亂一日不止。）

若干年來，計劃經濟者亦嘗應允吾人享受若干經濟自由。但彼等所謂應允我們享受若干經濟自由，其意義恰好是說，我們必須放棄自行解決經濟問題之權，並由彼等代吾人作種種選擇。因爲，在現代社會組織與結構之下，我們一舉一動，幾乎都有賴於他人供給的工具。計劃經濟一行，則吾人之生活勢非全部遭受統治不止，在計劃經濟之下吾人從原始需要到我們與親朋的關係，從吾人工作之性質到空閒時間之利用，幾乎很難找出一事不受計劃者之「有意識的」控制。（這

法一與統治結下不解之緣，勢必逐漸擴大。擴大之結果，不是吞沒整個社會，便是斷喪整個社會之生機。於是，社會日漸喪失其獨立性，步步走向非倚賴統治機構不能生存之途。社會如此，遑論個人？個人之準備受酬者，只得呼之即來，揮之即去。人底尊嚴，豈不掃地以盡？所以，今日人類所面臨的基本問題，並不是這一集團或那一集團的現實權力得失的問題，而是「人之所以爲人」受到挑戰的問題。祇有從這一基本處著想，我們才能摸到對抗極權制度的癥處。如不此之圖，其他恐是表面文章。）

在有關經濟的事務中，我們應能自由決定什麼事物對於我們比較重要；什麼事物比較不重要。或者，我們也許可以說，在現存社會中，解決我們底經濟問題的，正是我們自己。但是，如果經濟事務受到管制，那麼除非我們爲求達到一項特殊的經濟目標，否則必須處處受到管制。或者，當我們宣示我們底某項特殊經濟目標爲何時，如果我們必須使此項目標爲官方所贊同，那麼我們底經濟行爲便是處處受到官方控制了。

這樣看來，由計劃經濟所引起的問題，不僅僅是我們能否以我們所選擇的方法來滿足我們認爲多少有些重要性的需求之問題而已。計劃經濟還引起別的許許多多問題。其中之一是，從事選擇時，決定何者對於我們比較重要，以及何者對於我們比較不重要的人，是否就是我們自己，或者竟是執行計劃者。吾人必須明瞭，一切經濟活動如悉由官方管制，則所管制者不僅爲我們生活

史達林之流，深悉個中竅要，常將二者綜合而運用之：心靈與物質一起利用，一起統治，兩個極端「統一」結合，於是亙古未有之大亂臨頭焉。世之亂談理想主義者，可不冷靜反省哉？——譯者）

金錢是人類所發明的自由之最大工具之一。在現存社會裡，金錢爲窮人大開自由選擇之門。此一選擇範圍較之許多年代以前爲富人開啓的範圍爲大。許多社會主義者特別認爲，我們在「金錢上的動因」，已經大爲「非經濟的激力」所代替。果眞如此，而且我們考慮過金錢底眞正意義爲何，那麼我們就比較瞭解金錢底作用何在。假若我們工作所得的一切酬報，並不以金錢償付，只以社會地位或特權之形式償付，或超越他人之權力來償付，或以較佳之住宅及食物來償付，或以旅行機會或教育機會來償付，那麼就意味著一點，即不復允許受酬者有選擇之自由，而且給予酬報者不僅能決定報酬之大小，又能決定了受酬者享受酬報時應取何種形式。（譯者按：以蘇俄爲模範的一切極權地區係以各種不同的程度這樣辦的。這種辦法，叫做「包辦」。未有極權而不「包辦」者。但是，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當人被逼至一種境地以致失去生活之一切資據而飢極渴極時，也就顧不了許多，只有接受這一套辦法，甚至唯恐求之不得了。多數不得不接受這一套辦法者，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幾乎定型的生活方式：其中有許多「資深」者離開這一套辦法便無以爲生。這麼一來，這一套辦法，逐漸成爲統治紐帶之一環，或支持統治之一面。這套辦

們爲些什麼目標而奮鬪。如果我們爲金錢而努力，這是因爲金錢能給我們最大的選擇機會來享受我們努力之果實。可是，在現代社會，由於我們有金錢收入，而大多數人的金錢收入又有限制，於是我們才感覺得到或多或少的貧困。在這種情形下，許多人憎恨金錢，說金錢是限制我們收入之符號。其實，這是一種誤解，這種誤解係出於倒果爲因。（東方則歷來更有一奇特現象：在一方面，有些人高談心性，對於金錢貨利亦若不足掛齒者；在另一方面，許多人則以不可告人之手段在陰暗中搞錢。一在雲端，一在地獄，很少正視金錢貨利問題而構成一正確觀念如英美經濟思想家之所爲者。一些道學先生調子懸得高入九天之上，罔顧人衆實際生活之實際需要，於是一崩潰下來，若決江河，不可收拾，遂成今日之「金錢世界」。其他許許多多建構之崩潰，至少有一面係由同因所致。有些地方之所以糜爛至此，這類空談心性的道學先生，是要負一方面責任的。當然，從學術眼光或思想品質方面看，理想主義的唯心論，較之經濟的唯物論，其品質之高，實不可以道里計；但是，就效應或影響來看，在歷史的長遠演程中，二者之實際距離遠小於其理論距離：絕非如理想主義的唯心論者所想像的，二者落入現實之距離亦若其理論距離之遠。喀爾文之極權如配備現代統治技術，與史達林之極權相較，二者所加於人衆切膚之痛，初不因前者標尚宗教理想後者標尚唯物史觀而有以異也。如謂理想主義的唯心論在現實中壞的影響與唯物論的有何不同，大體言之，前者之危害人類係陰柔性的，而後者係陽剛性的。當然，現代極權主義者如

嫁者，常等於鼓勵其多找外遇。這兩種「哲學」，不是叫人在雲端呵冷風，便是叫人跑進地獄受硫磺火燒。害莫大焉！今後吾人所需要的「哲學」，如其有之，其效應須是使人在平地上過日子的「哲學」。此點容有機會詳析之。因若干唯心論者以爲思想的建構秩序即事物之發演秩序，且視政治經濟制度爲微不足道的「形下事物」，於是，除提倡玄門以外，一任千萬人衆，此身水煮火燒，痲木而不自覺。今日欲反極權以救世界，有而且只有鼓舞、翻新，並充實自由主義。自由主義之精神請注意：譯者所謂「精神」，其意謂與唯心論者所謂之「精神」不同：爲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初葉啓蒙時代之實徵精神。這種精神，指向知識領域，已促起其時之知識革進；指向政治領域，促起大家實實徵徵地爲人權與自由而奮鬪。請注意：人權不是民權或「公民權」，二者大不相同，一字之差，切不可混爲一談也。至少，人權先於（Prior to）民權。一個人是否必須有民權，茲姑無論，但絕不可無人權。人而無人權，則根本活不下去，遑論其他？而且只有救住了人權與自由這一層次，其他一切努力才實徵地可有著落處，人文價值才可有安頓處。）

如果我們以爲大多數人抱有純經濟的目標，而且這些目標與我們生活底其他目標無關，那麼這種觀念是錯誤的。吾人須知，除了守財奴底病態心理以外，就一般人而論，並沒有與我們底生活之其他目標毫不相干的經濟目標。有理性的動物底行爲，其最後不是爲經濟而經濟的。嚴格地說，在一般人底行爲中，並沒有「經濟的動機」，而只有經濟的因素。這些經濟的因素，決定我

那麼我們自然要用一切方法來使我們自己免於注意到那些煩瑣的物質生活，讓一些經濟機構來管理好了。果能如此，我們底心靈便得以自由解放，來努力實現一些高尚的目標。

但是，不幸得很，許多人所相信的這種說法，竟是完全沒有根據的。這些人以爲控制我們經濟生活的權力只是控制著次等重要事物的權力。他們因爲抱持這種想法，於是對於威脅我們經濟自由的制度，也掉以輕心，漠漠然無動於衷。（譯者按：世有若干非知識論方面的唯心論者亦係如此。這一類的人，專門注意一些Socio-Psychological accidents，甚至於一些fantastic constructions。彼等以爲主觀思構的秩序即是或即應是，甚至或必然是外在世界事物發演之秩序。依此，彼等以爲大家賴以正常生存的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等制度爲卑不足道之「形而下的事物」，而不一思，設此「形而下的事物」不存，則所謂「形而上的事物」亦將忽焉而亡。當然，我們不能說，有了形而下的事物即必有「形而上的事物」。在此，譯者只說沒有形而下的事物即不能有所謂「形而上的事物」。個中分寸，極其嚴格，不可絲毫踰越也。如其不然，譯者將成十九世紀的唯物論者。十九世紀的唯物論，如作爲一純哲學學說看，固粗鄙可笑，但無好壞之可言；然而，其所發生的實際心理效應，尤其透過經濟事物所發生的實際心理效應，爲當前世界大禍之一源。但是，與之相對立的唯心論，其所發生的心理效應，專門叫人高高玄玄，在雲端裡御風而行。結果，高處不勝寒，一跌下來便跌進地獄裡了。最壞的唯物論遂得以乘之。世之嚴禁寡婦再

遭到民主程序之掣肘的。他爲了要行得通，必須消滅民主程序。演變所及，不是民主程序阻礙著管制經濟，便是管制經濟消滅了民主：在一長遠過程中，二者是不能並存的。凡此等等，顯然皆係實行中央管制計劃所造成的結果。中央管制計劃背後所依據的思想，至少在西方世界，並未得到普遍的承認，但是，西方許多人却又縱容中央管制計劃之施行：他們是吞食了有毒的果實，然而他們還不知道哩！若干年來，主張計劃經濟的人也會給我們一點安慰。他們說，官方管制「只」適用於經濟方面的事情，而不涉及別方面的事。琦斯（Stuart Chase）是一位最有名的計劃經濟者。他向我們保證，在實行計劃的社會中，「如果只限於在經濟方面從事計劃，而不在別的方面從事計劃，那麼便可保持政治方面的民主。」他之所以作這種保證，是由於他有另一種想法。他以爲，如果我們放棄我們生活中不甚重要的事情，或者放棄我們「應該」認爲不甚重要的事情，那麼，我們便可在有價值的事情上得到較大的自由。許多人因著這種理由，在一方面極其憎惡政治上的獨裁制度及獨裁思想；可是，在經濟範圍中，却常爲著獨裁而喧鬧。（結果，大上其當。其他方面亦莫不然。——海光）

擁護經濟管制的說法，並非訴諸我們底理智，而係訴諸我們底求生本能。這類說法，常常吸引著一些最優秀的頭腦。假若計劃經濟眞的可因吾人犧牲較小的享受而獲得良好的生活與高尚的思想，那麼誰能小看這種想頭呢？如果經濟生活所關涉者眞的只是我們生活中卑不足道的一面，

統制經濟底種種危害

——海耶克教授著《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 Hayek）之第七章

「控制財富生產就是控制生命。」

—— Hilaire Belloc

最大多數曾將自身業務之實際的方面認眞考慮過的人，對於一行管制經濟便多少會走上獨裁路線這件事，是很少懷疑過的。我們大都知道，經濟這件體系是這樣複雜，而且各部門底活動又是相互關聯著的。如果我們要有意予以管制，勢必仰仗一群專家。這麼一來，最後的責任和權力，必至落入一個總司令之手。這樣的一個總司令，如果要認眞執行其職權的話，他底行動一定會

只有個人義務。這種說法，常爲一般所謂「進步份子」採納。（譯者按：夠奇怪的，義務說不獨爲「進步份子」所主張，而且也爲退步份子所假借。地球是圓的。設二人相背而行，行之不久，必至碰面。「進步份子」憑義務說造成一種觀念威力，藉此觀念威力，驅策大家白白自我犧牲，來攪翻世界。退步份子則假借義務說爲一種堂皇語言，迫人白白自我犧牲，以滿足其私圖。「進步份子」與退步份子底目標固然不同，但二者之要求別人白白自我犧牲則一。吾人之作此語言，並非謂人不當完盡其義務。恰恰相反，吾人視完盡義務爲人格之崇高表現。然而，吾人有須指出者，義務之完盡，必須出於自覺自發自動；而不能出於權威之強制或愚弄，設有權利人物天天板起面孔叫人應完盡何種義務，這簡直是敲詐好人最後的一點良心貯蓄，並提此點貯蓄而浪費之。這類行徑，與登徒子對未經世故之純潔少女高唱「愛情無條件論」之作用，將何以異？敗壞作弄至極，必至天下之人皆無良心。即間有一二漏網之魚，亦必深藏其良心於毛衣之內，以免傷風著涼。一個社會如被斲喪到這種地步，恐已「佛菩薩救不得」了。）

復次，一個國家，即使在形式上承認個人權利，或者承認少數人有平等的權利，可是這個國家如果管制人民經濟生活之全面，那麼其承認個人權利之舉會變得一點意義也沒有的。這種情形，已爲中歐許多國家底經驗所詳盡證明了。

譯者附誌：本章有所刪節

有些知識份子陷入一種混亂衝突的思想之中。他們相信威爾斯（E.G. Wells）底一重要主張。威爾斯主張最廣泛的中央管制計劃；可是，他同時又爲人權而熱烈辯護。這兩種主張是互相衝突的。如果我們希望保持個人權利，那麼必至妨礙中央管制計劃。我們要實行中央管制計劃，便無法保持個人權利。我們不能既實行中央管制而又保持個人權利。熊掌與魚，不可得兼。這是一種兩難（dilemma）。威爾斯有時似乎也認識這種兩難，而陷入這種兩難之中。因此，他所擬議的「人權宣言」底條文裡頭，有些話躲躲閃閃，七折八扣，以致未能維護人權底基本要旨。例如，他底宣言聲稱每個人「有權利買賣一切合法買賣的東西，而不受任何等差的限制。」這一條確乎是值得讚賞的。可是，他立即接著說，這一條只適用於「買賣與公共福利相合的那麼多的東西。」加上這一條限制，使使得原來的一條變得毫無價值了。自然，一切加於買賣行爲之限制，照許多人看來，是必要的。因爲他們認爲這是爲了「公共福利」而行的措施。可是，吾人需知，在實際上，這一條款既不能有效地限制什麼買賣，同時又不能保障一般人底權利。（眞是兩俱失之。一切「半調子」式的統制制度，實施之結果，無不如此。行此類辦法，官方固然滿足了一種「統制欲」，但却害苦了老百姓：大家只有悶著買更貴的東西。——譯者）

自社會主義運動開始以來，有許許多多社會改革者對個人權利大肆攻擊。他們說，所謂個人權利，乃一「玄學的」觀念。他們強調，在一個有合理秩序的世界裡，根本沒有所謂個人權利，

外，法治精神便爲之破壞。也許有人不能贊同我們在以上的說法。他們也許會說，蘇俄是否實行法治，端視其獨裁者底絕對權力是否依憲法程序而取得者。（但作此類主張者須知，這樣的玩法戲劇在蘇俄之演出，與電影戲劇之在美國演出正復相似。——譯者）

有些國家實行法治之主要基礎是建立於人權法案上；有些國家之實行法治是建立於憲法的法典之上；有些國家實行法治時所依據的原則是一堅穩的傳統。無論是否這些，都無關重要：有關重要者，乃立法權必須受到限制。吾人之限制立法權，就意味著承認不可讓渡之個人權利，就是承認不可侵犯之人權。（海耶克教授可謂道出法治之根本。——譯者）吾人須知，所謂「法治」，並不就是「依據法律條文而統治」。如果所謂「法治」就是如此，則史達林也可以說蘇俄是實行法治的地區。（譯者按：「法源」如不在一般人民，而實際操諸少數人之手，則任何「法治」形式徒作治理機構行使專斷權力之掩護：使許多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爲此治理機構底行動是「合法的」。一般人常預先假定凡「合法的」便是好的。一究其實，這類的「合法」行動，常常是有害於大家的。因此，這個樣子的「法治」不是以保障人權爲主旨的法治；而是治理機構以「法」來「治」人的「法治」。這樣的「法治」，是政府用來對付人民的「法治」。）眞正的法治，就其重要意義言之，是人民用以約制政府以維護其自己利益的工具。所以，無論法治採取何種形式，其普遍核心應爲保障人權。（正確之至——海光）

該怎樣做。希特勒很可以依照嚴格的憲法程序獲得無限權力。因而，他之所作所爲，自司法意義言之，也可以說是合法的。但是，我們能夠因此說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是實行法治的國家嗎？

在計劃之下的社會，是不能實行法治的。這話並不等於說，計劃社會一定沒有法治可言。我們底意思只是說，在這樣的社會，政府之行使壓制權力，不復嚴格受到事先建立起來的法規之限制。吾人須知，政府可藉法律將其一切意圖與目標合法化，或戴上法律的面具以行之。儘管如此，政府底行爲依然可以是專斷行爲。（這話眞是說得鞭辟入裡，直使玩弄法律者無所遁其形。——譯者）假若有一條法律規定說，官方可以便宜行事，那麼官方之所作所爲，豈非都是合法的？但是，究竟說來，官方此類行徑，不能說是合法的。因爲，祇要通過法律程序給予政府以無限權力，則最專斷的權力都可以是合法的。即使在民主政治之下，設吾人也可如法炮製，則不難製出吾人可以想像得到的最完備的專制政體。（對極了！——海光）

實行法治時，有一面吾人須予注意，即立法權的範圍必須限制。當然，立法權的範圍之限制，乃限於普遍法律之制定。所謂普遍法律，意即前面所說的形式的法律。立法者從事立法時，不許爲何人特別立法，且不許幫助何人利用政府的壓制權力通過何種法案以利私圖。所謂實行法治，並不是說每件事皆受法律管制。（請注意此處。——譯者）恰恰相反，法治之主旨是說，政府的壓制權力只能在法律事先規定好了的條件下才可行使。實行法治時，不許有例外；如有例

只是自由之保障，而且是自由在法律方面的化身。康德說：「如果一個人不需服從任何人，而只服從法律，那麼他便是自由的。」（譯者再補充一點：如果這法律不是依據一人之意志與好惡而定的，而是依據衆人之意志與好惡而定的，則服從此法律之人便是自由人。凡非自願地基於共同目標或共同興趣，而係被迫服從一人者，謂之奴隸。準此，所有極權制度之下的人都是奴隸。）在康德說這話以前，福爾泰（Voltaire）曾用極其相似的語言表示過這個意思。模糊一點的法治觀念，至少自羅馬時代以來即已有之。在晚近幾個世紀以來，法治觀念之受到威脅，從無如今日之甚者。有許多人以爲立法權不應受到限制。這一觀念乃公衆統治和實行民主政治之結果。有人以爲，政府措施只要是立法程序所允許的，法治便可存續下去。這種說法，完全出於誤解法治之意義。嚴格地說，法治之事，與政府一切措施是否合於司法程序，二者關聯甚少。有時，政府行動合乎既定法律，但仍不合法治精神。（這眞是眞知灼見。一個極權政府類似蘇俄者，政權在手，既然一切可爲所欲爲，且一切可以導演戲劇方式出之，當然很不難裝扮得頗合「法治」的樣子，但其蹂躪人權如故。極權政府之所作所爲，根本就是拿「法治」作爲手段，來消滅以維護人權爲要旨之眞正法治。這與共產黨徒之利用民主程序作爲「鬪爭」手段，以消滅民主要旨正復相似。——譯者）古往今來，一個特殊人物常不難獲得充分的合法權力。可是，他不能答覆的一個問題，即是法律是否賦予他以專斷權力，使他得以爲所欲爲；或者，法律是否預先確切規定他究竟應

鮮有不思想迷亂者。思想迷亂，與思想高深，是不可混爲一談的。欲救此類弊病，必先自語意學始。——譯者）

有些人以爲自由制度特徵之一，乃政府一事不作。這一類底人常強調「放任主義」。其實，「放任主義」一詞完全攪混了自由制度所依據的原則，並且使人誤解此一原則。毫無問題，每一政府必須有所作爲。既然如此，政府底每一作爲多少總要干涉到某些私人的事物。但是，重要之點還不在此。重要之點，如前所述，是個人能否預知政府底措施或行動是什麼，並且以此知識作爲張本來從事自己底計劃。這麼一來，個人就可確知外來干涉會達到某種程度，因而他需要預防到什麼程度。（譯者按：這點甚關重要。假若人民運氣甚佳，碰上一個似乎「勵精圖治」的治理機構，今天出一花樣，明天又出一花樣，以滿足其似乎熾盛之企圖心。花樣既然日日翻新，層出不窮，則人民心理在虛懸之中，亦若賭博之猜單雙者然，凶吉莫卜，心旌動搖不已，尚能眞安住樂業乎？尚能放手從事經營乎？）例如，政府管制著度量衡制，或以其他方法防制詐欺之事，這便是有所作爲。但是，如果政府動輒過分施用暴力，便是不法之舉。政府所訂立的法規，就特例而言，也許聰明，也許不聰明。只要這些法規係爲長久之計，而且並非著眼於使任何特殊分子有利，也非著眼於損害任何人，那麼便不是與自由原則相衝突的。

法治之事祇有在自由時代才被人有意付諸實行。法治乃自由時代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法治不

有人甚至於說，欲求法治行之有效，則較爲重要之事，厥惟建立法規，且行之毫無例外。在一般情形之下，法律如係普遍執行，則法律之內容如何，確乎無關重要。吾人駕駛汽車時，規定靠左走或靠右走，都無關重要，只要大家一律就行了。在法治之下，重要之事，乃法律可使吾人正確預見別人底行動爲何。欲能如此，必須法規對於同類之一切情形都可應用。即使在特殊事例中，吾人感覺某種法規有失公正，亦須一律執行，然後徐圖改正。

吾人須知，法律上形式的公正，與法律前形式的平等，這二者是有著衝突的。有些人對於「特權」概念及其後果爲何，普遍發生誤解。利用特權之最重要的事例，就是將特權用到財產範圍裡。在過去，土地財產權掌握於貴族份子之手。現在。某些人經官方許可保有製造某些貨品之專利權，或者保有出售某些貨品之專利權。無疑，這都是特權。但是，如果所有的人在同樣的法規下都可能獲得財產，而在實際上只有某些人得到財產，我們因此便說這一部分人享有「特權」，那麼我們便是濫用「特權」這一名詞。（這是語意學的解析之一例。許許多多社會主義者，尤其是共產黨徒，窮年累月將個人由此獲得之私有財產宣傳做「特權」，有意或無意誇大社會財富分配之不平。這便是「特權」一詞之濫用。今經海耶克教授指出，此種毛病立顯。在政治學，以及經濟學之非科學的部分裡，這類毛病簡直不勝枚舉。至於表現「歷史文化」所用語言，及此類巨大名詞（big terms）所犯語意的毛病，更觸目皆是。凡不能自拔於語言文字所形成之魔陣者，

謂「進步社會運動」，用亨利·梅茵爵士（Sir Henry Maine）底名言說，就是：「至此，從階級社會遞變到契約社會。」的確，法治之事，較之藉契約而統治，更與階級統治相反。依形式的法律統治之意義言之，在法治之下，不容許特殊人物擁有特殊權利。這樣，就保住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一大原則。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之原則，乃專斷統治之反面。（在專斷統治之下，一人之權力常大於全體之和。——譯者）

吾人須知，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與政府精心策劃以使不同的人得到實質的平等，這兩件事是互相衝突的。任何以直接分配「正義」爲理想目標之政策必至引起法治之毀滅。（亦天下大亂之一源——譯者）如有政府想爲不同的人製造「公平」，必至弄得大家都不公平。（一針見血之言，足爲好事者戒。若要天下太平，必須請老子出山，治國者熟讀道德經。——譯者）我們不能否認，在法治之下，可能產生經濟上的不平等。然而，法治之造成經濟的不平等，並非有意以一特殊的方法爲特殊人物獲致利益，也並非有計劃地使另一部份人陷於貧困。（在極權統治之下，那抽象而不可及的「國家」及其實際的掌握者變成實際的財主，餘衆悉變成赤貧。——譯者）社會主義者和納粹往往反對「純粹」形式的正義。他們常常反對那對於特殊份子無利的法律。因而，他們反對司法獨立。同時，他們支持自由權利學派（Freirechtsschule）這類的一切運動。這類的運動根本是破壞法治的。凡此等等行徑，皆爲社會主義者和納粹底特徵。

在實際上，計劃之事如愈來愈廣泛，則吾人愈須分判何者爲「公正」，或何者爲「合理」，以便制定法律條款。可是，時至今日，許多人却不斷將混含不清的名詞介紹到立法和司法領域裡來；而且專斷之事與日俱增；不依確定法規而行之事，層出不窮。我們可以寫一部法治衰落史，或者寫一部立憲國家（Rechtsstaat）沒落史。在法治衰落的情形之下，所謂法律，充其量不過政策之工具而已。（吾人試觀現代幾個極權統治示範區，其法律從制定到行使，徹頭徹尾成爲政策之工具。於是，在此類地區，愈行「法治」，則極權統治之毒害愈藉法律工具而擴散。這種情形，與民主國家之有法律與行法之結果剛好相反。所以，同是法律，其作用之好壞與否，端視其建立於何基礎之上與夫作用於何種情境之內而定。欲實行以維護人權爲主旨之法治，必須創建一民主社會。當然，民主社會之創建，又有賴乎法治之推行。二者互爲函數。——譯者）說到這裡，我們必須一再指出，在德國，法治早已走向衰落之途。在希特勒握權以前，德國之法治早已呈江河日下之勢。不僅如此，德國走向極權政治之計劃，在希特勒完成之前，即已完成了許多。吾人之指明此事，實至關重要。

無疑，經濟計劃之施行，必須審愼區別各種不同人物之特別需要，並且容許某些人可以從事他人所不願爲之事。（例如，賣臭豆腐——譯者）施行計劃經濟時，如須制定法規，規定富人應如何，而且何種人物方可從事何業，則形成階層統治。階層統治乃「進步社會運動」之反面。所

爲偏私，不可得也。當制定法規時，如可預見其將產生特殊效果，則法律不復僅爲人民所用的工具，而且成爲立法者對人民之工具。這樣一來，政府不復成爲實現大家底利益之工具，即不復爲幫助大家充分發展其個人能力之工具。在這種情形下，政府就變成一「道德」機構。我們在這裡所謂道德，並非與不道德相對立的東西。我們所謂的道德機構，要將其對一切道德名目科諸屬此機構的份子。至於政府底看法究竟是道德的，或者是極其不道德的，都無關重要。在這種意義之下，納粹或任何其他行集體主義的國家都是「道德的」，而自由國家則否。（同此「文以載道」之類型者，常爲以政府作實行高踞於其上的一黨底「主義」之工具。此類之典型範例，當推蘇俄爲首。其他若干地區，近數十年來，不過有意或無意師法之而已。政府既成一黨實現其「主義」之工具，於是勢必藉口將思想言論套入此一「主義」而後已。於是而智性活動絕矣！——譯者）

也許有人說，凡此等等，都不成爲嚴重的問題。因爲，經濟計劃者在決定這類問題時，不需也不應爲他個人底偏見所左右，而係以衆意爲根據。衆意以爲好者，彼須以爲好；衆意以爲合理者，彼須以爲合理。有些曾經從事一項特殊工業計劃的人，常以此項見解爲然。彼等以爲，從事一項事業時，如此項事業對於大家有直接利益，則從事此項事業便無不可逾越之困難。照我們看來，這類經驗並無何等證明作用。之所以如此，因當計劃執行時所關涉者唯一特殊事業之「利益」。於是在一特殊範圍內的人可能大獲其利。在一特殊範圍內的人大獲其利，全社會不必獲利。

我們在以上所陳述的是形式規律和實質規律。這兩種規律之間的不同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必須予以注意。當然，在實際上，我們極其不易把這二者之間的區別劃分清楚。不過，其中所含的普遍原則，却很簡單。我們根據形式規律可以預先知道，在某些情況之下，政府將要採取何種行動。形式規律中不包含時間、地點，或特殊人物。形式規律是藉著普遍的名詞表示出來的。因此，形式規律所能指明的，是一些典型的情境。任何人可以有機會置身此類情境之中，而在此類情境中時，形式規律就可以適用，來達到許許多多不同的人之不同的目標。依據這類形式的規律，我們又可以知道，在何種情境中政府可依何種確定的方式而採取何種行動；或者，政府要求人民依照何種方式而行動。我們一般人具有這種知識的話，便可自行計劃自己底事業。所以，形式規律是對於一般人有用的工具。我們之所以要建立形式的規律，爲的是使一般人得以遵行。尤其得以在不能事先詳細規定的情境之下遵行。在實際上，我們不知道這種規律之具體的結果爲何，我們也不知道這種規律會幫助我們進行什麼特殊工作，我們更不知道這種規律是否有利於某些特殊的人。形式規律只圖建立起對於一切在其影響之下的人都有利的形式。這是我們在此所謂的形式規律之最重要的標準。

當著政府採取的政策所產生的確定結果對於特殊份子的影響如爲吾人所可逆料，而且政府之採取此項措施其目標係爲了便利私人，那麼這些結果是不能不被大家看出的。這樣的立法，欲其不

政策所欲達到的目標。法律條文是可以預先制定的，是可依形式規律底模型來制定的。但是，在法治之下，這些規律之制定，並非爲了特殊的個人達到其特殊的目標，或滿足其特殊的需要，這些規律只是滿足各個人之各種不同的目標之工具。這些規律之制定也，應係爲一長遠過程作打算。在此長遠過程中，我們不能確知這些規律是否只便利某些特殊人物，而不便利其餘的人。（法律之公平精神才由此顯。——譯者）

集體主義這一類底計劃經濟，如付諸實行，必至與法治截然相反。在計劃經濟之下，主持計劃經濟的官方不能給個人什麼機會來利用資源。主持計劃的機構也不能預先限制它自己，來服從一普遍的形式規律。這種規律是可以防止其行使專斷權力的。就常理而論，官方必須滿足個人底實際需求，並且在許多需求中小心加以選擇。官方必須常常爲個人決定問題，而這些問題不能僅靠一些形式的原則來解答。官方在作這些決定時，還得區別不同的人之不同的需要，看其價值孰大孰小。官方在作這些決定時，不僅不能從形式的原則推論出來，也不能從那預先爲長遠時期的行動而建立的原則推論出來。官方要決定這類有關的許多細節，必須依照當時的特殊情況而定；並且，必須平衡各個人和各個團體之不同的利益。這麼一來，結果有些人的看法便決定了誰底利益更爲重要。於是，這些看法成爲當地法規之一部份。這種法規叫做實質法規（substantive rules）。

雖然如此，實行法治的主要之點是再清楚明白不過的。這一點就是，行政機構之行使壓制權力必須儘可能的少，愈少愈妙。（譯者按：這點剛好與極權統治相反。極權統治是行使壓制權力越多越好。良以極權統治主要依賴壓制權力以維持其存續。設有一朝失去此種權力，極權統治必至崩解無疑。）吾人須知，當政府改變一般人民實現其目標時各自採取的方法，政府便是在這一範圍內限制了個人自由。遇有這種事情發生，依據法治，人民應須採取相當行動阻止政府干擾個人的行爲。在已知的民主政治規律以內，個人皆得自由追求其個人目標，以及設法滿足其個人欲望。無論如何，政府不應運用其權力以阻撓個人此種努力。（但是，在極權地區如蘇俄者，則「明令禁止」之事多至不可勝數。訓至人民一舉一動，動輒得咎。大家之生活，宛如飛蟲之誤入蛛網。——譯者）

我們在從前說過，經濟生產行爲應由個人所決定，且此種行爲永久在法治結構以內行之。可是，在計劃經濟下，如所週知，經濟行爲則由一中央機構所控制。法治與專斷統治，這兩種政治是比較普遍的政治分野。而自由經濟與計劃經濟這兩種經濟制度，則爲法治與專斷統治這二種較普遍的區別中之特例。在法治之下，政府底措施，係以固定的規律爲依據。這些固定的規律，決定我們在哪些條件之下得以利用哪些可能得到的資源，並讓各個人自行決定用這些資源做些什麼。在行使專斷權力的政府統治之下則不然。在這種政府統治之下，政府常好把生產之事導向其

ient-necessary condition）。這也就是說，沒有上述意義的法治一定沒有民主政治；但有了上述意義的法治，而其他條件未滿足時，不必即有民主政治，由此可證：行上述意義的法治，不必是民主政治底保障，更不必是到民主政治之路。

海耶克教授在此指出，法治底根本著眼點是保障人權，保障無可侵犯的人權。這眞是畫龍點睛之筆。有而且惟有從保障人權這一點出發來建構法治，並推行法治，才能實現貨眞價實的民主政治。

法治的要旨

在自由國家，政府是遵行法治這一大原則的；而在專斷權力盛行的國家，政府不識法治爲何事。這是自由國家與獨裁國家之間最大的區別。現在，我們且撇開一切專門題目不談，而討論一些原則方面的問題。一般說來，所謂法治之遵行，就是政府在採取任何措施或行動時，都依照事先規定的和宣示了的規律而行事。這樣的一些規律使我們得以事先確確切切知道，什麼情況之下，政府會行使其壓制權力。然後，我們根據這種知識，來打算個人底事業。自然，這只是一種理想，而且這一理想從未完全達到。因爲，立法者和執行法律者都是人，人有人可能發生的錯誤。

關聯。依同理，如果僅注重法治形式，一個國家固然可能走上民主之途，但也可能走上極權之途。因爲，我們只能說極權國可惡，但我們不能說極權國毫無司法。如果所謂「法治」是上述意義之下的「法治」，那麼極權首領可以振振有詞地說：「我們底法治比你們行的更徹底。」在事實上，即使是這個地球上低度的極權地區，其統治權力通過法律形式所加於人民的精神與身體雙方的束縛，也遠多於任何高度民主國家。我們能夠因此說這樣的地區比民主國家更行法治些嗎？吾人須知，如果所謂「法治」就是在法律形式之下實行治理或統治，那麼這樣的「法治」是可作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之工具的：民主政府固然可以用這樣的「法治」來推行民主政治；極權政府同樣可以利用它來推行極權統治。君不見極權人物，他明明要殺人，明明要消滅異己；但他先「頒佈懲治反革命條例」。這就是使殺人合法化。殺人合法化，可以殺得振振有詞，殺得冷靜，殺得整齊劃一。從這一角度來看，上述意義之下的「法治」，對於極權統治而言，如虎添翼：它使極權統治多一個「武器」。這個「武器」，可使極權統治之下的地區造成靜待宰割的「革命秩序」。悲夫！

依照這一番解析，吾人可知，上述意義之下的「法治」，根本是中立性的東西：它與民主政治並非有必然的血緣，固然眞正的法治在近代係由民主政治衍產出來的。上述意義的「法治」之於民主政治，只是一種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並非充足而必要的條件（Suffic-

法治底要旨

——海耶克教授著《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 Hayek）之第六章

譯者的話

許多在引領企望民主政治之實現時，極力倡言法治之重要。誠然，這種行動，與民主政治之實現，並非不甚相干。不過，在這些人中，似乎普遍流行著一種錯誤觀念。他們以爲所謂「法治」，就是人民守法，政府行法。他們以爲這樣作去，一個國家便可望躋於民主國家之林。不幸，這種想法，用邏輯傳統底名詞來說，就是「不相干之謬誤」（fallacy of irrelevance）。我們用筷子固然可以挾肉，但是我們也可以用筷子挾白菜。嗜肉之徒不能說用筷子與有肉吃有何必然

前一種說法係就權力之泉源說。主此說者，以爲只要主權操之在民，治權操諸政府，則可防止獨裁之危險。這個說法。在現代統治技術之前，是會落空的。茲以經濟事項爲例。時至今日，股票持有人不過是名義上的經濟主權者。股東大會一開過，實際掌握經濟大權者爲經理人員。股東固無法對盈虧負責也。後一說法尤其不通。權力底泉源不在人民，從何而限制權力之專斷？民主不能只行一半。要行民主，必須從頭到尾都行：必須從權力產生底泉源一直到權力之行使，都是民主的。）民主的控制可能防止權力之專斷化。但是，僅靠民主的控制，尚不足以語此。如果民主政治決定做一種工作，而這種工作又一定不能藉固定的規律行使權力，那麼民主政治遲早也會成爲專斷權力的。（所以，行民主政治時，議會機構必須時常防止行政部門「偷關漏稅」的僭權情事。——譯者）

譯者附註：本章之與當前論點不相干者，已酌予略去。

」而枉顧實行之手段者反省，尤願天下人洞察那隱藏於假名實行「理想」者心中之權力慾所造成之大禍。茲以共產黨人爲例。彼等倡言共產主義。若干人誤以爲眞，起而盲從附和，及至彼利用此盲從附和之力量造成暴力統治，立即實行所謂「民主專政」，於是億萬人衆於「共產主義之利益」未見，而極權之苦味先嚐。此一天大教訓，可不記取哉？吾人對於其他一切性質類似之「理想」、「制度」，或「主義」，都應存此戒心。以譯者觀之，「主義」、「權力」，與「獨裁」乃不可分之三位一體（Trinity）。數十年來，世界所發生的鐵的事實，可證吾言之不謬——譯者）同時，我們如要大規模地施行中央管制，獨裁制度乃最有效的制度。計劃經濟與民主政治是格格不入的。民主政治乃掃除自由之障礙的一種制度。而在指導經濟活動上，自由又是如此之必要。所以，計劃經濟與民主自由不能並存。可是，如果民主政治一天不能保證個人自由，那麼計劃經濟便會一天在極權統治之下以某種形式而存在。「無產階級專政」，即使在形式上是民主的，如果實行中央管制的經濟制度，則其對個人自由的破壞之程度，必遠過專制政治所未達到者。（所言是實——海光）

有許多人相信，只要權力之最後的根源握諸大多數人之手，專斷權力便不能產生。這種想法是錯誤的，而且是沒有根據的。不過，這種說法所引起的反面說法也是不正確的。反面的說法謂，我們欲防止權力專斷化，並非求助於權力產生之泉源，而係藉著限制權力之行使。（譯者按：

標。我們實行民主政治，並非爲了實行良好的公共行政，而是爲了公民社會在追求其最高目標時得有一安全的保障，是爲了滿足私人生活時得有一安全的保障。」自由如此，民主亦然。民主政治是一種程序，是一功利的方法。我們藉著這種方法，可以保障內部和平，以及個人自由。既然如此，民主政治並非無有失誤，也並非確切無可置疑的制度。在某些專制統治之下，較之在許多民主政治之下，常有較高之文化的或精神的自由。至少，我們可以想像，由極其同質而且同樣堅持一種信仰的多數人所構成的民主政府，在其施行統治權時，其對人民之壓迫，可能與最惡劣的獨裁政治無異。（此是公允之論。所以，羅素說，狂熱足以招致危險。在民主政治之下，尚有此危險；在非民主政治之下，除毒惡與令人窒息之外，更何堪設想！——譯者）可是，我們必須知道，實行計劃經濟，遲早會走上獨裁之路。因爲，獨裁制度乃施展壓制之最有效的工具，而且也是推行什麼「理想」之最有效的工具。（斯言良是。所以，在政治範圍中，凡狂熱地堅持大家應該遵行某種「制度」或奉行某種「主義」的人，最易有意或無意採取獨裁或極權政治。因爲，他們要拿獨裁或極權政治作爲推銷其自以爲良好的「制度」或「主義」之工具。爲推銷其自以爲良好的「制度」或「主義」而實行獨裁或極權，彼認爲係出於必要，或「目的可使手段成爲正確」的，於是而「問心無愧」，而理直氣壯。然而，此法一行，「制度」與「主義」未見實行，而獨裁與極權之禍先臨。此所以近數十年來天下大亂也！說至此處，願天下之信奉「制度」與「主義

不能予吾人以任何指導。計劃之事，如付諸實施，結果必至造成有絕對權力的人，吾人需知，整個的計劃制度，是趨向以大衆爲墊脚石的獨裁。在這種獨裁方式之下，政府首腦藉著大衆投票，一次又一次地鞏固其既得的地位。他們處於這種地位上，便能夠確使投票之舉隨著他們所希望的方向發展。（這是極權主義者玩弄民主技巧之一。由此吾人可知：民主的選舉固常投票，但投票不必然爲民主的選舉。可是，許許多多民主人士常有一項錯誤的推論：他們以爲實行民主選舉常投票，因而投票係民主的選舉。這是一項由錯誤的推論所產生的錯覺。和尚固然唸經，但唸經的不一定是和尚也。但民主人士常在此錯誤之中。極權份子遂得利用民主人士此項錯誤，導演投票選舉的把戲，造成民主人士以其爲實行民主之錯覺，遂得混水摸魚，從中取利。——譯者）

現在有人常說，實行民主政治，就不應該容忍「資本主義」。照我們看來，如果所謂「資本主義」意即自由競爭制度，而自由競爭制度係依據於自由處分私有財產的制度之上，那麼我們最重要的事就是認清，只有在自由競爭制度以內，民主政治才有實行之可能。然而，當民主政治受集體主義的教條之支配時，民主政治便無可避免地毀滅其自己。（此處吃緊——海光）

我們說上面的一些話，並無意於視民主政治爲神明而崇拜之。在我們這一代，關於民主政治談的太多，想的也太多了；而關於民主政府究有多大的價值，則很少人過問。阿克頓爵士說：「自由並非不是實現較高政治目標的方法。就民主政治底本身而論，它就是我們所要達到的政治目

我們將無法免除這樣的混亂。」抱持這種思想的人是很多的。在德國，甚至在希特勒掌權以前，經濟計劃運動已經大有進展。一九三三年以前的某些時候，德國底民主政治已瀕於破滅。像伯魯寧（Bruening）這樣忠誠的民主份子，已不復能像施萊布（Schleicher）或巴本（Von Papen）那樣本著民主方式來治理德國了。到了希特勒，已經並非必須破壞民主政治不可。他不過是利用民主政治衰落的情勢，並且在德國危機臨頭之時獲得許多人支持罷了。這些人雖然極其憎惡希特勒，可是他們又覺得希特勒似乎是唯一力足做點事情的人。因此，他們只好擁護希特勒。（這眞是莫奈何，這眞是人類歷史轉型期的常有悲劇。——譯者）

計劃主義者鑒於民主主義者之評擊，常常提出一些論據來緩和民主主義者。他們所提出的論據之一是說，只要民主政治掌握著最後的控制權，則民主政治的要素是不會改變的。曼海門說：

> 計劃的社會與十九世紀的社會唯一不同之處，是社會生活越來越受國家干涉。但是。如果少數人所行的統治能被議會的統治所牽制，那麼多數人的統治亦然……在民主國家，統治權可藉無限的權力而增強，且不致棄絕民主的統治。

這一信念，忽略了一項事實，即計劃的社會與十九世紀的社會之間有一項重要的差別。當然，議會可以控制並且執行一定的指導原則。我們可以把議會當作安全活塞；甚至可以當做一個便利的媒介。官方對於不滿份子的答覆，可以藉著這種媒介而爲大家所知曉。但是，計劃之本身却

行動的「社會價值標準」，在事實上，一定囊括著一切個人底目標。

國家實行計劃經濟時，我們之需要意見與行動之齊一，遠較平時所需要者爲多。民主政治如依附於計劃經濟之上而施行，其後果爲何，實不難預料。一般人也許同意採取管制的經濟制度。因爲他們相信管制的經濟制度可以產生更多的財富。我們知道，在討論究竟採取何種經濟制度時，計劃經濟底目標，據說是爲謀求「公共福利」。其實，這類名詞不過表示大家對於計劃底目標並沒有眞正一致的看法而已。在行政機構將一個單獨的經濟計劃改變成一個特別的經濟計劃時，我們必須確切決定究竟應須具體做些什麼。問題一提到此處，各人底意見就不盡相同了。大家同意須有一中央管制計劃，但又不同意一個特定的目標。這正如一羣人在一起旅行，可是關於究欲何往，各人也許各有其目的地。在這種情形之下，這些人都不得不旅行，但其中最大多數的人却不得不到那不願往之處。在計劃經濟的制度中，我們所從事的集體工作，不僅僅限於我們所同意的那些，我們還被迫做許多多多工作，以便經濟計劃之完成。這是計劃經濟制度下無可避免的結果。（於是，人都變成了機器底零件——譯者）

計劃經濟運動中有一特徵，就是要求經濟範圍裡有一獨裁者。吾人須知，經濟範圍裡的獨裁，可以逐漸破壞政治上的民主。哈利維（Elie Halevy）認爲克利浦斯爵士（Sir Stafford Cripps）等人都會同意說：「我們是生活在經濟混亂之中，除非在某種獨裁方式領導之下，否則

，至少是窮人底常識。但許多「搞組織」者則昧於此理。彼等之統治慾特別旺盛，旺盛到沖昏了腦筋，以致對於「被組織者」之要求之高，常高過父母對子女之要求。彼等不獨要管其行動，且要管其「思想」。這樣一來，勢難避免下列結果：強梁者不受其「組織」——其實是部勒或驅策；受其部勒或驅策者率皆無能之輩。在一特殊情境之下，如人衆無法脫離「組織之網」，則爲生存計，大家對苛煩之要求常應之以軟性的敷衍。此所以，在像蘇俄這樣的地區，習於虛假，乃普遍現象。這眞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譯者）

祇有當國家底行爲是大家所自動同意的時候，我們才能信賴大家的公意，並憑此以指導國家的行動。可是，對於某些事項，當公衆的同意不存在時，國家常直接管制這些事項。一旦國家直接管制這些事項，個人自由必遭抑制。在公共的場合裡，國家管制著所有的工具。一旦公共場合之範圍超過全社會底某一比例，則國家行動所發生的結果便宰制著整個的社會體系。有時，國家雖然祇直接掌握著社會資源之大部分，可是國家所作決定對於社會經濟結構其餘部分的影響則甚大。於是，國家幾乎間接控制著社會上一切的事物。德國早在一九二八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直接控制著國家歲入大半之用途。依德國官方底估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控制的，有歲入百分之五十三。這樣一來，政府幾乎控制住了德國全體人民底經濟生活。（這眞是可怕——譯者）在這種情形之下，個人如欲完成任何事業，若不倚賴政府之助，便很少成功之希望。指導國家

（例如，大家現在從事反對共產制度。可是，大家並非爲反而反。大家之所以反，各有其目標在：商人將來得以自由經商，工人爲了得以自由做工，學人爲了得以自由究學。……——譯者）

當著許多個人聯合起來從事一項工作以達到他們共同的目標時，他們爲達到此目標而形成的組織，比如像國家，被賦予他們自己的目標，以及他們爲達到這些目標而自定的方法。（這麼一來，個人中心論建立。而一般所躭心的個人與羣體不能相容之說不能成立。同時，少數自私份子不得假借「國家」、「民族」、「社會」、……之名，拂逆衆意，以遂其私欲矣！——譯者）在國家底權力高於其他一切組織之時，依各種目標而形成的組織依然是一個「人」。因此，在有限的各別範圍裡，任何組織底目標依然至高無上。（所以，政府不得挾「國家」以凌之——譯者）這裡所說的範圍之限制怎樣劃分呢？各個人對特殊的目標都同意時，其目標才至高無上。過此限制便爲不可。當然，如各個人所事之項目增加，則各個人對某一特殊事項同意之蓋然程度會減少。（此點從事「組織」者需能明瞭。一個組織對各個人之要求事項愈少愈妙——應須嚴格限制於最低限度之必要條件上。個人對組織所能支付之多少與組織對個人要求之多少恒爲逆向變化。一組織對各個人所涉及與要求者愈增，則個人所能支付者將愈減。此與向人借貸之理類似：向人借錢者，數量愈少，借到手的機會將愈多；向人告貸的次數愈少，借到手的比例將愈多。反之，告貸的數目愈大，借到手之把握將愈少；向人告貸的次數愈多，借到手的比例將愈少。這本是常識

素。所以，正如迭斯尼所描寫的一樣，黑暗的夜幕過去，光明的太陽照耀，巨靈和小鬼們會一齊消失得無踪無影。迭斯尼底幻想曲裡所描寫的，雖然是他自己的幻想，但正像一篇魔鬼社會始末記。史達林之流，就是這種魔鬼社會之創造者。他底這種創造天才，正是人間地獄化之一因，但却爲後來的共產型模人物羨艷不已，日以繼夜模倣之不暇。此所以亞洲浩劫橫流不已也！要挽此狂瀾，首先必須把個人從此等魔掌中搶救出來，讓各個人底腔子裡各裝上自己的靈魂，呼吸自由的空氣，正正常常地作個人。）

我們主張個人主義，並不反對人應有其社會目標。無寧，我們認爲個人底目標須有與別人的目標相契合之處。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各個人底努力配合起來。不過，照個人主義者看來，這種配合是應有個限度的。（請留神此處——譯者）限度在什麼地方呢？只有在各個人底看法符合時，各個人底努力才可配合起來。（組織問題才由此發生——譯者）一般所謂的「社會目標」，就個人主義者看來，等於許多個人底目標；或者，等於各個人願意努力以赴的目標。這一目標達到後，各個人底欲望便可得到滿足。因此，所謂共同的行動，只限於各個人所同意的那一範圍。在最大多數的情形之下，這種共同的目標並非個人的最後目標，而只是不同的個人爲了達到不同的目標而採取的途徑。在事實上，一般人所常同意的共同行動，乃能達到一共同目標的行動。但是，這一行動所能達到的共同目標，往往並非一終極目標，而是可能達到各個人的目標之一手段。

分。而且，嚴格說來，價值標準存在於個人心中，因而只有一部分底價值標準存在。我們底價值標準與別人底價值標準不同，並且往往彼此不相一致。這是無可避免的事實，也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個人主義的哲學只是從這類事實出發的。從這類事實出發，個人主義者認爲，在一定的限度以內，我們必須依照自己底價值標準和抉擇行事，而不依別人底價值標準和抉擇行事。在這種範圍以內，個人所定立的目標系統是至高無上的，不受任何他人底獨斷所左右。這樣看來，個人是他自己底目標之最後的裁判者。個人自己底看法和想法盡可能地支配著他自己底行徑。（譯者按：以上係就自由社會裡的個人而言，至於在俄式極權空間，一切無不反此道而行。在俄式極權空間，除了如史達林的一人以外，已無完整意義的個人。在這類空間，一般的個人已無意志的存在，已無思想的存在，已無獨立的經濟之存在；個人所餘者，唯物理的存在、生理的存在、呼吸、消化，及生殖機能之存在。這樣的個人，在長期的心理痲痺之下，在政治權力底威脅之下，在官爵與利益底招誘之下，自然祇有完全依照別一個人底價值標準和抉擇而行事；並且久而久之，居然成爲風氣，習染者毫不自覺，視若當然。於是，這樣的社會，像迭斯尼底幻想曲裡所描寫的一樣，無數小鬼在一個巨靈底指掌之下忙亂不已。這樣的社會，乍然看來，也許花花綠綠，熱鬧非常。其實隱藏在這花綠鬧熱背後的，是無限的茫然，無限的愴涼，無限的虛幻。在這種社會裡，絲毫沒有生機在那裡滋長，很少人味存乎其間。這種社會之構成與延續蘊涵著其自我毀滅的因

到一套熟籌已久的禮教之支配，受到無數禁制（taboo）之限制。（譯者按：自現代極權政治興，政治教條則取此等禁制之支配地位而代之。）在這種限制之中的人，一言一動，很少會想到與其儕輩不同的。（現在的俄式訓練，就是要造成這種優良成績——譯者）

如果有人企圖依照一個單一的計劃來規定大家底一切經濟活動，那麼勢必引起種種問題。我們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乞憐於一種道德規律。可是，現存的道德規律却不能解答這類問題。關於這類問題，一般人要麼沒有確定的看法，要麼各人底看法互相衝突。因爲，在吾人所生存的自由社會中，我們簡直沒有機會去思索這類問題，而且更不易形成關於這些問題的公共意見。

我們不僅不能得到一種無所不包的價值標準，並且任何人都無法確知不同的人之各種不同的需要何在。任何人底觀察力不能超越一有限的範圍以外。他對別人底迫切需要之感覺也不能超過一有限的範圍以外。無論一個人底興趣是否集中於他自己底物質需要，或者他熱烈地關切到他所知道的每個人底福利，他所要達到的目標往往不過是全體人類需要之極小部分而已。（明乎此理，許多人可勿勞爲「大衆福利」操心——譯者）

上面所說的，是個人主義底全部哲學所依據的基本事實。個人主義底哲學並不假定人是自我主義的，或者是自私自利的，也不認爲人是應該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者注意到一項事實，即是人的想像力有許多限制，這些限制使我們所作的價值標準充其量只能顧到整個社會需要之一部

單言之，這種辦法就是預先假定有一完備的倫理法典存在。在此倫理法典中，一切不同的人文價值都可給予適當的安排。

所謂完備的倫理法典，這一概念似乎不是大家所熟悉的。我們需要鼓起一點想像力來看這一概念究竟包含了一些什麼。我們並不以爲世界上有完備的倫理法典。在事實上，我們是常常在不同的價值標準之間作一選擇。我們在作這類選擇時，並不需要一個倫理法典預先規定我們應該怎樣選擇。至於在我們底社會裡，我們在這些道德性的場合中應該做些什麼，我們爲何能夠發展出一個共同的看法，這是沒有什麼理由可言的。在這樣的一個世界上，我們應須知道我們底道德法典到處都是漏洞。

如果我們有了一個完備的倫理法典，那麼是否要好些，這個問題我們現在不加討論。我們現在只是指出，文明之成長愈高，個人底活動愈少受固定規律之束縛。（例如，文明人底行動不若野蠻人底行動之受禁忌底束縛——譯者）我們通常的道德法典是由一些規律構成的。時至今日，這類規律爲數日益減少，而且其性質則日趨普遍。（這眞是巨眼觀透。請強調所謂「歷史文化」之獨特性（uniqueness）者試冷靜一思。歷史文化如有其獨特性，根本是部落主義之一方面。這一方面，在世界日趨普遍化（universalized）之歷程中，徒起阻礙作用，徒作強權政治之工具，何值戀念？更何值死揪著不放？——譯者）人類自原始時期以來，幾乎每個人底日常生活都受

蒙混之下，基於私念，對一羣無可奈何者之愚弄與驅策。眞正的組織是人類文明發展之一較高的形式。這一形式，只有在承認個人有其尊嚴與獨立自由發展的民主社會裡才得到比較充分的表現。唯有在這樣的社會裡各個人將其智力和體力相當發揮出來，多少各有成就，才有資據可供組織。）

我們知道，社會組成時常有「社會鵠的」（social goal），或「共同目標」（common purpose）。可是，這些名詞常常被人錯誤地描寫爲「共同的好」（common good），「普遍福利」（general welfare），或「一般利益」（general interest）。我們不必深究即可知道，這些名詞並無確切的含義。因而，我們不能藉著這些名詞之指示來決定任何特殊的行動，以爲社會謀求福利。億萬人底利益與幸福不能用一種單獨的度量衡制來測量其有多少。一個人底利益，正像一個人底幸福一樣，是許許多多事物條件構成的。這許許多多條件必須作無窮無盡各種不同的配合才能構成一個人底利益。我們也不能說一個人底幸福是一單獨的目標。一個人底幸福是一系列底目標；是一個包羅甚廣的價值系統構成的。在此系統之中，每個人底每一需要可以得到滿足，但是，集體主義者則主張依照一個單獨的目標來規定我們底一切活動。這種辦法就是預先假定我們每個人底需要是被安置在一個價值秩序裡，然後分出高高下下來。他們並且以爲這個人爲的價值秩序是很完備的——完備到足以在計劃者所須選擇的一切不同的行動中加以決定。簡

主其表而極權其裡。集體的形式不一：在左翼方面，強調「黨派」與「階級」；在右翼方面，強調「民族」、「國家」。但是，極權分子常將二者加以化合而運用之。彼輩在何時強調「階級利益」，在何時乞靈於「民族國家」，端視實際政治利益之需要而定。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共產黨失靈，史達林則訴諸俄國人民之國家情緒。現在，亞洲的共產活動訴諸「民族解放」運動來推行。由此可知，對個人主義的憎惡之情緒，如非出諸「黨派第一」與「階級至上」主義者之製造，便常出諸落伍之軍國主義。論至此處，也許有人說：你這樣高唱個人主義，反對集體主義，組織問題從何談起呢？組織問題無從談起，何以應付緊急事態？老實說：請你別把「驅策」與「組織」混爲一談。在集體主義之下，根本就沒有組織問題；唯有在個人主義的大前提之下，組織問題才會發生。幾時聽到有人說豬羣、牛羣、馬羣發生過組織問題的？在集體主義之下，人底尊嚴喪失淨盡，人已經不是貨眞價實的人，變爲豬羣、牛羣、馬羣似的一大堆有待權力者隨意擺佈的人畜（human cattle），組織問題從何發生？實在說來，在以集體制度爲基礎的極權暴政之下，如有所謂「組織」之類底事，則唯有對愚衆之有計劃的蠱惑、麻醉、催眠諸般精神虐待，以及進而奴役、部勒，與壓制諸般身體虐待而已。所以，我們一聽到共產黨徒談「組織」，便不寒而慄。共產黨要「組織」我們，是我們反共理由之一。共黨底「組織」方式，不獨是民主之敵，而且是善良人類之敵。其實，眞正的組織是不應反對的。我們所應反對的，是在「組織」大帽子的

視的。可是，照許多社會主義者看來，我們現存的社會發展並不太「有意識地」趨向此類目標。現存社會底種種活動是被許多人底幻想所指導著。而這些人又是不可信賴的。於是，他們對於這類的情形頗爲詬病，而常施抨擊。

這一類底抨擊立刻指向一點，即是個人自由與集體主義之衝突起於何處。我們知道，各種各色底集體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等，他們之間的分別，是各自想將社會活動導向在性質上各不相同的目標。但是，這些主義之間無論怎樣各不相同，而他們一概與自由主義和個體主義不同。（請留心此處——譯者）。他們要將整個社會加以組織，並且統治社會底一切資源，以達到其擬議的單一目標。這些制度底主持者，拒絕承認每一個人有一得以自主自發的領域，而且在這一領域裡個人自身之目標是至高無上的。簡單言之。這些制度是極權主義這一新名詞之眞實的內容。極權主義一詞，我們曾用來形容在理論上叫做集體主義的東西。現代極權主義之產生，固然多少出乎吾人意料之外，但却爲集體主義之不可分的表現形式。（譯者按：無論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在其基本結構上都是集體主義。凡是極權政治必係以集體制度爲基礎。未有極權而不集體者。凡是民主政治必係以個人主義爲基礎。未有民主而反個人主義者。今日世界政治之最大的基本劃分，厥惟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二者之不同，猶如剖西瓜，一刀兩半，判然分明。講民主如反對個人主義，猶吃西瓜去其瓤而啖其皮，尙有味乎？講民主如採取集體制度，必係民

個體主義與民主政治

——海耶克教授著《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 Hayek）之第五章

有的政治家要指導私人應該怎樣運用他們的資本。這樣的政治家不獨吃力去做些最不干己的事，而且是僭取了一種權力，他們所僭取的這種權力，不是民意代表所能承認的。他們之僭取這種權力，與這種權力操諸那自以爲勝任行使這種權力的愚人之手，是同樣的危險。

——亞當斯密

一切派別底社會主義者認爲，一切集體主義制度是爲工人謀取福利的組織，而且這類組織是精心籌劃出來的。這也是一切集體主義制度底共同特點。這一特點是一切派別底社會主義者所重

的社會裡，他能夠注意到普通社會裡的一般「專家」所不能注意到的比較普遍的現象。可是，這是含有危險的事情。相對於我們各人底偏好和興趣而言，我們各人多少可以說是專家。並且，我們都以爲我們自己底價值標準不僅是個人所有的，而且應該是大家所有的。喜好鄉村的人所最注意的事是保持傳統的樣式。他們認爲因工業發達所加於優美鄉村的汚點必須移除。而熱心提倡衞生的人則認爲應該把不衞生的古舊村屋清除。這些人都知道他們底目標可藉計劃完全達到，而且他們都希望因各自底理由而實行其計劃。可是，這麼一來，祇有使各人底目標裡含藏的衝突顯露出來。

計劃運動之所以發生今日的力量，主要歸因於一項事實。即是，當著計劃能表現一種雄圖時，它幾乎激動了一切心志純一的理想主義者。這樣的人是獻身於一個目標的人。可惜，他們要藉計劃而實現的理想，並非對社會廣泛觀察的結果，而無寧是出於範圍極狹的看法。但是，他們却常常大大誇張他們定立的目標如何重要。如果我們允許這些渴望藉著計劃方式來改造社會的人眞個來改革社會，這是非常危險的事。因爲，這些人會變成最缺乏寬容精神的計劃者。他們太狂熱了。我們必須知道，從聖潔的心智、純一的理想主義者到狂熱主義者，其間的相去，往往不過一步之差而已。（古往今來，爲狂熱地實行「主義」或各種狂想曲而大規模枉死的人，遠多於被土匪零星殺死的人。可不戒哉？——譯者）

譯者附記：本章因過長，故略有刪節。

成，任一件事如祇有犧牲他事才能完成，唯有將專門眼光以外所能見到的因素計入才能解釋。這一類的解釋，我們只有動心忍性，作極大的智識上的努力，才可以忍受。我們愈能動心忍性，我們便愈能透過較爲廣濶的原野，用最大的努力完成我們趨向的目標，並且設法平衡在我們直接利益以外的因素。果能如此，我們就可不太注意那直接的利益。

在一個計劃的社會中，熱心的計劃者自信他能徐徐誘導這個社會中各方面的指導者對於特殊目標的價值看得特別重。無疑，有些熱心的計劃者之希望是可以滿足的。因爲一個計劃的社會，較之現存的社會，確乎易於興革許多事項。在德國和意大利有許多堂皇的汽車道路。固然，這些計劃的產物並不表徵自由社會裡不能同樣興建，可是却常被許多人引用來說明計劃之必要。但是，如果我們引用德、意二國這類在特殊範圍裡技術優良的事例來證實計劃確實爲一普遍優越之事，這是一樁愚昧之事。我們不如比較正確地說，像這種極端優良的技術，如與一般人以不利的影響，乃誤用資源底證據。我們馳車於德國有名的汽車道路上，會發現通行於馬路上的車輛少於英國二等汽車道路上通行的車輛。這時，我們就不會懷疑，如果我們修築公路底目標是爲了和平時期的用途，那麼德國之修築那些公路是沒有道理的。經濟計劃者是否決定以「大炮」代替「牛油」這是是另一件事。但是，依照我們底標準看來，許多人之對計劃如此熱中，這是毫無根據的。技術專家幻想，在一個計劃的社會裡，他會特別注意到所要建設的目標。因爲，在一個計劃

到它。遇到這類底情形，需要我們抉擇時，我們可能眞的必須犧牲一些眼前的利益，以換取將來的利益。

工業技術進步之呈現於吾人之前，亦若爲吾人身外之事。實則其所關吾人者至大。當科學上的發明給予吾人巨大的力量時，如果說我們必須使用這種力量來摧毀我們最珍貴的遺產——自由，這簡直是荒誕之至。無論怎樣，如果我們要保持自由，我們必須把自由看得比從前更加愛惜，而且我們必須準備爲自由而犧牲。當在現代工業技術中並沒有什麼東西強迫我們趨向廣泛的計劃經濟時，却有一股力量使計劃權威無限發揮其危險。這是我們時時要謹防的。

無疑，趨向計劃經濟的運動乃官方處心積慮的結果，而並無外在的必然力量迫使我們非走上計劃經濟之途不可。但是，現在却有這麼多技術專家站在計劃經濟底前線地位，這倒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件事。我們要解釋這一現象，不可忽略一項重要的事實。批評計劃經濟的人，必須常常將這項事實牢記在心：幾乎每個技術專家都有技術理想。如果這些技術理想是爲了人類的話，那麼，較之其他理想，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以內實現。這是很少問題的事。

人間美好的事物是多得很的。這些事物都是人所喜好的。但是，吾人生也有涯，而吾人所能享受者甚爲有限。在現實中我們的雄心常遭挫敗，於是技術專家對現存的秩序發生反感。如果我們看見大家認爲美好的事物棄置未予完成，我們在精神上將不堪痛苦。許多事情如不能在一時完

使每個人都只用電，而不再使用煤炭或煤氣等其他燃料，電的價錢將比煤炭或煤氣等低廉。我們至少可以設想有這些事例。遇到這些事例時，如果我們有權選擇，我們可能選擇新的措施，更可能因而使大家的境況得到改善。但是，事實上，在這類情形中，單獨的個人並得不到上述的選擇機會。因爲在這種情形之下，擺在他面前的只有兩途：一是使用同一種便宜的汽車（或者說，大家都只用電，而不用別的）。這樣，便是沒有選擇權了。另一途便是我們可以保有各種貨色的選擇機會。可是，這時各種供我們選擇的貨物之價格必定比那單一的貨物高得多。在像這兩例所表示的情形下，我們底境遇是否得以改善，我們並不確知。但我們必須承認，如果強迫實行標準化，或者禁止超過某種程度的花樣翻新，出品確可大量增加，足夠抵償消費者因在選擇方面所受限制的損失。我們甚至可以設想，將來可能有一種新發明，被大家採用後無疑對大家有益。不過，這種發明却不能被少數人利用。如果我們要利用它。唯有大家一齊使用它。

我們在上面所設想的事例，或者有很大而且恒久的重要性，或者也沒有什麼重要性。然而，無論如何，我們敢確言，從這些事例並不能進而斷定工業技術之進步便使中央管制成爲不可避免的結果。遇到上述的情形，我們只有一件事是必需做的，就是在兩件事之取捨間加以抉擇：一是藉某種強制手段來獲得一種特別的好處；另一便是不要得到這種好處。或者，在大多數情形之下，雖亦想得到這種好處，但不用強迫手段，而是等到技術進步以後把這些特殊困難克服了再去得

增加。

我們知道，把獨佔局面之成長看作係由於工業技術進步所致之學說，還有另外一種說法。不過，這種說法之立論，與我們在上面才討論過的立論幾乎完全相反。這種立論雖不常被人明白提出，但其影響却並不小。這種立論所爭持的，並不是說現代工業技術把自由競爭破壞了。恰好相反，它是說，如果我們想利用現代的種種新工業技術，唯有施行某種保護政策以限制自由競爭。這也就是說，唯有施行一種獨佔的制度，我們才能利用新的工業技術。精細的讀者也許會懷疑這種說法是騙人的、虛假的。可是，在實際上，這種立論並不必然全是騙人的。自然有些人可以明顯地說，只要一種能滿足我們需要的工業技術確實比旁的好，它一定能抵得住一切競爭而終於出頭，用不著什麼保護。可是，這種答覆並不能將這種立論所指涉的情形全部解答。無疑，在許多場合中，這一立論被某些利益集團所利用，作爲他們特殊利益之護符。在更多的場合中，許多人引用這種說法時，根本沒有把所謂技術優良之意義劃分清楚。譬如有些技術，從狹義的工程觀點看是優良的；而有些技術之所以被看作優良的，却是從社會需要著眼的。這二種不同的「優良」，常常被人混爲一談。

不過，這種立論在有一類底情形之下還是頗有力量的。舉例說罷，如果我們能使每個英國人都乘坐同一種汽車，英國汽車工業便能供應一種比美國更爲價廉物美的汽車。復次，如果我們能

的。在此，特別重要的一點就是，只有在自由競爭能夠盛行的情形之下，價格才能完成上述的任務。所謂自由競爭能夠盛行，意即說在市場中的個別生產者不能控制價格之高低；恰恰相反，他必須適應市場價格之變動。祇有在這一條件之下，價格制度才能作調整經濟活動之指標。價格制度像一套能傳遞相關消息的機器，使各人底努力得以互相適應配合。有了這種配合，人與人間便可實行一種知識上的分工。當社會整體變得愈複雜時，靠價格制度來活動的人與人間的知識上之分工愈不可少。

我們可以說，如果過去的工業制度是靠中央管制而成長起來的，那麼決不會有現存的工業制度這樣分工的細緻，這樣複雜，以及這樣富有彈性。如果我們將中央管制與行分散政策並輔以自動的調整之辦法二者加以比較，那麼我們可以顯然發現，中央管制雖爲一種簡單明白的解決經濟問題之辦法，但其笨拙不靈、粗陋，以及應用範圍之狹，實令人不敢置信。（連蘇俄也在逐漸廢除這種制度了。——海光）近代文明是由分工到了相當高的程度才形成的。分工何以能達到這樣高的程度呢？這得歸功於一個事實，就是分工不是靠人有意的製造出來的，而另外一種方法卻被人碰巧找到了。這種方法就是自由競爭。自由競爭能使分工的範圍擴大，其擴大之程度遠超過計劃經濟所能達到的範圍以外。這樣看來，社會經濟組織之發展再加複雜，也不會增加中央管制之必要性。反之，在目前情況之下，我們之需用一種不必靠人作有意控制的技術，比之以前更見

。在這種情勢之下，放棄集中管制的辦法而實行分散政策，乃勢在必行。但是，一旦我們感到分散政策必要時，如何將各部份配合之問題，自然又立刻發生。各部份需要一種配合，使各單位能按照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的一些事實來自由安排他們底事務，並且使他們各自底計劃能相互調整適應。既然實行分散政策之所以必要，是因爲無論何人都不能將那麼多與各個人所作決定有關的一切因素考慮權衡周到，於是在分散政策下的配合工作自然不能靠少數人藉著「有意的控制」來達到了。我們唯有依賴一些適當的安排，傳佈消息，使相關的各單位得以及時獲致所需資料，以便各單位自作決定，隨時有效調整其經濟活動，以與其他單位所作決定相適應。再者，因爲經常影響各種不同商品供求之因素太複雜了，於是其變動之細節無從盡知；即使可能盡知，亦不能靠一中央機構十分迅速地把這些細節收集起來並且傳播出去。時至今日，我們實在需要一個紀錄機，要它能夠自動把各個人行動所產生的相干的效應紀錄下來，又要能從它底紀錄看出各個人底決定總合起來的結果是些什麼。同時，由這總結果，各個人就可爲自己所作進一步的決定找一個指針。

以上所說的，正是價格制度在自由競爭之下所擔當的任務。這類任務是相當艱鉅的。許多其他制度從來不能擔當這類任務。價格制度，使企業家們只要注意比較少數的價格變動，就能調節他們底經濟活動以與別人底經濟活動相適應。這就像工程師注視著幾個儀器上的指針來作決定似

願意引介胡適之先生老早說過的話：「少談主義，多談問題」。）

我們在以上將工業技術進步以後必至實行計劃化的說法作了一番解釋。從這一番解釋，可知計劃主義並非工業技術進步之必然產品。可是，有人用另一種方式來辯護這種理論。譬如有人可以說，近代工業文明十分錯綜複雜。這種情形，產生了許多新問題，如果我們想要有效地對付這些問題，唯有實行中央管制。這種說法，在某種意義下，也是不錯的。但是，這種說法並非在每種意義之下爲眞。舉例以言之，現代都市產生了許多新問題。有許多問題係由人口或事物之密度而產生的。我們如欲適當解決這類問題，便不能靠自由競爭。這是一個極其平凡的道理。但是，我們必須知道，那些藉口近代文明趨於繁複而主張不得不施行中央管制的人，心目中最著重的並不是這類問題（譬如自來水、電燈之類的問題）。他們一般提示給我們的是這麼一番道理：時至今日，我們要獲致圓融的全部經濟活動程序是愈來愈困難了。因此，我們必需專設一中央機構來調配各個部門。祇有這樣辦理，社會生活才不致因混亂而解體。

這番議論實在是出於對自由競爭底方式完全的誤解。自由競爭絕不止適用於比較簡單的環境。反之，正因近代工業中分工極其複雜，只有自由競爭才是將配合工作做得好的唯一辦法。如果情況是簡單的，一個人或一個專設機構就可有效地對所有相干的事實一覽無餘。在這種情況下施行計劃倒也並非難事。但是，當需要我們加以考慮的因素太多時，我們便根本無法綜覽全局。

不能證明理論與實際之間的眞正關係。如果我們知道這二者之間的眞正關係，還是去看看德國這個獨佔最初成長的典型地方。我們看看德國，那麼對於理論與實際之間的眞正關係，即可一目瞭然。在德國，無疑政府是藉著熟籌的政策來壓抑自由競爭的。他們認爲這種壓抑政策之施行，不過是爲了實現一種理想。這類理想，我們現在稱之爲計劃經濟。德國，以及模仿德國的國家，當逐步向著一個完全的計劃社會趨進時，他們只是照著十九世紀的思想家所劃定的路線前進，特別是照著德國思想家所劃定的路線前進。過去六十年或八十年的人類思想史可以完全給我們證明一個眞理，就是任何一次社會變化都不是什麼無可避免的結果。而過去社會之所以發生變化，實在都是人底思想使然。（譯者按：海耶克教授此論雖不免失之過於重視思想因素推動社會發展之力量。但是，假定其餘一切條件不變（if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思想錯誤，確足以招致大禍。東方若干地區，數十年來，社會內部之動亂，層出不窮之廝殺，在某種程度以內，實係思想錯誤所致。而集錯誤思想之大成者，乃各種各色的「主義」與「哲學」。憑一個人頭腦之幻構而欲建立一理想國，係當今慘禍之一源。人類社會底事情這樣複雜萬端，哪裡是一個頭腦所能包羅得了的？更何況前人底頭腦一定比後人簡陋？豈有扯著後人盲從前人之理？硬要全國人衆聽命於一個人底幻想曲，這是何等荒謬絕倫！如果今後有人誠心救國，首先必須洗刷數十年來此類流毒與狂妄風氣。否則禍亂相尋，永無已時。浩劫餘生，對此能不痛切反省！談到此處，譯者

是不差。但是，自從英國實行保護政策，並且隨之在經濟政策方面作了一些必要的普遍變更以後，情況就大不相同了。此後，獨佔勢力以驚人的速率出現，英國工業已起了極大的改變，其變化之大一般人還很少認識出來。我們如果說這一發展與這一時期工業技術底進步有何關聯，那簡直是荒謬不經之談。或者，有人說，工業技術於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〇年代在德國所發生的那些影響，直到一九三〇年才被英國感受到。這種說法，眞是再荒謬不過的了。莫索里尼也曾作過類似的妙論。他說，意大利必須趕在歐洲其他國家之前廢除個人自由。因爲，意大利底文明已經走到了各國底最前面。（譯者按：東方有些人輒言文明古國，且其人民已屬自由太多，不復需要爭取：其人民應該捐獻自由，以作渺不可期之偉大用途。此類高論，與莫索里尼之高論，竟不謀而合。地無分東西，而「立言」竟若是之契合。何耶？無他，心性相同，所處位況相當，喜好扭著大家底鼻子跟我來之興趣相若故也。）莫索里尼這番話所涵蘊的意義固屬荒謬已極，但其荒謬程度與前說相較亦顯得略遜一籌。依英國底情形而論，有人認爲，言論與政策上的改變實在是隨著無情的事實之改變而來的，這種說法，應用到英國的情形，從表面看來好像是眞理，其實大謬不然。因爲，英國底言論與政策實在還是模仿一套人造的學說，不過這套學說是從很遠的外方來的，不易察覺罷了。固然，有人可以反駁道，儘管英國大衆底輿論是贊同自由競爭的，而獨佔的工業組織還是成長起來。外界發生的種種事件把贊成自由競爭的人之希望粉碎了。但是，這類議論並

的事情。可是，在事實上，那時在工業先進的英國却還沒有獨佔局面出現。同樣的事情之在英國發生，那是在從那時算起的五十年後哩！近若干年來，「競爭制度最後必至發展到獨佔的資本制度」的說法，被許許多多人接受。之所以如此，主要的原因，是受了德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家們之影響，特別是受了宋巴特（Sombart）底影響。這般人底立論，只是根據他們自己國內一些狹仄的經驗，來作一些大膽的推廣。後來，美國底經濟發展頗與德國相似。這一事實，似乎印證了那些德國經濟理論家所作的大膽推廣之爲正確。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在美國這種相似的發展是靠著高度保護政策產生的。實際的情況儘管如此，一般人仍把在德國的一串發展看作一個普遍的必然趨勢。我們且借用近來擁有極多讀者的一篇文章底話來說：「德國是近代文明之種種社會的與政治的力量都到達最進步的型式的地方。」許多人以爲如此，所以錯誤觀念流行。

我們現在如把英國截至一九三一年以來的實況加以考察，我們再把英國自這年開始走上普遍的保護政策以後的發展情形加以考察，我們會立刻明瞭所謂計劃經濟乃不可避免之事，其成分是多麼少，而靠政府熟籌的政策推動的成分又是多麼大。僅僅在十幾年前，英國底工業，除了少數幾個老早得到保護的部門以外，大體上仍舊保持著自由競爭的情況。這種情況，與英國歷史上以往任何時期相仿。一九二〇年，英國在工資與貨幣方面施行了一些與自由競爭傳統相牴觸的政策，因而蒙受到重大的痛苦。即使如此，那時的就業以及一般活動的情況，比起一九三〇年來，還

，並非因其價格奇廉，更非因人喜其質地良佳，實因其全靠絕對獨佔。而此種獨佔局勢之造成，又非由於經濟優勢，實純係出於政治強制。大家自由造出的成品，謂之「私品」。「私」則有罪。「公」則無罪，暢銷無阻。且又因無能與之競爭者，於是價格可以隨意提高。這類企業之主要資本，譯者實無以名之，姑名之曰「政治資本」。以「政治」作「資本」的企業，永遠賺錢，絕對不會虧本。這樣的「生意」是世界上最公道的生意也！）

我們再將自由競爭之衰落與獨佔局面之成長在各國發生的先後次序之不同加以研究，便會覺得我們所說的管制計劃並非不可避免之說，是有其堅強根據的。如果獨佔局面的成長是工業技術進步的結果，或是所謂「資本主義」演進之必然產物，那麼照前述計劃者的道理而論，獨佔局面應該首先在經濟制度最前進的國家出現。但是，在事實上，獨佔是在十九世紀末葉的美國與德國出現的。那時，在工業方面，這些國家還是很年輕的國家。有些人將德國看作一個在實際發展上最能表現所謂資本主義之必然演變的典型國家。儘管如此，德國從一八七八年以來就藉著精心制定的政策有計劃地培育大公司和大組合：德國政府先從旁加以保護或是直接誘導，最後爲了便於管制物價與買賣，政府索性使用強制手段來造成獨佔局面。我們知道，第一個將「科學的計劃」以及「有意地將工業組織起來」等想法實際試行的是德國。這類偉大的試驗是靠政府力量來進行，並且造成巨大的獨佔機構。當時，這些獨佔機構之成長，竟被人看作是一種歷史上無可避免

這個委員會底報告是出於自由主義者過度的偏見。這個報告是確有見地的。

該委員會還編製了一篇專論來詳細討論這個問題，並對這個問題底答案作一總結。其文如下：「有人說大的工業設備具有高超的效率。此說是未曾得到證實的。有些人認爲大的企業所具有的一些優越條件足以破壞自由競爭。這種事情，在許多工業部門裡並未表現出來。在有些地方，大的企業固然比較合於經濟原則。但是，這種現象，也並非必然不變地導向經濟獨佔之途。……當一企業底規模大到某一點或某些點時，其效率便已達到最高的限度。這時，企業規模如再加擴大，反而不經濟。一個企業底規模已達到效率之最高點，但是還遠未到達能將物品供應的主要部份加以壟斷的程度，這是可能的事。因此，以爲大規模生產將無可避免地消滅自由競爭之說，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我們應該進一步注意到，造成獨佔形勢的往往是些別的原因，而並非由於較大規模生產之能減低成本所致。獨佔局面是一些人私相串通弄成的，或是靠政府政策之鼓勵所致。一旦這類串通無效，或政府政策逆轉方向，自由競爭的環境自能恢復。」

我們把英國的情況作一番考察，便會得到極相似的結論。在英國，那些希望得到獨佔權利的人經常祈求政府用政治力量幫助他們，使得他們底獨佔控制有效。這些人居然也常常得到政府幫助。凡見到這些現象的人，都會懷疑——認爲獨佔的發展並非什麼不可避免的事。（譯者按：若官商一體，則更可證明此說爲確。在有些地區，許多工業，如製酒製煙，其出品之所以得以銷售

採用了某種政策所致。除此以外，我們還應首先考察一下，近代工業技術發展的性質，與極多工業部門之必然走上獨佔之路，二者之間的關聯到底有多大。

有些從工業技術方面來說明獨佔局面成長的人明白地說，由於近代大量生產方法產生了較高的效率，於是大的企業優於小的工業。他們說，近代的生產方法已經產生了一種新的情況。這種新的情況使得大多數的工業能大量增加生產，而單位產品底成本反能減低。結果，大企業底出品比小工業底出品之成本低廉，於是把小工業擠垮了。這種大吃小的情形必然繼續下去，直至每個工業部門最後只剩下一個巨大的企業，或者至多幾個巨型的企業而後已。這就是工業技術底進步所可能引起的結果。

我們不難看出，這種論據，是把工業技術進步有時引起的一種結果挑出，並且特別加以強調；至於其他與此論據相反的結果，則全未顧到。如果我們把事實認眞加以研究，那麼便可發現這個論據是找不到多少根據的。不過，在此我們不能把這個問題仔細探討。我們現在所要做的事，就是列舉一些最好的證據來證明前說之不當。我們知道，「國家經濟臨時委員會」曾對「經濟權力集中制」這個問題作了一番研究。這番研究，是近來對於此類事實資料方面所作的最廣泛的研究。該委員會最後的報告稱：「雖然，目前有一種觀點，即認爲大規模生產的較大效率是自由競爭歸於消滅的原因。但是，在我們手邊所有的證據却證明這一觀點很少有所根據。」我們不能說

的闡發，許多人不過是「人云亦云」地跟著附和而已。然而，說的次數多了，於是竟被許多人認爲是一確切無疑的眞理。究竟說來，這番高論是沒有根據的。照事實看來，走向經濟獨佔和管制計劃之趨勢，並非由一些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客觀事實」所造成的結果。這個趨勢，實係由於半個世紀以來爲人所培養或宣傳形成的某些意見造成的。而這類意見，竟能逐漸支配我們底一切政策，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事。（意見所作的害處正多——海光）

計劃主義者曾用種種不同的論據來證明管制計劃乃無可避免的措施。在這種論據中，最常聽到的一種是說，工業技術上的變化已經使自由競爭之事在許多部門裡成爲不可能之事。時至今日，這類不宜於競爭的部門，愈來愈多。這樣一來，我們所能選擇的祇有兩途：要麼用私人獨佔的方式來控制生產，要麼靠政府來管制經濟。這種說法，主要還是從馬克斯的「工業集中制」之學說衍生出來的。雖然，這個學說和馬克斯的許多其他學說一樣，經過幾次轉手之後被許多人所接受，可是接受的人還不悉其來源哩！

在過去五十年中，獨佔局面加速增長，許多實行競爭的範圍裡所受到的限制日益增加。這都是歷史的事實，勿庸爭辯。雖然這些現象也常被人過分誇張，但畢竟是有限的。現在重要的問題還是：這個發展究竟是工業技術進步底必然結果呢，抑或只是由於多數國家採用了某種政策而造成的後果。我們現在把這個發展底實際歷史加以研究，便立刻會發現，這種結果確係用於多數國家

管制計劃是無可避免的嗎？

——海耶克教授著《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 Hayek）之第四章

我們知道，即使在計劃主義者當中，也很少有人認爲實行中央管制計劃是一件值得羨慕的事。這是一個很顯然的事實。大多數計劃主義者爲計劃而辯護的理由是說，我們用管制計劃來代替自由競爭乃不得已之事。因爲，在事實上，我們已不再有選擇的機會。我們底環境非我們所能控制，所以我們非這樣幹不可。計劃主義者很細心地製造出一番荒誕不經的議論。他們說，我們正走上一條新路。但是，我們之走上這條新路，並非出於我們底自由意志，而是由於工業技術發生變化所致。這一變化，使得自由競爭制度已自動地歸於消滅。工業技術上的變遷，我們既無法拗逆它，也沒有希望去阻止它。這一番高論，從表面看來似乎言之成理，可是却很少人予以詳盡

在爲競爭而計劃而不是爲反競爭而計劃時，才可以聯合起來。

請讀者心中要記住，我們對於計劃經濟的批評，祇是就反自由競爭的計劃經濟而言，或祇就取自由競爭而代之的計劃而言。我們在此不能進而討論那使自由競爭作用得以有效發揮的計劃。那類計劃也是非常必要的，我們只好在別的機會討論它了。

相信，我們必定能夠在極端個人式的自由競爭與高度的中央管制之間找出一個折衷的辦法。如果有人說，我們底目標既非極端反中央管制的自由競爭，又不是極端高度的中央管制，而是用合理的方法將二者調和起來。的確，沒有什麼說法比這種折衷之論在起初更爲動聽。但是，祇要我們有點常識，即可知此說之非。自由競爭固然少不了管理方式（如工商管理——譯者），可是我們却不能隨意把自由競爭與計劃經濟攙合起來。果眞把二者攙合起來的話，那麼自由競爭不復能夠刺激生產。吾人需知，「計劃」並不是一劑藥，服了一點便好。如果自由競爭和中央管制二者都行之不全的話，二者都會變得不像樣兒，而且也不會有何效果。自由競爭和中央管制二者都可作解決同一問題的原則，我們可以任擇其一。（譯者按：這是純就經濟觀點而論。若配合政治情況，結果大不相同。在今日的東方，若行中央管制，有而且只有加速新奴隸社會之建成。這是毫無可疑之事。）如果我們將自由競爭和中央管制混雜起來，那麼沒有一種行得通，其結果比我們始終一貫地實行其中任一種更壞。（譯者按：斷腿的人在地上爬，好腿的人在路上大步走，祇有跛子既不能爬又不能走，須須不堪。跛子者，一隻腿好而另一隻腿壞了之人也。自由競爭的經濟就是好腿走路的經濟；中央管制的經濟就是斷腿的人在地上爬的經濟。既行中央管制又行自由競爭的經濟就是既不能走又不能爬的經濟。今日最「進步」的地區之經濟，就是這種「跛子經濟」。在這種「跛子經濟」之下從事企業者，恐「不知如何是好」也。）我們認爲，計劃與競爭，只有

一個一個地破壞工業中的自由競爭。這種政策，適足以置消費者於資本家聯合壟斷行動的擺佈之下，而工人們則被納入組織嚴密的工業之中，不能動彈。雖然，在廣大範圍中，這種可慮的現象已經存在了許久，而且許多胡亂宣傳計劃經濟的煽動之詞著重在破壞自由競爭制度，可是，照我看來，這類現象，既不合理，又不像是能長久存在的樣子。目前藉工業壟斷而行的各自爲政的經濟計劃，會產生一些結果。這些結果，與那些爲經濟計劃之目標而辯護的人所始料不及。這些結果是頗爲糟糕的。社會經濟底發展一旦到了這一階段，如再回復到自由競爭，其唯一可能的結果，便是由政府來管制來壟斷，政府管制如欲生效，管制手段勢必一步一步趨於完備和苛細。我們在現在是迅速趨近這一階段了。戰前不久，一個週刊曾經指出，有許多跡象表明英國領袖們至少已經慢慢習於藉「控制與獨佔來發展國家經濟」這類名詞而思想。這似乎是當時情況之眞實的描寫。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不久以來，這種思想之發展大大地爲戰爭所加速，而且嚴重的毛病及其危險性則與日俱增，且越來越顯著。（在民主根基深厚的英國尙且如此危險，在其他落後地區更爲如何？——譯者）

完全由中央管制經濟活動之觀念，在西方依然使大多數人聞之喪膽。之所以如此，不僅因此種工作非常困難，而更因每事都由一個中央機構管制，便形成一個觀念，這個觀念是西方人很害怕的。然而，如果我們明知如此，但依然向管制之路趨進的話，那麼主要的原因，是大多數人仍

在計劃經濟的大旗之下恢復其在自由競爭時代被掃除了的特權。雖然如此，社會主義者還要窮年累月宣傳計劃經濟。此種宣傳之力量，使具有自由思想的人覺得計劃經濟學說值得尊重，有的人甚至轉而反對自由競爭。這樣一來，有些自由主義者對計劃經濟不復持著合理的懷疑態度。他們對計劃經濟之持懷疑態度，原是由社會主義者企圖消滅自由競爭而引起的。至此，這一態度完全消失了。在實際上，社會主義者底左翼和右翼有許多意見相反，可是二者在打擊自由競爭這一制度上却能聯合一致。二者都想拿政府管制的經濟來代替自由競爭的經濟。雖然，「資本主義」一詞許多人用來表示過去的社會形式，「社會主義」一詞許多人用來表示未來的社會形式。可是，我們與其說這些名詞是用來「說明」我們正在過渡的社會之性質，不如說是用來「隱蔽」我們正在過渡的社會之性質。

雖然，我們正在觀察的一切經濟變化是朝著經濟活動之廣泛的中央管制方向發展；可是社會上一般人反對自由競爭最可能產生的結果，比之中央管制的趨向更爲惡劣。這種情形，既不能使經濟計劃者得到滿足，又不能使自由主義者得到滿足：這是一種工團主義的工業組織，或是「合作式的」工業組織。在這樣的經濟組織之中，自由競爭是多少被抑制住了，而計劃之事則落入各自爲政的工業獨佔者之手。（眞是至理名言——譯者）我們必須知道，當人民大家都祇同意於反對自由競爭，而彼此之間在別的事上却很少同意之點時，這種情況便是最無可避免的結果。我們

一適當的法治系統。這些條件，不是私人所能全部辦到的。這種法治系統之設計，要既能保持自由競爭方式，又能儘量便於競爭活動。法律承認私有財產原則以及契約自由原則，固爲自由競爭之所必須，但僅如此尚不足夠。除此以外，我們還得替那應用於不同事物的財產權下精確的定義。我們知道良好的法治機構可以使競爭制度發揮其效能；可是，對於法治機構底正式之研究，却不幸被人忽略。

當自由競爭不克有效發揮時，我們要想出一些便於自由競爭的辦法以鼓勵之。不過，這些辦法，用亞當斯密底話來說是：「雖然這些辦法對於一個偉大的社會可以產生最高度的利益，可是由於社會性質之限制，其所獲利潤從來不能回付給任何個人或一小羣人，以補償其損失。」的確，這類辦法，却使政府底行動得到廣泛的權限。（所以，美國許多私立大學拒絕接受政府津貼。）因一接受政府津貼，政府干涉的魔掌就隨著進來。——譯者）

當政府藉著不同的和無可調和的原則來處處抑制自由競爭時，爲利於自由競爭而建立的基本社會架構，有許多便無法完成。我們當前所面臨的問題，不復是從事自由競爭或抑制自由競爭之問題，而是完全以另外一種制度取自由競爭而代之的問題。現在，有一點我們必須完全弄清楚現代的經濟計劃運動乃一反對自由競爭的運動。這運動是一個新旗幟。在這一新旗幟之下，自由競爭制度底一切老敵人又恢復了勇氣，再度反對自由競爭了。復次，各種各色的牟利份子現在都試圖

是否大於社會投下去的成本。（譯者按：這一問題非常重要。有些地區所謂的「公營事業」，就形貌上看，成績美滿，年有盈餘。茲姑無論其是否編造表册，自欺欺人。即令其所編造表册全屬眞實，亦全屬表皮一層之光榮紀錄。而此表皮一層光榮紀錄之造成，全賴消耗社會成本。此廣大社會成本之消耗，彼編造表册者當然不予計入。如予計入，則任一「公營事業」之所得恐全係負數。這種情形，由官方需發行通貨以維持彼等所謂「事業」之存在可以觀測出來。依此推論：此等「事業」愈是「成績美滿」，愈足以表徵彼等消耗社會成本之多。所以，這樣的「公營事業」之存在，於官於民，兩受其害。而其所以繼續存在者，除少數人獲益並解決一部分失業問題外，在思想形態上係受近若干年來非驢非馬的「計劃主義」之影響。但此種「計劃主義」又能滿足一部分人的支配欲與控制欲：故得以陰魂不散。）（現在怎樣，不得而知——海光）

我們採取廣泛的社會安全制度，也無礙於自由競爭。當然，這是有條件的。即是社會安全機構之組織，在設計時，不使自由競爭之事在廣大範圍中變得失其效用。如此，社會安全制度之廣爲設立，才不致危及自由競爭。

在過去的日子，很少人注意到自由競爭制度成功所必須的積極條件，而多注意到其消極的限制。這是一件可憾的事。當然，這種現象之形成，是不難說明的。自由競爭機能之發揮，不僅需要某些社會機構作適當的調整，比如貨幣、市場、通訊等等；除此以外，如前所述，還需要有

的消極性的措施多半是不可用的。爲什麼不可常用，我們有很好的理由來說明。這一類底理由，也是我們特別注重的。最重要的理由，我們認爲在市場作買賣的各方面必須可以任何價錢從事買賣。在買賣時，他們可以找人合夥，而且任何人可以自由生產、銷售，以及購進任何可以生產或出賣的東西。各種貿易關口，必須在平等的條款之下爲一切買賣人開放；自由法律之制定，必須不容任何個人或團體企圖藉公開或秘密勢力禁人從事交易。這是很關重要之事。任何人如企圖控制價格或控制特殊貨物之數量，這就徒徒剝奪競爭能力。因之，我們也無法有效調整經濟活動上的措施。因爲，價格如藉人爲方式隨意變動，我們便無法紀錄市場情況中一切相關變化。這樣一來，個人底經濟活動也就得不到一個可靠的指針了。

有些生產方式是經過允許才成立的。這樣的生產方式，又常受到別的許多方式之限制。以上所言，對於限制生產方式之方式而言，並不必然爲眞。只要這種限制生產的條件平均地影響著一切潛在的生產者，而且並不用作控制貨品價格與數量的間接辦法，以上所說的也不必然爲眞。即令所有的這些生產方式控制著額外耗費的成本，這還是值得的事。這也就是說，即使我們必須用較多的資源來生產一件成品，這也是值得的。至於政府禁用某些毒品，或對於我們使用毒品一事要求我們特別注意，或限制工人的工作時間，或要求增加工廠中某些衞生設備，凡此等等措施，都與自由競爭全然不悖。不過，此處唯一成爲問題的事是：在特殊情況中，我們所獲得的利潤，

時候，自由競爭較之任何其他方法，更能誘發個人底創導能力。爲了使自由競爭得以順利展開，我們必須有一個細心釐訂的法治機構。自由主義者從不反對法治，他們不僅不反對法治，而且甚至於著重法治。不過，我們知道，無論是現存的法治機構，或是過去的法治機構，就便於自由競爭這方面而言，都有嚴重的缺陷。當然，在我們無法創造一些使自由競爭有效展開所必須的條件時，我們也不反對乞援於別的方法來導引社會的經濟活動。假若經濟的自由主義者主張用卑劣的方法來調整個體的經濟活動，並且主張以卑劣的方法代替正當的競爭行爲，那麼經濟的自由主義是應受到反對批評的。自由主義者之視競爭爲一優越行爲，不僅因爲自由競爭在大多數情形之下爲一已知的最有效的經濟活動方式，而且更因其爲唯一有效的方式。在此唯一有效的方式之下，我們底經濟活動不受外力壓制，也不受官方權威之隨意的干涉；而是彼此自動地調整各自的經濟行爲。有人說，自由競爭可以免除「有意的社會控制」而且給予個人一個機會來決定某項特殊行業之前途是否足以彌補可能招致的損失與風險。這是有利於自由競爭的主要論證之一。

如果我們將自由競爭作爲社會組織底原則，而且善爲利導的話，那麼可以預防政府有所藉口，對於大家底經濟生活作某種型式之壓制性的干涉。我們雖然主張自由競爭，但並非不許採取自由競爭以外的其他方法來幫助我們從事自由競爭。這些其他的方法，有時確能給我們很大的幫助。我們從事競爭時，在某些情況之下，甚至也需要借重某種政府措施。不過，照我們看來，反面

一，也是民主與極權的試金石之一。英美型式者認爲壓制愈少愈好，蘇俄型式者認爲愈多愈妙。——譯者）果能如此，我們底計劃便可得到高度的成功。除此以外，在經濟計劃主義者和反計劃主義者之間的論爭，或者還有這類問題：我們如欲將資源加以合理的運用，是否需要中央管制，並且是否需要依照某些有意製造出來的藍圖來規定我們底一切經濟活動。我們知道，一切派系的社會主義者將「計劃」一詞專用來表示，剛才所說的無所不管的這一種型式底計劃，而且現在大家一提起「計劃」，其所指的，也就是這一種型式底計劃。有些人以爲這種型式的計劃是管理我們事務之唯一合理的方案。照我們看來，並非如此。實在，關於計劃問題，在計劃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之間，不能調協之點還多著哩！

但是，我們不要把對反集體主義的計劃與一種獨斷的放任態度混爲一談。這也就是說，我們不要以爲對反集體主義的計劃經濟，即是主張經濟上的獨斷放任態度。（譯者按：共產主義的經濟宣傳家正是這樣誣蔑自由經濟的。而近數十年來，由於受共產主義所製造的思想空氣之影響，中國許多接近經濟學的人對於自由經濟不自覺地也作這類批評。結果，壞的影響頗大。可是，如果自由主義者不自動地將這一點檢點清楚，也正好授人以隙。）這一點甚關重要。吾人需知，自由主義的論證祇是用來支持那主張將競爭力量用於安頓人類經濟活動之說，而不是用來替獨斷的放任說辯護。自由主義的論證是依據於一項信念之上的，即是當有效的自由競爭可能發揮出來的

的人，在用「計劃」一詞時，並不是這個意義。他們用「計劃」一詞時，不僅是意指如果我們希望收入或財富之分配必須合於某一特殊標準，我們便需依照計劃而行。假若我們說，我們要設計一最合理的永久架構，在這一架構以內，各種不同的經濟活動必須各人依照各自底計劃來指導。如果我們設計這樣的一種架構，依照現代經濟計劃主義者而言，並且就其所欲達到目標來說，他們還是認爲不夠的。因爲，我們所說的這種計劃是自由的計劃。這種自由的計劃，照現代經濟計劃主義者看來，簡直不成其爲計劃——的確，這種計劃不能滿足某些人的欲望，他們認爲我們應該爲了達到某種特殊理想而計劃。現代這些計劃主義者所要求的，乃依一個單獨的計劃將社會一切經濟活動置於一中央機構管制之下，並且規定社會的資源必須在一確定方法之下「有意識地」爲一特殊目標而使用。（這是「計劃主義」的核心，也是災禍之一源——海光）

這樣看來，現代經濟計劃主義者及反對經濟計劃者之間的論爭，並非關於我們是否應該在各種不同可能的社會組織之間作一聰明的抉擇之論爭；也不是關於在計劃公共事務時我們是否應該使用有遠見的和有系統的思想之論爭；而是關於在我們從事經濟活動時，什麼才是最好的方法之論爭。大家所爭論的問題，尤其是著重這一點：爲了經濟活動得以順利展開，握有制壓權力的人在一般情形之下是否最好限制自己權力之行使，以便產生種種有利的條件，使大家在這種種條件之下高度發揮各人底知識和創導能力。（請讀者注意：這是自由主義與某種社會主義論爭焦點之

斯密的話來說，經濟管制置政府於「支持他們自己，使之不得不居於壓迫者和施行暴政」的地位。

如果我們同意用「集體主義」一詞來包括一切型式底「計劃經濟」，並且無論這些計劃底目標爲何，那麼這些尋常的政治名詞便發生歧義。這種種歧義引起種種困難。而這種種困難，我們尚未克服。現在，如果我們把「集體主義」這個名詞底意義弄清楚，我們用它來表示那實現任何既存的經濟分配理想所必須的種種計劃，那麼「集體主義」一詞底意義便多少變得比較確定些。中央經濟管制計劃的觀念，已爲大家所熟悉。之所以如此，也是主要地由於這一觀念極其混含所致。因此，我們現在所要做的重要工作，就是在討論集體主義可能產生的種種結果以前，我們必須把這個名詞底用法弄得一致。

「經濟計劃」一詞之所以被許許多多人歡迎，自然係由於每個人希望我們必須儘可能合理地掌握我們公共的事業。既然如此，我們也必須運用我們所能運用的遠見。在這一意義之下，每個人，祇要他不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宿命論者，便是一個計劃者。每個政治行爲是一種有計劃的行爲，或者應該是一種有計劃的行爲。這樣說來，在計劃與計劃之間，只能有好的計劃與壞的計劃之別，只能有聰明的和富於遠見的計劃與愚蠢的和短視的計劃之別。假定有人說，一位經濟學家底全部任務是研究我們在實際上如何行動，而且可能怎樣計劃我們底事務。這位經濟學家之所事果眞如此，那麼他應是反對廣義的計劃最力之人。可是，那些熱心爲現實一個計劃的社會而努力

上的經濟生產或掠奪之果實，總是經過種種情形或藉種種名義歸統治階層中最親附的份子享受。千萬生產人衆則不能分享一滴。可是，在這類統治之下的地區所表現的分配制度予人之感覺印象，往往較所謂「資本主義國家」的分配制度平等得多。）

社會主義這個名詞，照許許多多人看來，意指一種最後的理想，而我們現在却用這個名詞表示一種特殊的方法，這似乎是不適當的。現在爲了清楚起見，我們將那爲達到許多不同目標的方式叫做集體主義（collectivism），而將社會主義視作集體主義這一屬（genus）之一種（species）。這種安排，也許較爲可取。（譯者按：在生物分類標準上，屬較種高一級，屬包括種。此處係取此意。）雖然，就大多數社會主義者而言，在集體主義之中，只有一個種才能代表眞正的社會主義；可是，我們必需常常記住，社會主義既爲集體主義之一個種，因而，凡集體主義所有的性質，社會主義亦有之。在社會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之間的論爭，幾乎都是關於一切形式的集體主義所共同具有的方法之論爭，而不是關於社會主義者所欲達到的特殊目標之論爭。（此處吃緊——海光）同樣，我們現在所要論及的，乃關於集體主義底方法所引起的結果，而絲毫無關於社會主義者所揭櫫的目標。我們也不應忘記，社會主義不僅是集體主義中最重要之一個種，或是「經濟計劃」主義之一個種，而是社會主義者若干年來誘惑具自由心靈的人一再屈從經濟生活之管制。這種經濟制，是自由人曾經推翻了的。自由人之所以反對經濟管制，因爲，藉亞當

會主義之特殊方法，與社會主義之目標，是同樣重要的。在另一方面，更有若干人雖珍視社會主義最後的目標，但却反對實行社會主義。這是因爲，他們看見社會主義者所擬實行的方法，會足以危及人生其他價值。於是，關於社會主義之論爭，主要地成爲實行方法之論爭，而不是關於社會主義目標之爭。——當然，在這些論爭之中，社會主義如有不同的目標，則經由不同的手段是否可以同時實現，也在討論之列。

這麼一來，混亂觀念便即產生。有些人在實際上也常常反對不顧手段而祇重視目標。這種情形，致令混亂觀念更爲增加。可是，實際的情形還不止如此。我們知道，「經濟計劃」是社會主義者改革社會最基本的方法。然而，這同樣的方法可以用來達到許多其他目標。這種情形，更使混亂觀念趨於混亂。有些人認爲，如果我們要使收入之分配符合流行的社會正義觀念，那麼必須以中央管制方法來指導社會的經濟活動。所以，一切要求拿「爲實用而生產」來代替「爲利潤而生產」的人，都想實行「計劃經濟」。但是，照我們看來，如果收入之分配必須以一種方法來管制，而此種管制方法，在其結果上，又與正義相違，那麼這樣的經濟計劃便非不可少的了。無論我們是否希望這個世界有更多的好東西必須歸於某些種族的優秀份子，或歸於諾底克人，或歸於一個黨派的份子，或歸於貴族份子，在我們把好東西交給他們時，我們所必須應用的方法，與我們要建立一個平等的分配制度所用的方法，是相同的。（譯者按：建立在現代獨裁或極權政治之

事物。我們之所以如此，主要的原因，是由於有一種混亂觀念所致。因此，我們現在所要做的工作，是廓清這一混亂觀念。我們現在所說的這一混亂觀念，簡直與社會主義概念底本身有關。社會主義一詞，往往用來表示社會正義，較大的平等，較大的安全，等等理想。這些理想，乃社會主義所要達到的最後目標。復次，社會主義這一混亂的觀念，又意即大多數社會主義者用來達到上述目標的特別方法。有許多優秀人物認爲這種方法是實現上述目標之唯一迅速而且完備的方法。在這一意義之下，社會主義意即廢除私有企業，廢除私有生產工具，並且創設一種「計劃」經濟制度。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企業家不復能爲利潤而經營，只能爲一中央計劃機構而工作。

雖然，有許許多多人所注意的祇不過是社會主義之目標——很熱烈地信仰社會主義之最後的目標，他們也自命爲社會主義者。但是，他們既不「注意」這些目標怎樣可以達到，又不「明瞭」這些目標怎樣可以達到。他們所肯定或強調的，祇是這些目標「必須」達到而已。他們認爲，爲了達到這些目標，無論花多麼大的代價，都是應該的。（此所以天下大亂也！近數十年來，許許多多狂激之徒都盲目地抱著這種念頭，不顧犧牲，崇奉這個「主義」那個「主義」，撲向目標，若夜蛾之撲燈火。少數政治野心家遂得乘機利用羣衆此種心理與狂熱之情，組織團體，爭奪政柄，成王敗寇，天下滔滔，洪水橫流，民不聊生，至於此極！——譯者）但是，又有些人則認爲社會主義不僅是一種希望，而且乃一實際的政治目標。幾乎對於所有這類底人而言，實現現代社

，可使全家享受溫馨的果實。這樣的人所作的這樣計劃，只有瘋子才會反對。可是，壓制機構如從事計劃，其主要著眼點是以統治便利爲前題，而最後的歸趨不外求政權之鞏固。這類人多行一分計劃，大家就多一分麻煩。這類計劃越是效率增加，大家所受到的平均壓力越是增加。尤其是俄式「計劃教育」，以灌輸他們底「主義」爲目標，以捧其頭目爲重心：毒害了這一代不罷休，還要毒害下一代。這群人眞是罪孽深重，死有餘辜！這類計劃，祇有不願作人者才贊成。拆穿來說，這類所謂「計劃」，不過計劃其名，統治手段其實。

共黨與納粹宣傳自由社會不講計劃，是亂糟糟的一團。事實上，在自由社會裡，學校校長、工廠廠長、市政委員、……無日不在那裡計劃，這樣的計劃愈是實行，社會愈是生機洋溢，福利增加。而在極權統治之下的地區如蘇俄者，愈是實行計劃，個人與社會愈遭殃，社會的生機愈爲之斷喪。久而久之，整個社會變成一部冷冰冰的機器。所以，我們所要的是自由的計劃，我們所應棄絕的是管制的計劃。

管制計劃與自由計劃

在我們進而討論主要的問題以前，還有一個障礙必須克服。我們現在迷茫於一些無人喜好的

管制計劃與自由計劃

——海耶克教授著《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 Hayek）之第三章

譯者的話

今日思想之混亂具體地表現於語言之濫用。同時「計劃」一詞，在不同的用者與不同的場合，所指意義各不一樣。個人或由個人自願結合的社團自動訂定計劃與壓制機構藉政治強力而施諸人的計劃，根本是兩回事。計劃一詞因常爲近若干年來的獨裁極權統治機構所強調與利用，致使若干人深惡痛絕。其實，計劃並不必然可怕。計劃是否可怕，要看誰在計劃，本著什麼目標而計劃，以及是否顧及因行此計劃時大家底犧牲。在一個家庭中，有操慮的主婦爲家庭幸福而計劃

追求其實現時，會產生一些全然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惡果。這樣的結果，即使是目前嚮往民主社會主義的人，也很少願意去接受的。然而，這種論斷，許多人是不能相信的。除非我們把此類事象底各方面赤裸裸地擺在他們面前，否則他們不會向這方面考慮。

時一提起自由主義，希特勒便頭痛欲絕。」除此以外，我們還應補充幾句。希特勒之所以在那個時候並沒有什麼機會讓他以實際行動表示對自由主義之痛恨，這是因爲自由主義當時在德國，就各方面的影響說，已經等於死亡。而宣告自由主義之死刑的，就是社會主義。

雖然有許多人密切注視德、意兩國或其鄰近地區由社會主義轉變到法西斯主義之過程，他們也明瞭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關聯與日俱增，可是，在民主國家裡，大部份人民還在相信社會主義可以與自由結合起來。無疑，英國大多數社會主義者對於自由的高尚理想還沒有失去深切的信仰。當著他們相信他們底社會主義方案一旦實現就會毀滅掉自由時，他們定會因之而退縮不前。然而，這個問題還是很少被人認識清楚。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本是兩種最不能協調的思想，却被人這麼輕易地扭在一起。「個人主義的社會主義」(individualist socialist)本是一個矛盾不通的名詞，可是這類論題居然到處被人正正經經地談論著。如果驅使我們冒險漂向一個新世界的竟是這樣一種心情，那眞是太危險了。因而，我們最迫切的事莫過於認眞考察曾在別處發生過的一些事象演變之眞實意義。雖然，我們在此所得到的結論只是些別人老早表示過的憂慮和恐懼，我們現在不過重行提出，並且肯定地再講一遍。可是，要想說明這些令人憂惶的發展並非偶然之事，却不簡單，這需要我們將社會生活的這一大轉變之主要方面作一番比較充分的考察。民主的社會主義只是上幾代人所幻想的烏托邦。我們可以斷言烏托邦不僅不會實現，而且當我們努力去

腦的人來支持他們。他們彼此用憎恨異端的心情互相仇視。但是，從他們實際之所作所爲看來，他們的作風竟是如此密切相似。他們二者之眞正的敵人同是那些老式的自由人士。因爲，他們與那些老式的自由人士毫無共同之點，他們也沒有折服那些自由人士的希望。納粹看共產黨人，共產黨看納粹，或社會主義者看納粹與共黨二者，都認爲對方是自己這邊可能的預備黨員。因爲，彼此都認爲對方是與自己一樣的好材料，只可惜暫時受了異端邪說底蠱惑罷了。然而，共黨與納粹都知道，他們與眞正信仰個人自由的人之間則是無妥協餘地的。（此處吃緊——海光）

誤信共黨與納粹官方宣傳的人，也許對於以上的話不免有所疑慮。爲了免除這類疑慮起見，作者不妨再引證一位先生底話。這位先生就是海曼教授（Prof. Eduard Heimann）。他是德國宗教社會主義底領袖之一。他在這方面的權威是勿庸置疑的。他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做〈自由主義之再發現〉這個題目是很有意義的。他在這篇文章裡說：「希特勒主義曾自稱爲眞民主主義和眞社會主義。說句令人可怕的實話，他所吹噓的確有一點眞理作根據。那點眞理雖然確實少得可憐，可是有了這點眞理作根據，就夠它進而作狂熱與歪曲之論了。（許多陰謀由此構成——海光）希特勒主義者甚至自稱是基督教的保護者。還有一點也是令人感到可怕的，就是這類錯誤的言論儘管荒謬已極，却能給許多人以很深的印象。（假言比眞理常更能奪人——海光）然而，有一事實是再明白不過的：希特勒從未自稱代表眞的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有一特色，即是當

少談「主義」這類空泛的幌子，而多談減少大家底不便之類底切實問題……總而言之，民主的重要性質，無一是法西斯所有，亦如其無一爲共產組織所有。不獨如此，民主所有的重要性質，無一而非與二者完全相反。這樣看來，從共產組織到法西斯組織之路徑，從法西斯組織到共產組織之路亦徑，而二者到民主制度之路則甚爲遙遠。共產黨徒變成法西斯黨徒，或法西斯黨徒變成共產黨徒，只需換換制服變變證章，把手槍改個方向就行。可是，無論是共產黨徒或法西斯黨徒，要變成民主思想者，必須先在思想上死一次，根本去掉那套可怕的一黨絕對主義，脫骨換筋，改變人生觀，和世界觀，重新作人；拿這個新人作底子，再談新政治。這當然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這一實際的困難，可以使我們明白，爲什麼近數十年來，世界有許多地區，不是一忽兒陷入共產組織這一極端，就是一忽兒陷入法西斯組織另一極端。鬧來鬧去，不歸於楊，便歸於墨，總是走不上民主政治的光明大道。——譯者）在一九三〇年，英美有許多大學教授，看到從歐洲大陸回到英國或美國的留學生。這些留學生弄不清楚他們自己到底是傾向共產黨還是傾向納粹法西斯。然而，有一點則是可以看得很明確的，就是這些留學生們對於西方的自由文明都表示憎惡之情。（請讀者諸君細味此點。——譯者）

一九三三年以前的德國，和一九二二年以前的意大利，共產黨與納粹或與法西斯之間的火拼，確實比他們與另外的黨派之間的紛爭來得頻繁。他們之所以紛爭，爲的是爭取具有同一模型頭

的過程，便會爲之吃驚不已。這些領袖人物固然如此；參加這些運動的大衆尤其如此。在德國，如衆所周知，一個年輕的共產黨徒變成一個納粹黨徒，或一個年輕的納粹黨徒轉變成一個共產黨徒，都是相當容易的事。關於這一點，那些替兩黨從事宣傳工作的人知道得尤其清楚。（兩種組織底份子這樣換來換去的情形，不止在德國爲然。其所以如此，正如譯者在前面所述，兩種分子在思想型模、作風，與心性上，血緣都極其相近：二者都是政治一元論者——一黨主義者，都是極端主義者，都是狂執主義者，都是馬基威尼底學生；都是黑格爾底信徒——一左而一右，都視取消自由與統制思想言論爲必要的手段，都視首領爲天帝而衆人爲工具，都拿「主義」、「國家」、「光榮」爲招誘愚衆的符咒，雖然其一強調種族優越論而另一高唱階級至上論，但結果對內之壓迫殘害與對外之侵略則無不同。依邏輯：如果甲所有的性質亦爲乙所有，而且乙所有的性質亦爲甲所有，則甲等於乙。所以，從絕對主義的範疇以外看來，無論共產組織或法西斯組織，都是同一源頭底兩個支流而已。不過，近若干年來，二者打來打去，罵來罵去，把一般人攪胡塗了，以爲二者在性質上大不相同。其實，二者如有不同之處，只是商號招牌不同而已；而所販賣貨色，則幾乎一樣。二者之所以生死相撲，無他，不過爭取支配之市場而已。民主則不然，民主思想者，在政治上眞是多元論者，在心性上是非狂執主義者，他們不欣賞馬基威尼，不崇拜黑格爾，主張思想言論自由，特別尊重人權，視首領是因臨時之需要而被抬舉出來的任何個人，民主思想者

共黨那一套把人變成低級動物的思想和辦法。——譯者）

類似上面的話，我們還可以找到很多。近年來，許多有資格作判斷的人士所出版的著作裡面，便常有類似上面的話。特別是曾作過目前這些極權國公民的人，他們因曾親身經歷那段轉變的過程，他們底經驗迫使他們不得不修正自己從前所抱持的一些信仰。因而，他們所講的話，與前面所引的幾段尤爲類似。我在下面將再引一位德國作家的言論爲例。這位作家的結論與前面所引的相同。不過，他所說的，或者比前面已經引證過的言論，更爲正確。

這位德國作家叫做德洛克（Peter Drucker）。他說：「以爲經由馬克斯主義可以到達自由平等之域，這一信仰已經完全崩潰了。這一信仰崩潰底結果，迫使俄國走上德國所走的同一道路。這條道路是導向極權的、純否定的、不經濟的、不自由的、不平等的社會之道路。在要點上，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並非完全相同。這二者是一個發展之兩個不同的階段。當人們覺得共產主義是一幻想以後，下面的一個階段便是法西斯主義。今日，共產主義在史達林的俄國之已變成一個幻覺，亦若其在希特勒以前的德國之爲一幻覺。」

納粹和法西斯黨許多領袖底歷史對我們也是很有意義的。凡曾細心觀察過在意大利或德國這些運動如何成長的人，會看到許多領袖人物，從莫索里尼起，連拉瓦（Laval）與魁斯林（Quisling）在內，都是先做社會主義者，後來變成法西斯或納粹黨徒。如果我們注意這些人物轉變

界裡的幻想」。同樣，又有一位英國作家，叫做弗意革（F.A.Voigt）的，他以外國通訊記者的身份，對歐洲的政治發展做過多年眞切的觀察。他最後下結論說：「馬克斯主義已經帶來了法西斯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因爲，在一切重要之點上，馬克斯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這眞是一針見血之論。從民主眼光觀之，馬克斯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皆一丘之貉。因二者無論在思想模型、心性，或作風上，皆基本地相同，至少相似。而二者之所以相鬥者，不過爲權力，爲支配欲之滿足而已。——譯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先生堅信：「我們所從屬的這個時代，正在從經驗得知，當我們放棄自由而將自己的事聽任一個具有強迫性的組織來安排時，其結果將爲何如。居然有些人以爲放棄了自由，一切聽任別人擺佈，就可期望將來得到滿足的生活。如果眞的這樣行起來，他們的希望必歸幻滅。當著有組織的管制加強以後，生活目的上的花樣一定會愈來愈少。結果，什麼事都要歸於整齊劃一。這是依計劃而行事的社會或藉權威專斷的原則來處理衆人底事務之懲罰性的結局。」（李普曼先生之言，眞是觸目驚心。如果把一個社會變成這樣的一個社會，那麼作到最好處，也不過是變成蜜蜂、螞蟻的社會。到了這一地步，人都變成低級動物了。所以，要「建設」這樣的社會，根本無需什麼「專家」來「計劃」：拜蜜蜂、螞蟻作老師就很夠了。人底生活之特點及其可貴處，就在各人自己管自己的事。因爲，人爲萬物之靈。吾人對抗共產制度之最實質的理由，不是那些花花綠綠的玩意，而是反對俄國與

的人。却一天多於一天。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是列寧底老朋友。他提出了一些見證。他所提出的那些見證，連共產黨人聽到了，也要驚震不已。他覺得他不能不承認：「史達林主義並不比法西斯主義好。史達林主義甚至比法西斯主義更糟，比法西斯主義更殘酷無情、更野蠻、更不公正、更不道德、更反民主，任何善意的期待都不能挽救它。」他又認爲最好用「超級法西斯」（superfacist）來形容史達林主義。至於什麼是史達林主義呢？伊斯特曼認爲是：「史達林主義就是社會主義，這話的意思就是說，史達林主義就是藉政治方法達成產業國有化與集體化的社會主義。史達林把國有化與集體化作爲他建立無產階級社會之計劃所依賴的一部分。」伊斯特曼既然認出史達林主義實在就是這麼一種社會主義，那麼他所作的論斷之所指就具有更大的意義了。

也許，伊斯特曼先生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然而，這樣用同情的態度對俄國的實驗作過觀察，並且得到相似結論的，並不止他一人，他也絕對不是其中的第一人。比他早幾年，有位叫哲伯倫（W. H. Chamberlin）的，他以美國通訊記者的身份在俄國住了十二年。之後，他發現自己對俄國一切美好的幻想都粉碎了。他把他在俄國、德國，和意大利研究的結論，用扼要的話表示出來：「社會主義，一開頭就確乎不走向自由的道路。社會主義將走向這個獨裁的漩渦，走向最殘酷的內戰之途。至於說，用民主方法來實現社會主義，並且保持社會主義，似乎是烏托邦世

在政治方面的要素論之駁擊，中國文字方面者，可看張佛泉先生最近的論著《自由與人權》一書。）

毫無疑問，向人期許較大的自由，已成社會主義宣傳的一個最有效的武器。有許多社會主義者是眞心實意地相信他們的主張能夠帶來自由。然而，他們信仰的虔誠，於事又有何補呢？（許多虔誠是錯誤的——海光）如果社會主義者對大家允諾走向自由之路，而在實際上，不過是投向奴役之路，那麼只有使悲劇加劇罷了。現在，被勾引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人一天多於一天。他們昧於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在基本原則上的衝突。社會主義者連舊日自由黨派底名字都篡奪去了。這一切結果，毫無疑問，是社會主義者向人允諾更多的自由有以致之。大多數知識份子接受了社會主義，他們以爲社會主義顯然是從自由傳統裡衍生出來的。所以，當有人說實行社會主義之結果，就會引起與自由背反的結果時，無怪乎那些知識份子會認爲是不可思議的事了。

近年以來，也有人開始感到社會主義的種種莫測後果之可怕。他們一再發出呼籲，可是，這類呼聲是從我們最想像不到的地方發出來的。觀察家們一個跟著一個地從事觀察這類現象。儘管這些觀察家們在研究此類問題時還心存希望得到並非不利於社會主義的結果，可是他們畢竟發現法西斯主義的情境與共產主義的情境實在有許多類似之處。當英國以及別處的「進步人士」仍在歌頌自己，以爲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是相反的兩極時，我開始懷疑這些新暴政是否同出一源

指並不是這些意義。社會主義者所允諾的新自由，所指却是要人免於受必然之限制，要人免於那無可避免地限制人的選擇範圍的環境之強制。雖然，有的人所受到的限制較多，而有的人則較少；可是，其受到了限制則一。社會主義者說，新自由是要人從這種環境的壓迫裡解放出來。物質之缺乏，好像是一個暴政。當我們要獲得眞正的自由時，首先必須打破物質之暴政，首先必須解除「經濟制度所給予人的束縛」。

照上面社會主義者所說的自由一詞之這種意義看來，所謂「自由」，簡直成了力量與財富的別名。那些向人允諾新自由的人確常又向人作諾言說，在社會主義的國家裡物質的財富將大量增加。然而，我們不難知道，只從絕對征服吝嗇的自然界下手，並不能帶來經濟自由。社會主義者所謂的新自由實在的意義，就是要消除不同的人在選擇範圍底大小所存在的差別。因此，新自由所要求者，其實就是一個舊的要求之別名而已。這個舊的要求就是財富之平均分配。不過，這個新名詞一經提出，就使社會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之間又多添一個共同使用的字眼。這樣一來，社會主義者對自由一詞得以盡量剝削與利用。儘管這派人士對自由一詞底用法不同。可是很少人注意到這一區別。至於這兩種自由能否眞正結合在一起，能把這種問題想一想的人，更是鳳毛麟角了。（譯者按：以上兩段對於自由的解析，乃語意學的解析之一實際的應用。這種解析，可予「要素論」（essentialism）一當頭棒。要素論，亦如高度的形上學，危害民主生活久矣！對於

。（譯者按：這話乃所謂「矛盾的統一」之一形式。舉凡從「國家之壓制」到「國家之萎謝」、從政治現實的極權主義到政治理想之無政府主義、從政治理想上的仁慈到現實政治中的嚴酷、從現在否定一切到未來再肯定一切、……等等「矛盾」的轉變，都是與「從必然飛躍到自由」同一模型的想法。在事實上，一切獨裁極權統治，無不以或多或少的程度利用此說以掩飾其現實的醜惡與嚴酷，且把大衆底注意力引向理想的未來，而忍受目前的蹂躪。其實，這種「理想主義」不過是高等的愚民術而已。這一路底說法，在語意學的解析（semantical analysis）燭照之下，都是穿上聖衣的惡魔。容有機會申論之。）他們又說，社會主義會帶來「經濟自由」。如果人類沒有經濟自由，那麼已經得到的那種政治自由是「不值得享有的」。人類儘管爲了爭取自由已經作過長期的奮鬪，而能完成這件功業的唯有社會主義。那已經得到的政治自由不過是這件功業之初步的成就罷了。（社會主義是走上共產主義的橋樑。危險！——海光）

社會主義者爲要把這番議論顯得言之成理的樣子，於是不得不將「自由」一詞的含義加以精巧的改變。因此，這些改變的地方，很值得我們重視。在那些曾爲政治自由而奮鬪的偉大使徒們的心目中，自由一詞之所指，是免於被人壓制，免於他人濫施專斷權力。尤有進者，當一個人受到某些因素之束縛，以致除了順從他所屬的上級之擺佈以外，他便毫無選擇之自由。在這種情況之下，他能從這些因素底束縛之中解放出來，這也叫做自由。社會主義者所允諾的新自由，其所

自由裡去追尋平等，而社會主義則是在桎梏與奴役中追尋平等。」（譯者按：羅素曾說：「奴隸與奴隸之間是平等的。」這樣的平等，有何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呢？所以，我們不可爲了「平等」這一空虛的概念而感到滿足。當我們看到「平等」這一符號，或聽到「平等」這一聲音時且不忙欣然色喜。我們要作進一步的追問：「平等」是怎樣來到的？是被動地「配給」的呢？還是主動地爭取的？尤其要問：「平等」所指的實際內容是什麼？是奴隸與奴隸之間的平等呢？還是主人與主人之間的平等？這種年頭兒，要辦什麼事都困難，只有要得到奴隸式的平等最容易。史達林、馬林可夫、……之流，正製就大批「平等帽」，免費奉送。但是，要得到主人與主人之間的平等，其事至難。你如果要向史達林、馬林可夫之流爭主人式的平等，他們一定會說：「嘿！你爭到老子們頭上來了！你叛變，你反革命！該殺！」由此可以判然分明，哪一種平等是假平等，哪一種平等才是眞平等，在「社會主義的制度」裡，的確很容易實現平等，可惜這種平等是假平等。這種毫無意義的假平等，還值得強迫許許多多的人犧牲利益去追求嗎？還值得用什麼「計劃」以求其實現嗎？如欲實現貨眞價實的平等，有而且唯有在貨眞價實的民主制度裡。）

因此，有許多人對社會主義存疑懼之心。而且，渴慕自由，乃最強有力的政治動因。爲了緩和許多人的疑懼心理，並且利用大家渴慕自由的政治動力，於是，社會主義者天天對大家作諾言，允許大家得到所謂「新自由」。他們說，社會主義之實現，將使人類從必然的領域飛躍到自由的領域

爲「忠誠」之獎品而已。美國猪之配給營養較佳，但猪還是猪也。在所謂「社會主義的制度之下」，不服從計劃者，予以較劣的畜牲待遇；服從計劃者，則予較佳的「畜牲待遇」。所以，「社會主義的制度」一行，人底尊嚴消滅。人而失去人底尊嚴，僅餘細胞一堆，尚得謂之「人」乎？）

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前，民主有一段高潮。社會主義只在這股澎湃的民族潮流之影響下才開始與自由的力量結合。後來，所謂「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這一名詞出現，在很長的時間以內才把鼓吹社會主義的前輩們所引起的一般人對社會主義疑懼的心理平息下來。民主政治根本是一種個人主義的制度。這種制度與社會主義永遠不能調和。關於這一點，杜克利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譯者按：杜克利，生於一八〇五年，死於一八五九年。法國政治家，出世於 Vermeuil 地方。一八二七年作凡爾賽地方長官。一八三一年膺法國政府之命前往美國研究反省制度。杜氏將研究之所得，寫成《美國的民主制度》一書，一八三五年出版。此書問世後，歐洲各國俱有翻譯。一八四九年曾任法外交部長。）

杜克利於一八四八年曾說：「民主制度是擴大個人自由之範圍的制度；而社會主義則限制個人自由之範圍。民主制度將一切可能的價值加諸每個人之上；而社會主義則把個人當做一個工具。在社會主義的制度中，個人不過是一數目字而已。民主制度與社會主義共同的地方只有一點，就是二者都主張平等。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即使是這一共同之點，還是有差別的：民主是在

一社會主義，早期曾被人認爲是自由之最嚴重的威脅，而且開始問世時是反對法國大革命之自由主義的，可是，而今它居然在自由旗幟之下，受到普遍的歡迎。（可悲！——海光）現在的人已經不大記得，社會主義在其初期，彰明皎著地就是權威主義性質的東西。奠定現代社會主義之基礎的法國著作家們，都堅信他們的種種主張，唯有靠強大的獨裁政治才能付諸實行。在他們心目中，社會主義之實行，不過是想如何終止革命而已。而其終止革命的方法，是依據階級層層管制之原則，細心將社會組織重加改造。他們又主張用強迫性的精神力量加諸社會各階層以達到這一目標（譯者按：這種辦法，演變到了現代，就是藉政治暴力，強迫大家接受一個得勢的政治組織所標尚的「主義」。於是，造成思想統制的專橫局面。這路作風之最完備的標本，是共產組織。）當牽涉到自由問題時，那些社會主義底創建者，對於他們所欲實現之企圖，絕不躊躇。他們認爲，思想自由就是十九世紀社會罪惡之根源。聖西門（Saint-Simon）是近代計劃主義者之第一人。他甚至警告說，凡不服從他所創立的設計局的人，將「予以畜牲的待遇」。（譯者按：現在共黨類型的政治組體正在實行聖西門之言：對「凡不服從」其「設計」者，一律「予以畜牲的待遇」——除了以物理的方法消滅其身體的存在以外，給予粗劣不堪的配給（餵來享鷄時，每鷄之食料定量分配，未嘗不是「配給制度」之應用，關入集中營，強迫勞動……但是，對不服從者「予以畜牲的待遇」時，是否對於服從者就不「予以畜牲的待遇」呢？否！不過配給較佳，作

偉大的烏托邦

——海耶克教授著《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 Hayek）之第二章

「凡當走國家變成人間地獄者，主張人應把國家變成天國之一念。」

— F. Hoelderlin

步所支持，而且尤其受德國思想家和科學家們享有的令譽所支持。德國思想家和科學家之享有令譽，是在過去百餘年間的事。在這過去的百餘年間，德國一再成爲歐洲文明底主要份子，甚至於是領導的國家。但是，這種智識上的影響立刻助使德國觀念向外擴張，以至於形成一種轉向，反對歐洲文明底基礎。德國人自己是充分感覺到這種衝突的，至少在德國人中擴張德國觀念的人是充分感覺到這種衝突的：早在納粹勃興以前，大家公認的歐洲文明底共同遺產，德國人看作是「西方」文明。他們所講的「西方」，所指不復是Occident 底固有意義，而是意指在萊茵河以西的「西方」，在萊茵河以西的「西方」，意即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自由貿易，以及任何形式的國際主義，或愛好和平。

但是，縱然德國人蔑視這些「淺薄的」西方觀念之情與日俱增，西方人還是繼續輸入德國觀念。也許，就是因爲德國人蔑視這些「淺薄的」西方觀念，西方人才繼續輸入德國觀念。西方人甚至於被德國人說服，相信他們自己從前的信念不過是自私自利之辯護而已。所謂自由貿易，不過是爲增加英國人底利益而已。他們要英美人相信，英美底政治觀念已經是過時的東西，而且是恥辱的標記。

那時開始，英國觀念底支配力便開始逐漸低落；而一種不同的觀念，則開始從東方向外展進。其實，這種觀念並不新鮮，只是極其陳舊的東西。自從這陳舊的觀念擴張以來，英國在政治和社會範圍裡失去了其知識上的頭領地位，而變成別國觀念底輸入者。其後的六十年間，德國成爲世界觀念的中心。從這個中心出發，德國觀念向東方和西方擴張。它注定了要統治二十世紀的思想界。無論是黑格爾或馬克斯，無論是李士特（List）或施謨勒（Schmoller），無論是宋巴特（Sombart）或曼海門，無論是比較激烈的社會主義或比較溫和的「組織」或「計劃」，德國觀念都受英國歡迎，而且德國底社會建構都受人模倣。

雖然，大多數的新觀念，尤其是社會主義，並非起源於德國，可是這些新觀念是在德國完成的。在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葉，這些新觀念得到最完備的發展。我們現在往往忘記，在這個階段中，德國在社會主義底理論與實踐發展上是居於怎樣重要的領導地位。在社會主義成爲德國重要問題的前一代，德國議會裡有一個巨大的社會主義黨。而且，直到爲時不久之前，社會主義之思想的發展幾乎瀰漫德、奧。所以，即使時至今日，蘇俄所討論的社會主義問題，大都還是德國社會主義者談得不要了的問題。英美大多數社會主義者到現在還不覺得，他們開始發現的大多數的問題，老早便被德國社會主義者討論過了。

在這一階段裡，德國思想家對於全世界智識上的影響，不僅是受德國物質建設方面偉大的進

對於社會的態度，雖然是逐漸地在改變，而且是幾乎不知不覺地改變了，可是怎樣改變得這樣徹頭徹尾。在我們對於社會的態度一步一步改變的過程中，大家所作之不同程度的思想改變，祇是逐漸使老輩自由主義者對社會的態度與現在許多人對社會問題的態度發生根本的差異而已。這種態度方面的改變，簡直就是完全違反我們在上面所撮述的自由發展之趨向，簡直就是完全放棄那曾經創造西方文明的個人主義的傳統。

依照現在具有支配力的一些看法而論，現代的問題，已經不復是我們怎樣能夠將自由社會中自發的力量作最好的運用之問題。在事實上，我們是著手廢棄那曾產生不可預見的結果的力量，而且消滅大家共同維持的市場機構，將一切社會力量集體化，導之趨向人爲「有意」選定的目標。自由與計劃之間的這種差異，最好是藉著大家歡迎的一部書裡的一種極端的主張來說明。這一極端的主張是說：「爲自由而計劃」。這種說法，我們將不止提到一次。曼海門博士（Dr. Karl Mannheim）說：「我們從無如今日之被迫將全部自然制度建立起來並且應用於社會者……人類愈來愈趨向於管制全部社會生活，雖然我們並未有心創造第二個自然界。」

我們底觀念改變之這種趨向，與我們底觀念在世界上發展底方向是相反的。這是一個重要的事情。因爲，二百餘年來，英國底觀念向東方發展。在英國獲致成功的自由法則，似乎注定要向全世界擴張的。約在一八七〇年，英國這些觀念底支配力，也許擴張到極東的地方。可是，自從

人的，於是到了本世紀，自由主義底基本信仰愈來愈爲人所唾棄。復次，因自由政策而獲致的果實，又被許許多多人認爲是永久安全的和不會朽敗的財富。於是，一般人底視線遂逐漸集中於新的需求。但在新的需求不能很快地滿足時，他們認爲這似乎是由於墨守舊原則所致。愈來愈有許多人相信，雖然既成的社會結構在過去曾使社會進步，但在今後則不可能。因此，今後我們要增進大家底福利，我們不能再沿襲過去的舊路，不能再在既成的社會結構裡去尋求。我們要增進大家底福利，唯一的辦法，就是完全重新塑造社會。至於怎樣增益既成的社會機構，或改進既成的社會機構，就很少有人考慮這樣的問題了。他們所考慮的問題，只是如何完全打碎既有的社會結構，而以新的社會結構代之。而且，正像年輕一代人底希望逐漸集中於全然新奇的事物一樣，大家對於瞭解既存社會機能的興趣迅速低落；而且，既然大家對於自由制度怎樣發揮其機能的瞭解日趨模糊，於是我們也就逐漸不能意識什麼東西是依存於自由制度之上的。

現在，大家對於社會前途的看法是改變了。大家發生這種改變，是未經過批評和分析的。這種改變也是現在社會上思想習慣的改變。這種思想習慣，乃爲思考專門技術問題所造成的。這種思想習慣乃自然科學家和工程師底思想習慣。這種習慣一旦養成，便不復信賴過去對於社會研究的知識。因爲，這些知識是不合於他們底先入之見的，並且不合於他們想將一種組織加諸不甚適合的場所之理想。這些問題是怎樣形成的，我們現在不予討論。我們現在所要做的事是指出，我們

而已——我們還要學習許多東西，而且在我們所走的道路上依然可能有很大的改進。但是，祇有在我們憑智慧來日漸瞭解我們運用過的種種力量時，才會獲致這種改進。顯然，即使在經濟範圍裡，我們有許多工作要做，例如管理貨幣制度、防止壟斷或控制壟斷。我們還有在別的範圍裡的許多事體要做。雖然這些事情看起來不很顯著，但並非無關緊要。在這些範圍裡，無疑，政府握有決定好壞的大權。我們有種種理由希望，如果我們對於問題有較佳的瞭解，我們會有一天能夠成功地運用這些權力。（人間的錯誤和痛苦之所以流行，常因人衆不夠瞭解——海光）

但是，如果趨向於一般所謂「積極的」行動之進步必定是緩慢的，而且自由主義之直接的進步大部份是因著有自由而財富逐漸增加所致，那麼我們必須經常與危害這種進步的主張戰鬪。自由主義被許多人看作是「消極的」教條，因爲自由主義所能給予特殊個人的貢獻不過是公共進步底一部份而已——一般人對於公共的進步越來越習爲故常，不復認爲它是自由政策底結果。有人甚至於說，自由主義底本身成就正是它衰落底原因。因爲，自由主義已經獲致這樣的成就，於是許多人逐漸不願意忍受依然存在的許多缺點。這些缺點，照他們看來，是無可忍受的，而且是不必要的。

因爲許多人逐漸不滿自由政策之進步緩慢，不滿那些用自由主義的名詞來保護其違反社會利益的私利之人（對他們發生正義的憤怒），不滿以自由爲藉口來滿足個人之無窮無止的物質欲望

自由主義所要建立的制度，是盡可能地讓大家便於競爭的制度。可是，有些自由主義者却墨守成法，堅持某些粗疏的和由片面的經驗所形成的法則，尤其是像放任主義這種原則。這種膠執的態度，也許最足以妨害自由的原則。（是——海光）當然，就一種意義來說，這種態度是必須的。違背大多數人的利益以換取少數人的利益，這種辦法所引起的害處往往比較間接，而且不易看出。同時，有些自由主義者以爲許多鐵定如山的法則可以產生效果。而且若干年來，他們已經建立起有利於工業自由的一個強有力的想法。既然如此，當然他們願意把這種想法當成一個沒有例外的法則，而不願別人予以反對。

顯然，許多提倡自由原則的人如果抱持這種態度，那麼他們底主張一旦深入某些方面的話，便會立即整個行不通的。這幾乎是無可避免的結果。緩進政策是想逐漸改進自由社會的機構。但是，這種政策又可削弱自由主義者改進社會的主張。緩進政策底進步是依據我們對社會力量的逐漸瞭解上，而且是依據最有利於社會力量發展的條件之上的。自由主義者底任務是幫助社會發展。既然如此，如果社會需要有所補益，他們最要緊的任務當然是瞭解社會。自由主義者對於社會的態度是像個園丁。園丁栽培一株植物，他爲這株植物創造最宜於生長的條件。因而，這個園丁必須盡可能地瞭解植物底結構，及其生長之道。

凡有識見的人都不會懷疑，十九世紀經濟政策中所表現的種種粗製的法則只不過是一個起頭

十世紀初葉，西方世界底工人獲致某種程度的物質享受、安全，和個人的獨立。凡此等等，遠在百年之前，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

未來發展的事情，也許可以將個人主義底成就之最有意義的和影響深遠的效果表現出來。這種效果就是說，人類底能力從此具有一種新的意義，即是人類有權力控制自己底命運。直至今日，人類已經得到這方面的若干成功。因爲人類已經獲得了這種成功，所以產生出壯志雄圖——而且人是有實現其壯志雄圖之權利的。（要緊要緊——海光）在過去，大人物所作的諾言，可以使得大家感興趣。但是，到了現在，這似乎是不夠了，一般人嫌觀念進步之速率太慢了。在過去使得我們進步的那些原理原則，到了現在，便被看作是更快的進步之障礙，而不被看作是保存已有成果的條件，也不被看作是發展過去已有成就的條件。所以，大家對於那些原理原則不復忍耐，而必欲去之而後快。

吾人須知，在自由主義底基本原理之中，沒有什麼因素能使自由主義變爲一成不變的教條。在自由主義底基本原理之中，也沒有永遠固定的神聖不可侵犯的誡則。自由主義底基本原則說，我們在處理我們底事務時，必須盡量藉用社會自發的力量，而且盡可能地少用壓制力量。這條原則是可以應用不窮的：我們自動去建立一個制度，與被動地接受一個已成的制度，這二者是全然不同的。（自由主義的眞精神在此——海光）

這一試驗，而用另外的方法去試驗。祇有每樣東西都可付諸試驗，科學才會有進步。復次，愈是不受外界干擾，大家信任學術權威來發展學術，科學才愈會有進步。

我們文明底性質如何，我們文明底敵人往往比我們文明的友人看得更清楚。孔德（Auguste Comte）是十九世紀的極權主義者。他說：我們底文明是「西方永不斷根的酸敗之症，乃是個人對種族的反叛。」孔德所咒詛的，的確是建造我們文明的眞實力量。十九世紀所加於前期個人主義的要素，祇是使一切階層的人覺悟到自由之重要，祇是有系統地繼續發展個人主義在偶然的和零星片斷中所成長的東西，並且將個人主義從英國與荷蘭向歐洲大陸最大部份地區擴張。

個人主義底這一成長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一旦加於人類才智自由發展的枷鎖移除了，人類便可迅速努力，從事發明製造，以滿足大量的需求。當大家的智識水準提高了以後，大家便能立刻發現社會上眞實的汚點何在。這時，大家不復對這些汚點處之以容忍的態度。（重要之至——海光）這時，也許沒有一個階層不在實質上受社會普遍進步之惠。可是，如果我們藉著現在的標準來度量個人主義的成果，那麼我們便不能對於這一成就作正確的估價。因爲，我們現在所採取的標準是從這種成就裡衍生出來的。而且現在個人主義弄出許多顯著的毛病。我們如果要欣賞百餘年來這一成就對於參加此一成就的人之意義爲何，那麼我們必須估量當此一成就開始發展時大家底希冀與願望爲何，藉以估量此一成就何在：無疑，個人主義底成就遠出一般人夢想之外。二

認識個人須自發地和無拘無束地努力自己底工作。這種認識使大家能夠建立複雜的經濟活動秩序。不過，祇有在個人解放運動獲有進展時，這種對個人才能的認識方能產生。（此處最吃緊——海光）其後，經濟學家們建立首尾一貫的論證來證明經濟自由。這是經濟自由活動底結果。經濟自由則是政治自由之始料所不及的副產品。

解放個人能力之最大的結果，也許就是產生了科學。科學之產生，乃近代西方歷史上的奇葩。從意大利到英國以及別的地方，個人自由逐步擴張。由於個人自由逐步擴張，才產生了科學。（神經活動被教條綑鎖者，怎會有科學思想？——海光）我們知道，在較早的階段，工業技術依然在停滯狀態中。可是，這時人類的發明力已經表現出來了。例如，這時的人製造許多高度技巧的自動玩具，以及其他機械的設計。像開鑛和鐘錶製造，也在發展之中。這些事業，在當時並未受到限制。但是，當少數人企圖在工業方面將機械發明作比較擴大的應用時（有些機械發明是特別發達的），便立即遭到阻止。在那個時候，祇要居於支配地位的思想發生桎梏知識的作用，求知的欲望便被阻抑：大多數人信以爲眞的和對的東西，足以阻抑個人從事新的發明。可是，工業自由却爲自由運用新知識開路。在從事科學研究時，祇有每件事可以付諸試驗，科學才能夠大踏步地向前發展。因爲科學得以大踏步地向前發展，於是得以在近一百五十年來改變世界底面目。研究經驗科學必須訴諸觀察與試驗。如果有人發現一項試驗對於他是有危險的話，他可以終止

自由」這樣的名詞現在用濫了。因此，我們用這個字眼來表示自己底理想時，總有點感到猶豫。「寬容」一詞也許是意義依然保持得完整些的字眼。這個字眼所表示的原則，自文藝復興以來，是佔著優勢的；只是在最近又低落下去。在極權國家興起後，寬容原則便全然消失了。

自十八、十九世紀以來，社會制度逐漸從嚴格的階層組織轉化而成各個人至少可以自定其生活方式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中，個人得有機會認識不同的生活方式，並且有機會選擇其生活方式。這種轉變，是與商業發達有密切關聯的。從意大利北部底商業城市開始，新的生活觀隨著商業向西部與北部發展，經過法國和德國西南部向低地國家和英倫三島擴張。這種由商業而引起的新生活觀，在沒有專制的政治力量來阻抑它的地方，便根深蒂固起來。（此處最關緊要——海光）在低地國家和不列顛，這種新的生活觀在一個長時期之內得到充分的發展，並且首次得有機會自由成長，而且變成這些國家的社會與政治生活之基礎。而且，自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以來，這種新的生活觀，又從這些國家以更充分發展了的形式向西與東擴張，擴張到新大陸，擴張到歐洲大陸底中心地區。可是，在歐洲大陸底中心地區，時常發生戰亂，並且有強大的政治壓力存在；這使得與英國相似的自由果實不能早早成長。

在歐洲歷史底整個近代階段裡，社會發展之一般方向，是把個人從種種桎梏之中解放出來，這些桎梏曾依風俗習慣或預先製定的種種規律，來綑鎖人日常的生活。在這個階段，大家逐漸

Hume）底看法，甚至於很快地放棄了洛克（Locke）和密爾頓（Milton）的看法。我們是很快地放棄了西方文明顯著的特徵之一。這種文明是從基督教、希臘，和羅馬所奠定的基礎之上成長起來的。我們不僅逐漸棄絕了十八與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而且也逐漸棄絕了伊拉斯謨（Erasmus）與孟泰格（Montaigne）、塞西諾（Cicero）和塔希圖（Tacitus）、貝利克（Pericles）和都西底斯（Thucydides）所遺留給我們的個人主義。

納粹首領說，國家社會主義的革命是反文藝復興的。他所說的，比之他之所知，也許要眞確些。自文藝復興以來，近代人是從這一文明裡成長的；而且，究竟說來，這種文明是個人主義的文明。國家社會主義的革命是對於這一文明之致命的打擊。時至今日，「個人主義」一詞常引起許多人不良的印象。這個名詞往往與自我主義（egotism）和自利自私連在一起。但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個人主義與自我主義及自利自私並無必然的關聯。我們所說的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以及一切其他形式的集體主義倒是相反的。我們將要在以後將這兩種相反的原則彼此衝突的地方慢慢討論。個人主義已經包含在基督教和往昔古典哲學中。這些要素，當文藝復興時，首先得到充分的發展，而且此後逐漸成長爲我們所知的西方文明。個人主義之基本的特色是尊重個人，把人當做人。這也就是說，個人主義承認各個人自己底看法和品鑑力在他自己底圈子裡是至高無上的。無論他個人底圈子怎樣小，都是如此。個人主義並且相信，人必須發展自己底才能和個性。「

表示我們底觀念演進底方向也完全改變，我們底社會秩序演進底方向也完全改變。可是，這些方面的改變，依然很少人察覺到。因爲，至少在極權主義底惡魔威脅人類之前的二十五年，我們是一步一步地離開西方文明由之而建立的那些基本觀念。近年來的趨勢帶給我們甚高的希望和雄心，但結果却使我們面對極權主義的恐怖了。於是這一社會主義的趨勢很深刻地震撼著我們這個時代。可是，我們依然不願意把我們觀念底改變與當前的恐怖二者聯繫起來，我們不認爲二者有因果關係。目前這種發展底趨勢祇印證自由哲學之父底告誡。當然，我們還是相信這些告誡的。我們知道，沒有經濟自由，那麼在過去便也不會有個人自由和政治自由。但是，現在，我們却一步一步地放棄了經濟自由。十九世紀最偉大的政治思想家，托克里（De Tocqueville）和阿克頓爵士（Lord Acton）警告過我們，說社會主義就是奴隸制度。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堅決地朝著社會主義前進。時至今日，我們看見一種新形式底奴隸制度擺在眼前，可是我們却全然忘却了一項告誡。我們忘記了社會主義與奴隸制度是有關聯的。

現代趨向社會主義的趨勢，不獨與最近過去的歷史脫節，而且與西方文明底進化程序也脫節。這種脫節，深刻到了什麼程度，我們如果不僅考察十九世紀的背景，而且考察長遠的歷史景象，並且發現社會主義的趨勢與這些背景和遠景相牴觸，那麼我們便可瞭然於懷。我們不僅很快地放棄了科布登（Cobden）和布萊脫（Bright）底看法，不僅很快地放棄了亞當斯密和休謨（

化之一結果。不過，這些國家底思想變化得快些，以致於和我們變得緩慢些的思想發生衝突而已。但是，我們並不是沒有受這種思想變化之影響的。（此處最吃緊——海光）

觀念底改變和人類底意志力將世界弄成目前這個樣子。雖然沒有誰預見到這些結果，但事實上已擺在大家面前。事實是自發的變化著。目前事實的種種變化，並沒有使得我們非改變我們自己底思想習慣來適應它不可。這種情形，也許是盎格魯撒克遜諸國所不易瞭解的。之所以如此，是因在世界改變底發展過程之中，盎格魯撒克遜諸國遠落歐洲多數國家改變底速度之後。我們仍然以爲目前指引我們的理想，以及在過去的年代曾指引我們的理想，祇是在未來才能實現的理想；可是我們沒有察覺，在過去二十五年來，這些理想不僅改變了世界，而且也改變了我們自己底國家，並且已經改變到了何種程度。我們依舊相信，直到最近，我們還是受所謂十九世紀的觀念所支配，或者受放任原則所支配。如果我們將我們國家底現狀與某些國家加以比較，而且與那些輕浮躁進的國家之看法加以比較，那麼我們相信我們還是受著所謂十九世紀觀念之支配，或者受放任原則底支配。我們以爲我們底這種想法是對的。但是，即使時至一九三一年，英國和美國只是緩慢地跟著別的國家之路線走。即使在那個時候，英美已經走得相當的深，以致於只有記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情況的人才知道自由世界底眞面目爲何。

這個問題眞正嚴重之點是，不獨近年來我們在物質建設方面有著重大的改變，而且這些改變

。這種說法就是：世界當前的危機是由我們所犯下的眞實錯誤造成的；而且我們追求我們最珍視的某些理想，適足以產生與本願全然相違的種種結果。大家都不相信，這種說法，適足以造成世界今日的危機。

當我們把全副精力用於獲致戰爭勝利時，我們有時不易記得，即使在戰前，我們現在藉作戰來保衞的許多價值標準，在英國已經遭受威脅，在別處已經遭受破壞。雖然，代表著不同理想的國家是各自爲其生存而戰，可是我們不能忘記這一爭鬪是起於觀念的衝突。這一觀念的衝突，在不久以前，是孕含在共同的歐洲文明裡的；並且，由於極權制度之創立而登峯造極的許多趨勢，並不限於目前陷入極權制度之下的國度中才有。雖然，我們現在首要的任務是贏得戰爭，可是贏得戰爭的目標僅僅是爲得到另外的機會來解決這些基本問題，並且覓致一種方法來趨避那威脅相似的文明的命運。

現在，我們不容易認爲德國和意大利或蘇俄不是與我們在不同的世界中；我們以爲他們是在與我們相同的世界中的思想發展之產物。至少，在我們與敵人相持時，我們比較容易把敵人看成與我們完全不相同的東西，而且在那些敵國裡所發生的事情不能在我們底國家裡發生。至少，我們這樣想時，自己也比較愜意些。可是，在極權制度興起之前的歲月，這幾個國家底歷史可以表明，我們與這些國家不同之處是很少的。我們與這些國家所發生的外在衝突，乃歐洲思想發生變

程，並非照著我們大家所希冀的方向繼續進步；恰恰相反，我們是爲種種現代的過惡所威脅。這種種過惡，是被我們與過去歲月的野蠻主義聯繫起來的。當然，面對著這種情勢，我們不願意譴責自己，不認爲係由於我們底過失所致。我們總是自我辯白：我們不曾運用最佳的智慧來與過惡奮鬪嗎？在我們之中，許多第一流的頭腦不是曾孜孜不懈地努力著想把這個世界弄得更好嗎？我們的一切努力和希冀，不是曾趨向較大的自由、正義，和繁榮嗎？我們總以爲，如果我們所希望的是自由和繁榮，可是，我們所得到的結果，却是面臨桎梏和困乏，那麼這便是結果與希望大不相同了。如果事實上的結果與我們的希冀大不相同，那麼這不是由於邪惡勢力挫折我們之所致嗎？而且，在我們重新走上較佳的道路以前，邪惡的勢力征服了我們，那麼我們不是會成爲邪惡勢力的犧牲品嗎？凡此等等，不是很夠明顯的事實嗎？我們常常聽到有人咒詛這個時代的罪惡，說這些罪惡是由於邪惡的資本家所造成，或是由於某一個國家底敗壞精神所致，或是由於老一輩的人之愚妄所致，或是由於半世紀以來我們向之爭鬪但猶未完全推翻的一種社會制度所形成。無論我們把這個時代的罪徒叫做什麼，無論我們與這些罪徒怎樣不同，我們總是以爲我們可以肯定一點，或者至少直到最近可以肯定一點，就是：有些觀念在晚近若干年來爲許多具有善意的人共同接受，並且決定著我們社會生活中主要的改變，而這樣的一些觀念不會是錯誤的。我們底文明現在是發生危機了。如果有人提出任何說法來解釋這種危機，我們都肯接受，但有一種說法是例外

可一目瞭然：奴役社會是怎樣構成的；那些地區正在朝著奴役之路邁進。這樣的力作，對於趨慕自由但却爲流行的似是而非之說所困攪的人，應該是一座指路標。

海耶克教授曾目睹納粹如何摧毀自由而導德意志人民於奴役之路。彼進而思究此結局如何主要源出德意志思想。海耶克之寫這部論著，可謂現身說法。德奧學者與海耶克同等遭際者尚大有人在。彼等近二十年來類此之論著給予英美學人以若干警醒：使彼等重新肯定一度受到嚴重震撼的自由信念，並從而革新之，擴大之。納粹與共黨是歐洲現代政治上一對變態的孿生兒。無論二者在發生的根源上有無不同之處，納粹統治與共黨極權底作風與實際設施使人民親身感受的痛苦，則甚少差別。所以，至少在這一關聯上，凡對納粹之批評幾全可移用於共黨。既然如此，海耶克教授底思想，對於一方面並未反對與極權暴政抗鬪而同時却竭力提倡德意志型及其兄弟思想者，應能引起若干反省。

放棄了的道路

自由制度在這一代並未失敗，祇不過未曾嘗試而已——羅斯福

自二十世紀初葉以來，人類底文明發生了出乎意料之外的轉向。近幾十年來，人類文明底航

好，我們都應該感激你。當然，我不能全部接受你關於經濟方面的學說。但是，在道德方面和哲學方面，我却全然同意你在這部著作裡所說的。對於這些學說，我不僅是同意而已，並且深深受其感動。」（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1952）由這一段話裡，我們可以看出鏗斯對海耶克這部論著估價如何的高，以及他受到怎樣的影響。

我們再看《鏗斯傳》裡是怎樣說的。《鏗斯傳》裡說：「近來有件可喜的事。即是，鏗斯和海耶克教授二人獲致了愉快的友誼關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海耶克教授底注意力轉變了。他不再研究銀行論與資本論這類專門技術性的問題。他寫了一本關於政治經濟原理的著作《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這部著作中雖不無過甚其詞之處，但畢竟算得是一部典籍。鏗斯和海耶克教授發生愉快的友誼關係，可算是鏗斯對於海耶克思想怎樣反應之一表示。從這一表示，我們可以看出鏗斯對於這個時代某些根本問題的看法。」以共黨作主力所鼓動的非自由主義的意理，到了二十世紀，幾成無可抗拒之勢。海耶克教授此作，則成正面抗拒此勢之信號。所以，它受到學人底重視。

這部論著底立論，固然主要係從政治經濟入手，但背後假定了自由社會的倫理道德基礎。著者海耶克教授學識之淵博，觀見之深入，論證之謹嚴，保衞自由制度之用力，及其對源出德意志的反自由逆流思想駁議之精，實爲近年來所罕見。這部論著，是一面鏡子。我們看這面鏡子，便

寒風烈日之中，而日趨凋零，衰落。

自由是人類最寶貴的財產。嚴格意義的自由人之出現，只是歷史進入近代才有的事。時至今日，世界上只有較少數的人才享有自由。自由人是自主、自發，和自律的人。人而能自主、自發，和自律，這是人類文明高度發展底結果。所以，我們可以說，自由人和最文明的人二者是同義語。自由是不容曲解的。它是西方近代宗教、政治、經濟，和知識向前發展的產品。因而它有一定的眞實內容。東方大多數人，對於自由的眞實內容依然一無所知。對抗共產制度而不知自由爲何，正像結婚而不談戀愛一樣地可悲。

原籍奧國的學者海耶克（F. A. Hayek）教授的著作《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書，依譯者之所知，乃近若干年來論析自由最佳的著作。問世以來，學人交相讚譽。歐美學人H. Hazlit, G. Garrett, J. Davenport, Hans Kohn, 以及Louis M. Hacker 等之評讚且不具論。我們茲看當代最有影響的大經濟學家鏗斯（M. Keynes）對海耶克這部論著的態度，便可見其價值。（羅斯福總統所領導之新政，在經濟理論上，大受鏗斯底影響。）

鏗斯與海耶克教授原係論敵。但是，海耶克教授此一論著問世之初，即改變了他們二人之間的關係。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鏗斯致函海耶克教授道：「我在旅途中有機會把你底著作好好讀過了。照我看來，這部著作是一部偉大的著作。在這部著作裡，你把所亟需說的話說得這樣

，那麼自由觀念有如未經孵化之卵，永遠不能化而爲鵬。這樣，縱有自由觀念，或所謂「精神的自由」，它對於整個的人理建構不能發生相干的作用。所以，那聚族農耕的地區，不易出現自覺的自由人。從前，在這些人中，具有某種文飾的禁忌（Tabooism）發生支配生活的魔力。到了近代，這種禁忌滲入這些人的政治生活裡，便轉形爲種種色色的政治教條。藉高掛政治教條而獲得現實利益者之反對自由，乃「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實在說來，東方沒有自由傳統。在東方某些地區，富於一元論傾向的意理。它雖未將其他意理排斥盡淨，但至少居於優勢的支配地位。這種富於一元論傾向的意理，表現在政治上就是「定於一尊」。到了現代，經過大的政治變革，「一尊」被滅，墮落而爲擁有武力與割據土地者對人衆之宰割、統治、鎮壓，以及部勒。德日諸國之軍國民思想底輸入，給予這些玩意以「思想武裝」。不久，俄國革命發生，布爾希維克意理向東泛濫。布爾希維克意理遂取軍國民思想底支配地位而代之。布爾希維克主義者，從理論上到實際上，無不徹底反對自由思想、自由言論，以及自由組合，而主張嚴格以一個教條統治思想，以一種宣傳來齊一言論，尤其是以一個政治組織來代替衆多的政治組織。布爾希維克主義者與軍國民主義者雖屬來路不同，但是在敵視自由上則同；尤其在摧毀自由之技術上，後者望塵莫及。在這一關聯上，後者是易與前者化合的：在軍國民思想的潛意識底子上，加上布爾希維克式的技術。這樣一來，數十年來播散的自由種子更暴露在

藉；沒有自由則民主將成獨裁與極權暴政底工具。談民主而反自由，正猶之乎要結婚而反對戀愛。這是什麼「邏輯」！

民主形式是易被利用的，舉凡開會也，選舉也，議事也，立法也，舉手也，無一不可表演得維妙維肖。自由則不能被導演。自由是個體之自主、自發、自律的思想、言論與行動。所以，當自由民主之要求正大光明，而且成爲沛然莫之能禦之勢時，現代極權統治者爲表面順應此勢以保持其權力，無寧選擇形式的民主，而打擊內容的自由。於是，蘇俄發明了「人民民主」這類底玩意以欺衆。但是，假戲總是容易敗露的。當著「人民民主」這種假戲被大家看穿而且要求貨眞價實的自由時，蘇俄發明家將會對「自由」這一個名詞讓步，而別籌方法來挖空自由之實際，或利用大家對於自由並無眞正的瞭解而藉巧立之名目導向自由之反面。也許，蘇俄型類底發明家會說，只有「階級自由」、「共產黨底自由」，或「蘇俄國家之自由」，再沒有別的自由。這樣一來，就把眞正的自由，一筆勾消了。

自由不是隨便可以獲致的。它是適合的歷史和環境之產品。在「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的氣氛籠罩之下的地區，不會產生自由。「作之君」和「作之師」混爲一談時，自由不能顯現。「一盤散沙」並非自由；自由並非「一盤散沙」。在一羣人中，即使具有含糊的自由觀念，但如未將自由觀念建構化（institutionalize），器用化（implementationalize），任其藉此發展

放棄了的道路

——海耶克教授著《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 Hayek）之第一章

譯者的話

今日世界面臨的最大課題無疑是從對抗共產制度而反極權暴政。就純正的理想而言，這是爲了建立民主以實現自由，這一最低限度的主旨，應是自由世界所一致趨歸的。然而，在自由世界裡，並不是所有的份子對此主旨眞切嚮往。因此，自由世界還未能形成在政治上的一個同質體以發揮最大可能的反共效率。時至今日，在自由世界裡，尙有人發出要民主而不要自由的妙論。吾人需知，自由是民主底眞實內容；民主是自由底較佳形式。沒有民主則自由失去保障與發展的憑

法治底要旨……八七
統制經濟底種種危害……一〇三
迷妄的平等……一一九
安全與自由……一四一
壞人爲何得勢？……一五九
論思想國有……一八一

目錄

《殷海光全集》序……殷夏君璐……一
《殷海光全集》編者的話……林正弘……五
自序……一
放棄了的道路……一
偉大的烏托邦……二三
管制計劃與自由計劃……三九
管制計劃是無可避免的嗎？……五五
個體主義與民主政治……七一

《到奴役之路》這本論著的述要，就所倡導的觀念和思想內容來說，今後大部分有現實的生活意義。實實在在，它展示了一組生活的基本原理，因而也就指出了一條生活的大道。至少，依我的人生理想而論，有而且只有跟著這條大道走下去，人才能算是人，才不致變成蜜蜂、螞蟻、牛羣、馬羣、工奴、農奴、政奴，或一架大機器裡的小零件。就最低限度的意義來說，這本書的述要之在這裡出現，可能讓這裡長年只受一種觀念和思想薰染的人知道，這個地球上尚有許許多多不同的觀念和思想；而且，在那許許多多不同的觀念和思想中，說不定有的比他所薰染的更好。人不能完全藉消耗物質來延續生命，人的生活還須有理想的遠景。有道德和知識作基礎的理想，至少比需靠現實層界的權勢和利益來支持的種種氣泡，較值我們懷抱得多。

古人說：「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我近年來常常想，人生就過程來說，有些像一隻蠟燭。這隻蠟燭點過了以後，永遠不會再燃了。我從來不做秦始皇帝那種求長生不老的痴夢。那些藉語言和幻想編織一幅圖象來把自己躲藏在它裡面的人實在是軟弱的懦夫。世界上最剛強的人是敢於面對逆意的現實眞相的人，以及身臨這樣的眞相而猶懷抱理想希望的人。現在，我像冰山上一隻微細的蠟燭。這隻蠟燭在蒙古風裡搖曳明滅。我祇希望這隻蠟燭在尚未被蒙古風吹滅以前，有許多隻蠟燭接著點燃。這許多隻蠟燭比我更大更亮，他們的自由之光終於照遍東方的大地。

五十四年九月十四日修正

。雖然，我借來的《到奴役之路》原書因早已歸還原主以致無法將原文和「譯文」查對，可是，我現在覺得有些地方不能算是嚴格的翻譯，只能算是意譯；還有節譯的情形，也有幾章未譯。關於這一方面，目前被種種事實上的條件所限，我無法補救。我希望在將來對於自由的觀念和思想之啓導工作上能有機會多作努力。現在，我只能把本書叫做《到奴役之路》的「述要」。同時，我趁出版之便，把內容稍加修改——特別是有關人身方面的，因爲我所著重的是觀念和思想及制度。

復次，近四、五年來，我對海耶克教授有進一步的認識。我從他的著作和行誼裡體會出，他是一位言行有度、自律有節，和肅穆莊嚴的偉大學人。我所處的環境之動亂，社群氣氛之乖謬，文化傳統之解體，君子與小人之難分，是非眞假之混淆，以及我個人成長過程中的顚困流離，在在使得我對他雖然心嚮往焉，但每歎身不能至。而且，近半個世紀中國的現實情形，不是使人易於麻木，便是使人易趨激越。從事述要《到奴役之路》時代的我，是屬於激越一類的。十幾年過去了，回頭一看，《到奴役之路》經過我的述要，於不知不覺之間將我的激越之情沾染上去。我那時的激越之情和海耶克先生的肅穆莊嚴是頗不調和的。關於這一點，我很慚愧。我認爲我應該向海耶克先生致歉。

＊　＊　＊

的人？這些人當時所「想像」的「臺灣的言論不自由」的程度有多大？胡適之先生所說的「臺灣的言論自由，遠超過許多人所想像的」，「超過」的程度有多大？這些問題，我從他的講詞裡得不到解答。我所能確切指出的，是當時《到奴役之路》有發表的自由。不過，這是十一年前的往事了。往事如煙！在這十一年之間，臺灣的言論自由是進步了，退步了，或是停在原處未動，這是一個頗爲複雜的問題。這個頗爲複雜的問題必須研究輿論的專家來解答。可是，無論他的解答是否和每個人的切身經驗符合，特指地說，我希望《到奴役之路》一書的「譯註」原文於十一年以後的今天在這裡不是沒有和讀者重逢的實際可能。

＊　＊　＊

十一個艱辛的年頭就這樣飄過去了。人生並沒有太多個的十一年。回首這十一年來，我個人經歷了這激變時代裡的一些激變。這些激變，使我對於這個時代的瞭解加深，尤其對於我個人的處境的認識加深。因此，我的思想也發生若干改變和進境。這些改變和進境使得我現在認爲我在《到奴役之路》的「譯註」裡所展現的思想有些更動的必要。例如，對於自由和民主的認識，對於道德價值的認識，我現在的瞭解和當時頗不相同。凡此等等，我祇有在別的論著裡去表示了。

＊　＊　＊

當我對《到奴役之路》作「譯註」時，我說是「翻譯」。照我現在看來，這個說法有些欠妥

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胡適之先生在當時的「自由中國社」歡迎茶會上的講演詞裡說：

二月二十二日，紐約時報的新聞記者同我談話時，我曾對他說：「我所知道的，在臺灣的言論自由，遠超過許多人所想像的。」我還舉了個例子。他們大概是因爲篇幅的關係，沒有登出來。我舉的例子是說：比方我們《自由中國》最近七八期中連續登載殷海光先生翻譯的西方奧國經濟學者海耶克（原係奧國經濟學者，後來住在英國，現在美國支加哥大學任教。）所著的《到奴役之路》。我舉這個例子，可以表示在臺灣有很多的言論自由。因爲這種事例，平常我們是不大注意的。這部書出版於一九四四年，到現在已出了十版，可說是主張自由主義的一部名著，也可說是新的主張個人自由主義的名著。這本名著的用意，就是根本反對一切計畫經濟，反對一切社會主義。一切計畫經濟都是與自由不兩立的，都是反自由的。因爲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計畫經濟，所以儘管自由主義運動者多少年來以爲：社會主義當然是將來必經之路，而海耶克先生却以一個大經濟學家的地位來說：一切社會主義都是反自由的。……（載在《自由中國》半月刊第十卷第六期）

那時的胡適能注意到《到奴役之路》的出版和翻譯，這表示他的自由主義的餘暉猶存。不過，在臺灣能翻譯並發表《到奴役之路》，這件事對當時「臺灣的言論自由」究竟有什麼證明作用就頗不易斷言。嚴格地說，胡適之先生關於臺灣言論自由問題的談話我並未清楚瞭解。當時他說的「臺灣的言論自由，遠超過許多人所想像的」，他所說的「許多人」是多少人？是些什麼種類

與現實層界的權勢不可分。於是，它變成「只許信奉不許批評」的聖諭。這樣一來，它帶有權威的陰影，和強制的意味。自由主義即令算是一種主義，也不是這樣令人緊張的「主義」；否則根本就失其爲自由主義的資格。自由主義可以被反對，可以被批評，而且無寧歡迎批評，它也無懼乎反對和批評。政治層面的自由主義只是自由主義的一個層面而已。自由主義之最中心的要旨是一種人生哲學、一種生活原理，及人際互動的一組價值觀念，或對人對事的態度。它是人本主義的，認爲個人是人生一切建構和一切活動的始原起點。個人有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法治的基本出發點和功能，並非保障政司的權力，而在保障個人之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從這一組設準出發，自由主義者看得最嚴重的事是鎮制權力的隨意濫用，並且反對國邦統治大家的經濟生活。自由和責任有不可分性。依此，一個自由主義者對於他的所言所行的後果都負有責任。不負責任的人是沒有資格講自由的；沒有理知和道德觀念作基礎的騷動根本就不是行動自由；不從理知和對社會的責任感出發的言論不是言論自由。騷動和不負責的言論往往招致極權主義的災禍。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和東方的若干大變亂的史例可爲殷鑑。

海耶克教授的《到奴役之路》當時給我那樣的感興和幫助。我很願意將我從這本書所得到的益處分給別的讀者。於是，我著手「翻譯」，並且作註解。這個工作從一九五三年開始，到一九五四年完成。

由主義者，守不住自由主義的正統經濟思想，紛紛放棄了自由主義的這一基幹陣地，而向社會主義妥協。同時，挾「經濟平等」的要求而來的共產主義者攻勢凌厲。在這種危疑震撼的情勢逼迫之下，並且部分地由於緩和這種情勢的心情驅使，中國許多傾向於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醞釀出「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的主張。這個主張是根本不通的。這個主張的實質就是「在政治上作主人，在經濟上作奴隸」。我個人覺得這個主張是怪蹩扭的。但是，我個人既未正式研究政治科學，更不懂得經濟科學。因此，我雖然覺得這個主張怪蹩扭，然而只是有這種「感覺」而已，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正當我的思想陷於這種困惑之境的時候，忽然讀到海耶克教授的《到奴役之路》這本論著，我的困惑迎刃而解，我的疑慮頓時消失。海耶克教授的理論將自由主義失落到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重新救回來，並且擴大到倫理基礎上。一個人的飯碗被強有力者抓住了，哪裡還有自由可言？這一振興自由主義的功績，眞是太大了。

我平生讀書與思考，受影響最深的要推羅素。除了羅素以外，近年來對我影響最深的要推波柏爾和海耶克二位教授。我受海耶克教授的影響是從讀《到奴役之路》開始的。這本論著曾給我的思想以一個新的衝擊，它使我對自由主義的認識加深並且加廣。

我現在說自由主義是一種「主義」，實在有些勉強。我現在之所以用「主義」一詞，純然是因爲我找不到更適合的字眼來表達我所要表達的意義。「主義」一詞的用法，在許多情形之下，

自序

海耶克教授在一九四四年出版了《到奴役之路》一書。批評家們將這本著作和約翰·穆勒的《論自由》相提並論，可見它的重要。一九五三年我才有機會讀到這本著作。當我讀到這本著作時，好像一個寂寞的旅人，在又困又乏又渴時，忽然瞥見一座安穩而舒適的旅舍，我走將進去，喝了一杯濃郁的咖啡，精神爲之一振。

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正同五四運動以後許多傾向自由主義的年輕人一樣，那個時候我之傾向自由主義是未經自覺地從政治層面進入的。自由主義還有經濟的層面。自由主義的經濟層面，受到社會主義者嚴重的批評和打擊。包括以英國從邊沁這一路導衍出來的自由主義者爲主流的自

易。有些書信只記月日，未標明年代，從書信內容無法斷定其何年所寫，收信人也無明確的記憶。這一小部分書信，自然無法按寫作的時間先後，正確編排。在《政治與社會》部分，殷先生早年在南京《中央日報》所寫的社論，因未署名，不易認定。我們暫且只收錄能夠確認的文字。我們盼望讀者，尤其是殷先生當年在《中央日報》的同事，能夠提供資訊。

懷念和評論殷先生的文字，除了收集他的親友和學生所寫的文字之外，還選錄了一些從未和他見過面的年輕學者所寫的論文。此外，我們也把已經出版的各種殷先生選集的編者序言收錄在這部分文字之內。這些序言，一方面表達了編者對殷先生的懷念與評價，另一方面讓我們明瞭殷先生的著作在其去世後重印發行的概況。

我們以謹慎的態度和惶恐的心情來編這套全集。這是一種榮譽，也是一份責任。

林正弘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面要向以前編過殷先生選集和著作目錄表的各位先進，以及提供資料和消息的各位朋友，表達我們的敬佩和感謝之意；另一方面要懇求大家繼續指教，使本全集再版時能更爲完備。

本全集除了「專書」之外，將殷先生的單篇文字分成《政治與社會》、《學術與思想》、《書評與書序》、《雜憶與隨筆》及《書信集》五部分。別人所寫的懷念及評論文字則另成一單元。各部分文字大都按發表或寫作的時間先後，順序編排。「專書」包括殷先生就特定專題所撰寫的單行本、教科書，以及成册的翻譯作品。他所寫的邏輯教科書《邏輯新引》，幾乎每一講都利用邏輯題材，借題發揮。他譯述英文書籍，也常在譯文中附加許多「譯者的話」，發表自己的意見。這些都有助於瞭解殷先生的思想。唯獨他少年時代所譯《邏輯基本》一書，因內容過於陳舊，且未在譯文中附加譯者的意見，我們仔細考慮之後，決定不收入全集之內，而只把他所寫的譯者序言收入《書評與書序》之中。此外，殷先生在世時所出版的單行本，有些是由已發表過的單篇文章集結而成的。《思想與方法》一書即是如此。對這種單行本，我們決定把其中所收錄的文章，按其性質及發表之時間，分別編入單篇文字的五部分之內，並將其序言收入《書評與書序》之中，而不再以專書形式印行，以免重複。

在單篇文字方面，《書信集》部分最不易收錄齊全，其次是《政治與社會》部分。殷先生勤於寫信是他的朋友和學生都知道的，但收信人未必有保留書信的習慣，且散居海內外各地，訪求不

《殷海光全集》編者的話

殷海光先生逝世已經二十年。二十年來，港臺之間先後出版過多種專集，選錄他的論著、書信，或他的門生故舊懷念和評論他的文字，但迄今未有重印他全部著作的計畫。桂冠圖書公司爲了紀念這位勇敢的書生，決定把他一生所寫過的全部文字，以及他的親人、朋友和學生所寫的懷念和評論文字，重新整理編排，分册印行。

本套書取名爲《殷海光全集》，並不意涵已收入殷先生的全部文字，而只是表示編輯的理想目標而已。我們依據已經出版的各種選集，參考某些選集中所收錄的殷先生著作目錄表，並多方訪求殷先生的親友和門生，儘可能蒐集完備，分類編排。但遺漏缺失，勢所難免。在此，我們一方

他在臺灣大學任教職的學生們莫名其妙的被解聘，朋友及學生們被捏造罪名坐牢受苦刑。我一人剛到美國時做過佣人，做過大廚，每天在餐館工作十四小時，凌晨三時才能回家睡覺。我們的不幸及犧牲值得嗎？看到今年世界上發生的事情，使我覺得殷海光所說所寫的是對的，我們大家受苦犧牲在極權國家是必經的過程，是值得的。

《殷海光全集》的出版，我必需感謝夏道平先生，以及殷海光的學生陳宏正、王曉波、胡基峻。沒有他們的奔走與協助，全集是不可能出版的。尤其是陳宏正，近十年來，由於他的策劃與努力，使得殷海光的著作與精神，重新獲得大家的認識與肯定。臺大哲學系林正弘負責全集編務，賴阿勝先生不怕困難，擔負起全集出版的責任，我都必需深深的予以感謝！

殷夏君璐

一九八九年聖誕節於美國

問我爲什麼我們每到一處他的信就來了）。我父親對這本書覺得很怪，每天躺在床上讀一陣，每次讀讀便睡著了。有天他突然從床上跳起來，一邊大叫，原來他發現有兩條拉成長形的金戒指藏在書的訂線邊內，這是海光寄給我去臺灣的旅費，他在信上不敢提，我也不知道，居然被我細心的父親發現了，他感動的對我說：「海光不完全是個書呆子嘛！我的小女，共產黨馬上要來了，我做爸爸的再也不能保護你，只好讓你去臺灣與海光相聚。」說完我們父女相抱痛哭。

與海光結婚後，他的生命絕大部份花在讀書、教學及寫作。他的著作及言論提醒人們對民主自由的覺醒及追求，但帶給他自身及他的家庭災難與逼害，也帶給他的朋友及學生們災難及逼害。有一次他對我說：「我也不是那麼笨，要吹牛拍馬、說歌功頌德的話，混到一官半職，然後出國一走了之，誰不會？只是我的良知和個性使我做不出來。」

一九八九年是殷海光逝世廿周年，不知爲什麼今年特別不平凡，首先是中國，接著波蘭、東德、捷克等共產國家風起雲湧的向獨裁集團、恐怖統治者挑戰，千千萬萬人要求民主、自由及人權。假如殷海光今天活著，他一定會激動得睡不著、吃不下飯。多麼令人震撼及興奮的事實發生，而且發生得這麼轟轟烈烈！

廿年前殷海光被國民黨圍剿逼害，特務守在我們家大門外，歲歲過著恐懼擔憂的日子。接著海光罹患胃癌，甚至主治及手術醫生說他只能活六個月，國民黨仍不讓他去哈佛大學做研究員。

《殷海光全集》序

我是一九四五年美國原子彈投在日本後與我的丈夫第一次見面。他剛從印度退役回國，來重慶找工作，暫住在我娘家。那時我十七歲讀高一，看到他就迷上他，認爲他是世界上最有學問、最了不起的人，一心要跟他一輩子，即使做他的佣人也心甘情願。雖然偷看到他寫給我哥哥的信，說他要獨身一輩子，但是不知爲什麼信心那麼強，堅信我一定會得到他。我的父親雖然欣賞海光的才學，尤其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思想，但非常反對我與他相好，想盡方法阻止。加上正逢國共兩黨打仗，兵荒馬亂，整個中國一片混亂，海光與我一直分離兩地，所幸通信從未間斷。一九四八年底我們逃到湘潭時，海光突然寄來一本很厚的哲學書（海光的來信父親多半過目，而且還

到奴役之路

殷海光全集

春

纺

11. 8. 93 s'pore

自由主義大師海耶克教授在本書中，將自由主義失落到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重新尋回，並擴大到倫理的基礎上。而另一位自由大師殷海光先生則將此經典之作譯成中文，字字珠璣，見解獨到，又不失其本眞。從內文括弧中譯者之解語，讀者當可感受到二位大師脈搏跳動的同步化。



到奴役之路

著者◉海耶克　譯者◉殷海光

殷海光全集